

新中國報專論集

10127

0256.1

書叢國中 新

種六十第

集論專報國中 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815B



版出社報國中 新

月一十年二十三國民

~~1576652~~

新中國報專論集目錄

文化之部

- 中國應回復東方固有之地位……………江亢虎（一）
- 新中國民族意識的構成……………楊鴻烈（五）
- 新中國物質環境的重建……………楊鴻烈（八）
- 論宣傳工作……………孫繼良（二一）
- 新中國文化運動的正軌……………楊鴻烈（二六）
- 孔子的政治哲學……………唐 諤（一九）
- 文化創造與學術精神……………吳誠之（二五）
- 我國新聞事業的回顧與前瞻……………孫頌方（二六）

從文化交流談到反英美的思想戰……………唐士夔(三)

致日本知識人士……………吳誠之(三九)

貢獻於時代的報人者……………孫頌方(四三)

肅清文化的沈滓……………鄭撫籍(四六)

大時代的文化人與文化……………唐士夔(五三)

政治·戰爭與文藝……………南容(五五)

文化界的當前使命……………劉輝(五六)

大東亞戰爭的文學政策……………魯風(六一)

教育之部

我國教育過去的檢討與今後的改進……………吳明揚(六五)

我們需要那一種教育哲學……………王知非(七〇)

改進上海教育芻議……………吳明揚（七五）

從體育到德育……………鄭撫籍（八〇）

政治之部

清鄉的成效如何……………李蒙政（八四）

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新使命……………孟祺（八八）

迷雾中的重慶……………余致中（九三）

爲什麼主張參戰……………周化人（九六）

戰時行政機構的單一化……………尹繼剛（一〇三）

當前的水利問題……………金狷（一〇七）

肅清英美遺毒的實質……………尹繼剛（一一一）

建立上海民意機關芻見……………魯風（一二五）

經濟之部

- 東亞經濟資源及其運用……………楊立彬(二〇)
- 上海經濟的檢視……………楊昌源(二四)
- 上海資金的出路……………楊昌源(二〇)
-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的建立……………楊立彬(二五)
- 打擊投機的緊急對策……………吳誠之(二九)
- 貢獻於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唐士夔(三四)
- 安定民生增加生產之基本設施……………邵友農(四九)
- 節約物資與革新風氣……………魯風(五三)

中國應回復東方固有之地位

江亢虎

十年前在美洲講學，一旦忽有所感，自鑄英文一新名詞，曰睿鄂理延帖純（Re-Orientation），直譯之即「回復東方」。蓋鄂理延爲東方，但鄂理延帖純則有勘定方向之義。緣太古時代，人民視日出入以定方向，東方爲日出之處，居四方之首，故由東方引申得此。睿爲冠詞，乃回歸恢復，有再行審定之義。我中國本東方古國，百餘年來，震於泰西之物質化、武力化，自喪失其固有之文化，及今提撕醒覺，痛改前非，重尋故步，回歸本位，恢復光榮，再定政教新方針，繼續古來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此乃中國之莫大使命，亦即中國人之唯一責任也。

如此重要之使命與責任，可從兩大方面同時進行。一曰奠定東方之集團，一曰發揚東方之文化。前者爲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物質的；後者爲社會的、教育的、思想的、精神的。此兩大方面，依天地人之關係，中國各有其自然之立場，與當然之方針。天者指歷史言，地者指疆域言，人者指種族言。試分述之。

（甲）奠定東方之集團 第一次大戰後，世界逐漸形成數集團，至第二次大戰而愈益顯著，今可大別爲四：一、英美集團，以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爲中心，爲世界舊秩序最後之壁壘，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之大本營。其口號則民族自決，國際聯盟，自由競爭，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人民陣線，皆美名也。一、德義集團，以日耳曼民族爲中心，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同流共貫。其目的在打倒大不列顛

帝國，撕毀凡爾賽條約，建設世界新秩序，與英美集團針鋒相對。歐西各國，或自動，或被動，先後相率牽入此範圍中。其興也勃焉，前途猶未可量也。一、蘇聯集團，以斯拉夫民族爲中心，揭共產主義社會革命之大纛，一方面宣傳破壞之思想，一方面締結不侵之同盟，本與英美集團及德義集團皆處於對待地位。但前既詭托於民主，與英美集團結納，後又自忘其宿仇，與德義集團親交，陽假中立之名，陰收漁人之利，不講信義，不擇手段，歎觀止矣！一、東亞集團，以大和民族及主張和平之中華民族爲中心，日本首先感覺，獨力奮鬥，中國今亦悔悟，急起直進，與英美集團，蘇聯集團，皆以利害衝突，而處於對待地位，惟與德義集團，因推翻舊秩序，建設新秩序，目的從同，自然接近，而且分頭邁進，期於殊途同歸。亞洲大洋洲各有色人種，向受帝國主義之壓迫及共產主義之煽惑者，亦一致傾向焉。

此四集團之形成，各自有其歷史地理民族之關係，非偶然也。英與美本屬同一民族，雖自獨立革命以後，兩國之歷史與地理互殊，然雙方之血統與文化，究比任何他國關係皆更親密，故一遇非常之事，則自相結合，不可分離；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英一發難，美卽同情，英一疲敝，美卽援手，豈非血濃於水之鐵證乎？德義兩國，亦不僅主義之默契而已；第一次大戰，德受創最深，怨毒最甚，義雖附入協約國，號稱六強之一，而和會所得，慾望未饜，且企圖恢復羅馬帝國，與德之企圖建設第三帝國，同一指趣。又因疆域位置，德必聯義，方易制法，而取得地中海優越權，雖其天然連繫，不如英美之堅強，而利害關係，則愈演而愈近。蘇聯自成一系，歷史地理民族皆隱具大一統規模，其與英美德義兩集團，密切聯合之必要甚微，直接衝突之可能亦尙遠，故得以盡其縱橫捭闔之能事。日本雖加入德義集團，但對英美之衝突，不似德義之緊張，對蘇聯之親交，亦不似德義之浹洽，

其目的唯在建設東亞新秩序，驅除白種人之殖民勢力，組織黃種人之國際聯盟，故東亞集團，可以分立而獨立，初不以三國同盟之故，而附屬於德義集團以存在也。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中國當此世界集團並峙之時，究將何以自處乎？既不能單獨創造一集團，又不能超然脫離各集團，然則對此既成四集團，果將何去何從乎？英美蘇俄歷來之教訓，吾人當已服膺弗忘，今其野心方張，豈可自投羅網？德義特因日本而間接惠我，我即竭誠擁護，亦不過長爲附庸而已，故依天地人三原則，歷史地理民族各關係言之，則參加東亞集團，固屬毫無疑義者。惟僅僅參加猶未盡也，必與日本通功易事，分工合作，同以自動的主動的資格，擔負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責任，然後上可以盡天職，下可以慰良心，內可以對越人民，外可以昭告世界，回歸中國固有之地位，恢復中國過去之光榮，此其要著也。

(乙)發揚東方之文化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果有異同否乎？曰有。此亦受天地人三原則之支配，因東亞歷史不同，地理不同，民族不同，故其文化自必不同也。惟其異同所在，可意會而不容指數，可概括而不易剖析，可大別而不便細分，要之有異有同，彰彰明甚。茲特略示大凡，以符舉例之意。西方文化重物質，東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武力，東方文化重道德，西方文化重法律，東方文化重人情，西方文化重試驗，東方文化重經驗，西方文化重享樂，東方文化重克制，西方文化主門爭，東方文化主謙讓，西方文化主侵略，東方文化主感化，西方文化講功利，東方文化講仁義，西方文化講均勢，東方文化講大同，西方文化講霸道，東方文化講王道。試問今日世界紛紛擾擾，何一非承上舉西方文化末流之積弊？唯有一反其道而行之，充分發揚東方文化之優點，用以挽回劫運，振起頹風，庶有豸耳。中國爲東方文化之祖國，故對此所負責任尤較他民族爲重大。日本今日亦揭藥王

中國應回復東方固有之地位

四

道，其於建設東亞新秩序也，亦列舉東方文化各優點爲進行之準的。故發揚東方文化，亦爲中國民族責無旁貸之使命，內修政教，外樹風聲，爲國際道德立一新紀元，爲人類前途開一新出路，使世界曉然於中國之聖經賢傳，確有治國平天下之功能，而不敢復以儒爲戲，乃吾輩讀書人分內事也。中國果能回復其固有之地位，一面奠定東方集團，一面發揚東方文化，則自立立人，自達達人，起現代西方文明之痼疾，導未來理想社會之先河，豈但自保其國而已。（三〇、三、一六）

新中國民族意識的構成

楊鴻烈

所謂「新中國」的一切，自然是對「舊中國」的一切而言；在舊日的中國，不惟已經早就有「民族意識」的存在，而且是非常的頑強褊狹！所以美國某氏曾說中國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有自高意識的民族，因此便常覺得自己的民族極為優秀，並且自詡前代有過燦爛無比的文化，故用不着再向其他異族領教或模倣。本來中國幾千多年所處的環境，實在很足以養成這種泰然自大的傲慢意識，試看在中國的東南方面就完全是茫無際涯的大海，對岸却為亙古即無一點文化影子的北亞美利加洲，西北既被崇山峻嶺縱橫遮斷，且又多出一個浩瀚廣闊的戈壁大沙漠，這樣使和歐羅巴洲的交通往來異常困難，而環繞國境的許多民族如南洋暹羅緬甸安南西藏蒙古朝鮮等的文化又不大高明，沒有足以使中國觀摩，刺激，興奮的資格，因此舊中國「目空一切」的傲慢意識便牢不可破的相傳下來。在別一方面，「物極必反」，近幾十年以來，少數憂時愛國之士，看見祖國這樣在近世陷於一個岌岌可危的倒退落伍的局面，便不禁痛罵中國的衰弱，就是由於保守舊時腐敗已極的思想制度的結果，於是便索性把那些什麼宦官，外戚，纏足，科舉，妻妾等事都當做是中國舊文化的特色，拿新時代的眼光看來，真是民族莫大的恥辱或痼疾，確係「半文不值」！尤其是一般崇拜歐美到了極點的人，便常常的揚言於衆人道，別的且不用細講，單說衣食住差不多就是人生物質生活的要件，沒有到過西洋的人，也許不覺得中國人民的生活還是未開化的野蠻生活。此外若把政治教育文化社會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來和西洋比

較，我們實在慚愧得無地自容！這樣我們只有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做歐美的隨從附庸罷了，像這種褊激過甚的論調，恐怕就是有點常識的黃髮碧眼的西洋人也很不好意思隨便的就說出來，我們只見許多位有國際聲望的歐美的漢學家窮年孜孜的研究並發表了許多可以汗牛充棟的論文，對於中國民族所發明的東西如什麼指南針、火藥、花砲、紙、鈔票、絲、茶、磁器、金魚以及風箏、毬子、紙牌、圍棋、象棋、走馬燈等等的遊戲玩具都撰成專書，津津有味地闡發無遺，尤其如指南針、火藥、紙、磁器等等的發明，他們都一致的看做是足與歐美物理化學上的發見相提并論。其餘還有爲我們中國人數典忘祖的「絕學」也不時由西洋學者多年的苦心探索才使世人明白其真實的價值所在，例如法國人辜蘭德氏 (Maurice Courant) 所著的「中國音樂的歷史」 (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des Chinois) 一文，就居然能够把中國人在音樂上的貢獻說得與西洋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東鄰日本的學者在這方面的努力更不能不令人特別感佩，最顯著的例如原田種宜氏所編印的「中國名畫寶鑑」即搜集晉、唐、宋、遼、金、元、明、清以來的名畫一千三十一幅，裝成一大厚冊，並以日華英法德各國文字作序說：「夫中國繪畫，淵源悠遠，傳承歷久，分門廣泛，技法多端，而其表現則以氣韻生動爲第一，其畫概出於高尚士夫之手，在世界繪畫中，具有特異之點，而作者之夥，已載紀傳，數以七千計，可謂世界文化上之一大偉觀！」又如梅原末治氏亦曾將他參觀歐美各國公私所儲藏的銅器照像集成七巨冊的「中國古銅精華」，其中奇形怪狀，雕鏤精緻的先秦「稀見之品」，美不勝收，使西洋及世界各國的人士都可以知道中國的銅器雖然比起埃及巴比倫在西曆紀元前三千多年就已經知道使用青銅的也許要算遲緩一點，但中國從殷，周起直至秦漢所有的青銅器爲數之多恐爲世界任何國家民族之所「望塵莫及」！大家都知道近世日本所受歐美文化影響的深刻普遍，遠在中國之上，但日本人民從

來就沒有人主張過把所有東洋的文物制度都澈底摧毀。卽如我國的孫中山先生大半生都消磨於海外諸國，而先生在「民族主義」的講演裏面，却竭力主張把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首先恢復起來，然後中國固有的民族地位就可以圖恢復。先生又在所著的「孫文學說」一書中，屢次的闡揚中國的飲食，瓷器等等不可磨滅的優點。這樣看來，啓羅爾氏（*Volentine Chiral*）所說中國自從和西洋接觸熟練以後，便能救出自身永久的孤立，而將於最近幾十年裏發生「東方的覺醒」（*The Reawaking of the Orient*），不錯！這個「虛懷若谷」「從善如流」而又不妄自菲薄的新中國民族意識的構成，實在可以說就是得力於歐美日本的學者以及我國近代最偉大的先覺孫中山先生諸人。（三〇、四、一七）

新中國物質環境的重建

楊鴻烈

關於我們中國的物質環境的優劣諸點，是有兩種極端相反的看法。在舊時的人們，大家差不多都和那位留名青史的大清帝國乾隆皇帝所頒賜英王喬治第三的詔書所說：「天朝領土廣大，物產豐富，皇帝不愛珍物奇玩，無需外貨」等類的話一鼻孔出氣；但是到了最近一世紀以來，中國實在不幸之至，不論怎樣的排外掙扎，結果終於被西洋的物質利器所剋服壓倒，使得歐美的國家人民都非常的看我們不起。前任美國駐華公使館商務參贊的安諾德氏（Julian Arnold）就可以算得是一個很爲顯著的代表，他曾經出版過一本叫做「美國人觀察中的中國」（China Through The American Window）的書籍，把中美兩國的物質環境的優劣相差的程度，描寫得懸絕萬里，天壤難比。他首先只籠統概括的說中國面積雖然比美國大，但中國的荒地却比美國多了無數；美國交通發達，人口分配都很適合於經濟組織，中國則許多邊僻之區，至今仍是閉塞不堪；中國的主要礦產以及所產的木材等等，其數量均遠不及美國的豐富。隨後他更從統計上彷彿真是「證據確鑿」的「百口莫辯」的樣子來指出中國的貧乏可憐，必得要使華人看了觸目驚心，氣爲之餒，如說美國有鐵路二十五萬英里，中國只有一萬一千英里；美國有汽車二千七百萬輛，中國只有四萬輛；美國商辦輪船有一千六百五十萬噸，中國只有九萬七千噸；美國年產煤六萬萬噸，鐵鑛七千五百萬噸，中國只產煤三千萬噸，鐵鑛二百萬噸。此外還有五六十項，都是相差懸殊，令華人羞愧無地，不忍卒讀。但話又說回來，他畢竟是一個美國人，自然

多少不能免掉有些故意「揚己抑人」的優越感存在，至於我們中國人呢？確是因爲自己的太不長進，且又受了長久的內外夾攻的結果，自然不僅默認西洋人所指摘出的「更僕難數」的弱點，並且也一致的承認西洋的什麼都好，所以配做「天之驕子」，只有我們這副窮骨頭僅能忍氣吞聲的做附庸奴隸！尤其可嘆的是經過這一次空前未有的慘絕人寰的中日全面的長期大戰，更有不少抱着澈底悲觀的人們，以爲中國從此對於復興只有絕望斷念了，其餘大多數也都抱持着一個「要中國能恢復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前的面目，至少需要一百年的時間，總之，終吾們的一生是來不及親眼看見」的似是而非的信念。筆者以爲這些話，都是非常的膚淺幼稚。中國的物質環境，大體的講來，並不算很壞，試從面積上來說，中國的版圖在世界上雖被列第三，但第一位的英國的各部分便極爲散漫，加拿大既是荒寒無人，澳洲也是砂礫不毛，酷燥炎熱，其散布大洋裏面的島嶼又多爲土人所居，半未開闢。第二位的俄國除了有荒寒不毛的一大片西伯利亞而外，其在黑龍江下游地方的與其歐俄本國相距便極爲遙遠。惟我中國宅居於完整的大陸，自上海至美國紐約或英倫，航程都大略相等，在世界地圖上實占最優美的地位，何況氣候又很爲溫和。比起東鄰日本，四面環海，山嶽綿連，絕少平原，夏秋之間且多颱風，拔木折屋，動釀鉅災而其國人民却埋頭苦幹，連山間狹隘的地段都努力使之變爲農田，計其每一耕地單位的收穫數量，竟居世界第一。日本列島又盡屬火山山脈，地震差不多天天都有，這樣看來，我國的災難並非頻繁，得天不惟不算很薄，恐怕還有點近於「席豐履厚」呢。此外我們又試從人口上來說，中國人口的衆多，一向就是獨冠全球。記得日本馬淵逸雄大佐會說：「中國人口稱四萬萬餘，四萬萬餘的人口，何等之多。加之人口繁殖率亦速，所以日本要以中國來作殖民地，控制有如此人口與如此土地的殖民地，可說是絕對不可能的。況且中國民衆的大部分是經營農業生活，生活力極旺盛，在

事變時，雖一時陷於戰火的浩劫而遭停頓，但一待硝煙四散，早即營營恢復耕作了，這是我們目睹了不少事實。年年歲歲，無論遭遇到什麼天變地異，氣總不餒，事後立即又能站起恢復。其再接再厲的耐久力與生活力的發揮，實令人驚異不止！」不錯，這些話並非溢美而完全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最後我們又試從物產上來說，中國土地遼闊，地勢複雜，寒溫熱三帶的物產，差不多都應有盡有，即如煤，鐵，米，麥，棉，羊毛等等爲立國的要素的，產額固然不甚豐裕，但若加以人爲的努力，其能達到「自足自給」的地步，也是毫無疑問的。歸結的說來，我們中國確是近可以取日本爲榜樣，遠可以拿德國做模範，因爲他們兩個國家都是在最近五六十年內纔戰勝其橫逆的境遇而同躋於富強的地位，那麼我們此刻要起來重建一個比較現狀爲好的物質環境，還有什麼理由可以令人猶豫或徘徊不前呢！（三〇、五、一八）

論宣傳工作

孫繼良

國民信心與國力培養

宣傳事業之爲今日國家事業的一環，已不再有人會加否認。我們試觀德國及蘇聯等國家的建國工作的猛飛突進，實不能不歸功宣傳力量的偉大。放在國家事業上言，宣傳決不是一種惡德行爲。爲公眾利益着想的宣傳行爲，和出於私的動機的造謠生非，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二樁事。其中的區分是在乎終極目的的動機。宣傳的動機是善意的，造謠的動機是惡意的。其判別的最後根據，是現實的真理。

國家宣傳事業的至上動機，是包括在使「國民向上」的一語中。就今天中國國家宣傳事業的中心課題言，是在促發並提高國民對於民族生存的信心，對和平建國的堅強信心。信心是一切事業的力量源泉，培養國民的信心，亦即是培養國民的力量。

我們試觀納粹德國的宣傳事業。一九三三年國社黨上台後由郭培爾所主持的宣傳部，其宣傳運動的第一步出發，就是以擊破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及復興光榮的德意志帝國爲恢復戰後德國人民對自己祖國的信心。打破凡爾賽條約與復興德意志帝國，是國社黨建國課題的同一問題的兩面。這兩面的同時宣傳戰，結果是培養成了今日德國國民的實力。

一種鬥爭的事業

宣傳事業是一種鬥爭，如果說宣傳事業本身有甚麼理論，那麼就是這鬥爭兩字。宣傳事業在個別工作上所作的理論工作，不是當作純理論的行爲而是以鬥爭的行爲出現的。郭培爾博士曾經這樣說過：「我們決不是理論家。而且也可想成爲理論家。然而我們在作爲對外鬥爭的武器言，却不得不有理論的用意。」這幾句簡短的話，確是扼要地闡明了理論之在宣傳事業中的鬥爭意義。

今天我們常聽說和平建國的宣傳工作，在文字面理論面做得太多。我們認爲這種意見是錯的。今天問題的核心倒不是文字宣傳工作的太多，而是文字宣傳的是否都能配合於鬥爭的意義。文字宣傳要做到發揮鬥爭力量，必須有充分的現實性格，換句話說，必以事實爲骨幹以啓發羣衆對於反對方面虛偽宣傳的認識。

爭取國民力量

目前宣傳事業在文化方面的工作可說是做得相當普遍的，但却仍欠深入。秉承政府和和平建國意旨的文章雖說佔到和平文字宣傳的十之七八，但檢討其內容，是汎論多而具體的建議少。這一缺點，我們認爲主要是政府方面能供給的具體材料太少，多的只是原則和大綱，於是根據之寫來的解釋性文章，滿是一些堂堂皇皇的議論。補救之策，中央宣傳機關應該儘量向各個文化機關提供有關一切政府事業的可能具體材料。俾宣傳文章能做到根據事實的分析，注重歸納性。而非僅僅理論的解釋。

宣傳的最大力量應發揮在那一方面？毫無疑問的，宣傳力量的發揮，是在組織大眾。我們說過當前宣傳事業的最大目的，是在提高國民對於民族生存並和平建國的堅強信心，亦即是在培養國民的力量。但欲使一般大眾都成爲國民力量的構成一份子，這一工作是應該由宣傳事業來負擔的。大眾在未盡理

解建國主張以前，他們對於國家只是一種素材，亦即是總理所常言的一盤散沙。唯有經過國家宣傳的領導組織，始能使大眾形成國民的力量。迄今日為止，我們覺得宣傳事業還僅限於政治文化的上層面，對於一般的大眾，還缺少深入。舉例說，和平固為每個人人民所渴望，但一般人民對於和平的內容究竟是怎樣一會事，恐仍不勝迷惑。他們既不會從理論方面去瞭解和平的內容，僅僅看到幾張標語或一些有關和平的儀式，對於他們只有極消極的影響，有時因實生活的抱怨或由於反對方面的宣傳影響，反致引起對和平運動的反感。這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宣傳事業還僅只做到消極的宣揚。而未積極的組織民衆並使他們成爲參加和平運動的實踐一份子。

組織與煽動

爲爭取廣大民衆對於和平運動的支持並積極參加，我們今天必須使民間宣揚和民間組織的工作取得並行發展。組織民衆的方法，決不是說我們先立許多名目團體，然後拉民衆進來參加。相反，而是我們自己參加進民衆的實際生活單位中間去，運用各種手段將他們組織成國民的力量。

民間宣傳的方法，切忌用空洞的理論，而須利用頗具煽動性格的事實爲宣傳的材料，民間宣傳工作者宜首先對民間的實生活問題有深度且廣汎的瞭解，俾完成他自己就是民間一員的資格，切忌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以教訓式的口吻對民衆進行宣傳。同時爲組織民衆，宣傳工作應度察時地的特情，爲民衆找出一個或數個的鬥爭目標。因爲唯有在實生活的鬥爭中，才能進行組織並發揮組織的力量。此時運用的宣傳技術，就應該利賴煽動的技巧了。煽動決不是一種惡德，只要宣傳的目的是公的目的，煽動實是一種刺激作用的鞭策。列寧會說煽動是一種爭取民衆力量的革命工具。這是不錯的。

宣傳事業的動的性格

民間的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應該注意在工作的過程中訓練出民間的自身指導者。指導者對組織中心力量，應取自民間自身。如果一個組織產生它自己的領導，一個團體產生它自己的指揮者，那麼上層的指導者只須取得下層間指導層的縱橫聯絡，就可自如運用全體機構。同時更可因此而在民間自發地建立廣大的情報網——宣傳事業的另一面。

宣傳工作和組織工作既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這就說明了此項事業的行動的性格。宣傳事業欲求其發揮充分的效果，必須注意其動的性格。這動當然是應該有計劃的，就是說，先確定好某一宣傳運動的中心課題。舉例說，和平運動的宣傳，只是目前一切宣傳工作所應根據的中心。但就具體的施政言，就須要配以一連串的宣传工作：政治面的，經濟面的，文化面的，社會面的等等，而其中還有分列成更具體的問題的必要。

戰略的運用

譬如蘇聯五年計劃的宣傳，五年計劃是一切宣傳課題的中心，但在工廠中，農場裏，學校，文化機關……就根據各自組織單位的特性，而進行不同的宣傳方法，採取不同的煽動行爲。不過宣傳運動的中心目的却只有一個，就是提高勞動的生產能率。及至此項運動產生了史塔汗諾夫事件的典型結果，於是宣傳的技術方針，就馬上捉住這一事件而在蘇聯全邦發動史塔汗諾夫運動。這種戰略的運用，是十分巧妙的。

我們對於行將發動的每一個宣傳課題，必須先具體加以確定，然後遍搜這一問題的實際材料。於是發動全部的力量對這一問題進行宣傳鬥爭，不達目的不休。這即是所謂各個擊破的策略，最善用這一策略的，是德國的國社黨，國社黨對內打倒共產黨，對外打破凡爾賽條約，就是運用的這一戰略。

結 論

對於宣傳事業可說的話真不知有多少，以上不過是隨便一點感想而已。總之，宣傳事業應不忘其主要課題是宣揚並實踐一定的真理，所以宣傳的骨幹應該是真理的事實。組織是其手段，煽動是其方法，行動是其方針。而衡情應變則為每個宣傳事業工作者所應具的本能。（三〇、五、三五）



新中國文化運動的正軌

楊鴻烈

大概誰都知道中國最近二十幾年來即有過一次很爲普遍熱烈的所謂「新文化運動」，記得蔡元培先生自民國五六年間出長北京大學，曾不顧一切的要挺身與自古代沿襲下來的科舉制度所養成的劣根性搏鬥，所以大聲疾呼的說：『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爲天職，不當以大學爲升官發財之階梯。』當時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先生在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尤能以富於情感的筆鋒立志要掃除甚或根本撲滅所謂中國封建思想的謬種與妖孽，於是把一切從西洋移植而來的學術制度便不分青紅皂白都說得盡美盡善，剛巧在國際政治方面，一般人又看到美國大總統威爾遜所發布的歐戰議和的基本條件十四則，伸張人道與正義，彷彿真是救世主復生，怎能不令人頂禮膜拜？而在經濟方面，那時金圓共和國的美利堅的經濟勢力也恰好繼承着英日之後在中國大有發展，還有最可稱爲錦上添花的事便是從前清末季及民國初年拿美國退回的庚子賠款和其他公費派送盈千累萬的留美學生亦均於此時回國，並且在國內的政界，金融界，教育界等也逐漸把握着實際的權威，充分的發揮他們在留學時代所組織的「兄弟會」「姊妹會」的精神。加以杜威博士在民國八年的來華演講，孟祿博士在民國十年的來華調查，都可以視作美國的文化勢力隨經濟勢力而滋長的反映。即在國內的實業家於上次歐洲戰爭時發了大財的也出資派送許多所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學生赴美留學，於是美國的一切一切，便皆成爲中國文化人所心嚮手追之物。我們知道中國民族爲全世界所最詬病輕鄙的事，即是自私自利，因此大多

數的留學生到了美國，怎麼還不受極端發達的物質文明所誘惑？這樣他們回國以後，若有機會乘坐頭等火車，就不肯乘坐二等車；有可以睡安穩的覺的西洋大飯店，就決不肯住比較稍微喧鬧一點的中國旅館；他們有的人根本說不出什麼理由，有的人却很能文過飾非，以為惟有舒適纔可以減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故舒適即是增加生命的力量！謝天謝地！從美國輸入這種新文化（當然可謂之爲「廣義的歐洲文化」）到中國來，中國即開始度著「以十六世紀的生產作二十世紀的消費」！怎能不「民窮財盡」？怎麼不斷喪青年前途有爲的志氣？

如此說來，上次的文化運動只不過掛上一個「研究學術，打倒封建思想」的假招牌，實際上却早就已經陷入了歧途！記得筆者某年曾和一位畏友談過，大意是說從所謂新文化運動發生以後，這二十多年當中，在中國思想史上，大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個人主義猖獗的時代，個人主義是對於傳統集團文化的一種反動。一個集團社會若想在世界上生存發展，必然要產生一種富有集團性的文化。這種文化可以範圍各個人的思想行動，確立了集團的意識和集團的信仰。在社會旺盛的時候，每一個分子都感覺到集團生活的光榮和集團文化的權威，共生，共死，共歌，共泣，這時候個人主義的思想無從發生，即有也無從發展。集團文化成立過久，內容就漸漸變成僵化而失去原始的活力，不能與集團社會本身的發展相應的時候，然後集團中的每一個分子纔漸漸感覺到固有文化的不足維繫人心，而漸漸發生反感，個人主義的思想便由此猖獗起來，在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例是魏晉時代，在西洋便是羅馬帝國末年。這時候社會上充滿了懷疑，煩悶，猜忌，傾軋的空氣，對於傳統文化的冷嘲，對於新理想的彷徨，構成了一個歷史上的虛無時代，所謂「世紀末病」就是指這種個人主義猖獗的時期。中國不幸！這二十幾年中就停留在這樣一個「世紀末的時代」！結果，最大多數的人們所繫心的只是個人的

舒適：卽如何纔能住洋樓大廈？坐新牌汽車？在銀行存款或購買公司股本？與漂亮姑娘偕行跳舞？總括一句話，「享樂」二字實在是自有了上次所謂新文化運動之後纔盛行起來的，固然我們並不反對一般人合理的把生活的水準提高，但只想盡了種種巧妙刻毒週到的方法去剝削同胞的脂膏，以享受所謂二十世紀美國式的物質文明的快樂，我們實在不能不大加反對。我們既處在現今這個艱危無比的大時代，便只有努力去糾正或掃除過去一切浮囂空泛，助長醜惡自私的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文化運動，然後從新建立一個符合於敦厚篤實而且具有集團性的正鵠的真實文化運動，纔足以挽救我國於顛沛危亡之中。（三〇、六、八）

孔子的政治哲學

唐 諤

孔子的思想學說，支配了中國政治社會二千年，他的學說雖涉及許多方面，但主要是政治。因爲孔子的一生大願就是想挽救當時的衰亂，要把亂世變成治世，非從政治入手不可。孔子一生不僅周遊列國，遍謁時君，而且不放棄任何機會。「公山弗援以費，子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著名淫亂的衛靈公夫人南子，孔子也和她見面；甚至有人說孔子在衛國的時候，曾住在衛靈公僮童彌子瑕的家裏。他的學生中頗不滿意於他的那樣亟於用世，他的解釋：「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又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以上均見論語陽貨篇）他絕不像後世的士君子那樣有潔癖。

雖然他那樣亟於求用，但絕不是爲了做官，一看到那裏不能行其道，就絕不顧惜地捨之而去，齊人饋女樂，魯君及季孫三日不朝，孔子即去魯。當時的隱者長沮桀溺譏諷他與其避地，不如避世，孔子的答辯，就是做了人必須救人類。正因爲天下無道，所以他辭奔走，以求用世。孔子的言論中，講修身之道很多，但修身的終極目的是治世。大學上說：「身修而后齊家，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所以孔子全部學說的中心，就是他的政治哲學。如果要講清楚孔子的政治哲學，決非幾千字的短

文所能做到，現在祇能擇幾點重要而足供今人取法的，略爲介紹。

第一是「以身作則」。孔子曾說過：「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他又對季康子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篇）。祇要居上位的人，不做壞事情，人民自然不會做壞事的。在上位的人如果不好，則人民也就不會好了。

所以孔子又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篇）季康子問：「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答復他說：「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論語顏淵篇）。

但是善惡好壞，不是口頭上說說的，居上位的人必須言行一致，然後下民始信服他。大學上說：「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必須自己躬行實踐，才可以責備人家同樣做；自己潔身自好，不做壞事，才可以使人不營私舞弊，否則儘管口頭上叫得很響，文字上寫得很漂亮，很堂皇，沒有實際用處的。

這一番話，用來檢討淪蔣幾年來所提倡「禮義廉恥」的成績，很可以證明新生活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事。「以身令者從」，確是千古不易的定論。

第二是「任賢使能」。孔子是主張賢人政治的，他對魯哀公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蒲廬也。故爲政在人。」（中庸）。政治像蘆葦一樣易生易滅，完全靠人。孟子也說過：「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

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說到賢人政治，固然人君很重要，但單是君主好而不能任用賢能，還是沒有用；反之，如果君主雖不好而能任賢用能，也可以使國家治好。論語憲問篇：「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家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因爲衛靈公雖無道，還能任用賢能，所以不會滅亡。不僅如此，孔子還稱許無道的衛靈公爲賢君，家語賢君篇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如何？孔子對曰：靈公之第四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問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嚚，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嚚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因爲賢人的重要如此，所以能够推薦賢人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比所進的賢人還要好。臧武仲是魯國著名的賢臣，但孔子把他批評得很苛刻，說他是「竊位者」，理由就是他明知柳下惠之賢而沒有推薦他（論語）。同時，孔子又說鮑叔賢於管仲，子皮賢於子產，理由是鮑叔能薦管仲，子皮能薦子產，而管仲和子產，沒有推薦賢於自己的人（家語）。

第三是「教民愛民」。孔子和冉求在路上談政治，提出「恥—富—教」三個階段。有若對魯哀公講：「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使人民休養富庶的道理，和近世培養稅源的

財政原則，非常符合。民力增加之後更需要教導，孔子曾說：「不教而使民戰，是謂棄之，」而必需「善人教民七年，則可以即戎矣」（以上均見論語）。這個道理也和近世最高的國防原理符合。

關於教民的重要，家語有下列一段記載：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孔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尙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軍不能登也；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這種「視民如傷」「如保赤子」的態度，足供今天的政治家置之座右，時時省察。

第四是「崇讓與節儉」。中庸上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但在他自己的言論中，祇推崇堯舜禹文。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大哉堯之爲君，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以上均論語泰伯篇）。「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乎？」（論語泰伯篇）孔子的所以

推崇堯舜禹文，無非是爲了他們能「讓」與「儉」。

除上述聖王之外，孔子又推崇泰伯和伯夷叔齊。理由也是因爲他們能「讓國」。

孔子又說道：「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論語里仁篇）。

讓的反面就是驕，孔子說：「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矣。」

對奢儉之取捨褒貶，孔子曾說：「禮，與其奢也甯儉」。「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這個理由很簡單，「奢」則容易形成「取於民無度」，「儉」始能「節用而愛民」。

這些教訓的提出，也可以使近世的「從政者」服一服清涼劑。

第五就是「砥礪廉隅，養成氣節」。因爲孔子所主張的是賢人政治，當然以培養人材爲第一義。

在論語中時常提到「君子」這樣這樣，「士」如何如何，但都是片段的。禮記儒行篇，孔子對魯哀公問，曾列舉許多「儒行」，可以看到他心目中所認定的治世之才，應該具備何等氣概。現節錄幾項如左：

「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非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

「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瀦，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

「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孔子的政治哲學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窻，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並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

「……身可危也，志不可奪也。雖危……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不臨深以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彊毅以與人，特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

當然，「儒行」的養成，要靠「儒」的本身，但統治者是否有此度量以及願否有育成此種儒風的方針，實有重大關係。

近二十年來的人材凋零，士習頹唐，項城奉化的「一手元寶一手刀」政策，實不能不負極大的責任。今後數十年的中國政治，當然還是所謂大君子的知識分子佔重要勢力，如何「砥礪廉隅」，實為不容忽視的一端！孔子有言：「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家語六本篇）。可資深思！（三一、九、二八）

文化創造與學術精神

吳誠之

自中日戰爭五年以還，表現在我國文化事業上最觸目的現象，是浮囂淺薄氣流的濃厚，與學術空氣的渙散。一國的文化建樹，是衡量國家興衰的不變尺度，而觀測文化建樹，除給人以直感印象的種種生活現象外，我們應該首先找到一個中心，學術氣息的振奮與否，即是我們判斷文化建樹之基本性質的可靠標準。舉個例說，應用科學的進步發達，表現在生活文化方面，固可使人獲得文化進展的直覺印象，但應用科學而缺少純粹科學的繼續研究與探討，它的進步是一定有限度的。所謂格物致知，當爲統一物質的現象文明與精神的實質文明而言。

今天我國文化生活經營的現象，顯然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所謂文化的貧困，即是這種意味。其間的基本原因，自然首當歸於戰爭的因素。我們暫置戰爭條件所予文化發展的物質制約不談，在精神方面，戰爭所予文化的影響，最顯著的是感情的成份取代了理智。欲證實這一點祇要一看近年來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的蓋罩一切的氣概，即能推思過半。因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祇是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它的面積與量的活動，雖然顯得異常熱鬧，惟其內容與質，勢不能超出其目的所賦的限度，結果我們就見到政治性質與宣傳性質的文化愈抬頭，而一般文化的經營，則愈見其貧乏空虛。

這是因爲真正的文化，必然體現一般的生活，文化卽生活，這說法是不錯的。而生活內容的豐富繁複，當決不能限制其於少數特定的目的，否則文化既無普遍發展的可能，欲不陷於貧乏枯萎的狀態，殊不可能。也許有人以爲培植文化也可像培植菓樹一樣，可以用摘植的方法求若干菓實的特別肥

大。所謂去蕪存菁，在文化生活的經營中原也有其價值，但以自然為背景的植物，與以社會為背景的文化，其間的有機性顯有差別。何況即在植物的場合，其去蕪存菁，亦必須顧及普遍施行，否則讓樹上祇有一隻菓子，花園中祇有一棵肥樹，或世界上祇有一座花園人生就將顯得乏味無趣。

其實時至今日，縱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也差不多快到山盡水窮的困境。這與政治的本身要求與宣傳的技巧無關，而是出於生命的要求與理想的憧憬。筆者因為職務上的關係，和一般讀書界比較接近。從多方面的接觸中，筆者深深感到一般人對於政治色彩或宣傳色彩的文化活動，已自熱情而冷淡，由冷淡而竟厭惡，尤其對於公式主義的東西為然。此種現象的轉變，甚至對於無關政治或宣傳的學術論文，深刻的理論研究，都引起了一種不感興趣的傾向。目前一般讀書界的要求，是輕鬆的散文，理想色彩的文學作品，宣傳性質不太過份的報告文學，諷刺的，歷史的或理想主義的一切作品。在造型藝術和表示藝術方面，一般人尤喜歡色彩濃厚與富有刺激性或啓發性的東西。在一般知識方面，科學常識（趣味性的），社會問題與青年問題的解答，各地風物人情的素描，文化報道與作家消息，都是最受讀者歡迎的東西。至於嚴格的社會科學與理論科學，却很難引起讀者興致。

政治性與宣傳性的文化，當有其獨自存在的必要與價值，然而因政治目的而輕視一般文化活動的存在，或甚至阻礙其發展，結果就連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的本身，亦必走上末路。因為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祇是有一定目的的應用文化，它本身並無創造的源泉。一國政治文化與宣傳文化的發展界限，必然取決於其本格文化的發展。否則入不敷出，難免走上捉襟見肘令人望而生畏的窮途去。

最近和平區內的一般文化活動，因人心的要求與文化工作者的努力，較之過去某一時期，確呈蓬勃的生氣，但因戰爭條件的制約，以及浮囂薄淺空氣的尚未肅清，其發展前途，依舊未許樂觀。我們

覺得政府當局與一般國民——尤其是從事文化工作者的人士，應該共同負起樹立新文化活動的責任。在政府當局，對於一般文化的經營，應儘量予以自由發展的機會。當然，政府以其人力與財力，應該進行其本身的文化事業。不過我們希望受政府委託的文化事業經營者，切勿視其專業爲不登仕版的門徑，爲結交官場的敲門磚，甚至包銷營私，祇做些門面上的活動。

至於一般文化工作者，他們所負的責任更重。他們應視他們的工作爲自己的生命，他們應有理想與創造的勇氣，不輕視現實，亦不躲避現實。抄襲風氣固要不得，就是粗製濫造亦不足取。我們不作強人所難的過高要求，不過在生活上有機會從事埋首研究工作的人，應該多多從事深刻的學術研究與修養，不是爲個人，而是爲的文化生命。學術空氣的提高與創造工作的推進，我們認爲是目前推進文化工作的最重要一着。人是惰性的，一般人在現實的苦悶之下，對享受性格的文化雖極感需要，但滿足感官或時流趨向的活動，不是文化工作的唯一目標，適應大眾的要求與領導大眾向上，其間的參酌，應該是文化工作者的責任。如果我們用一句話來歸納這意見，那麼就是：「普遍的文化建樹應不忘嚴肅的精神」。

最後應該聲明的，本文的論旨不在抹殺爲現代國家重要工作一環的政治與宣傳文化的重要性，而祇是在著重一般文化的創造發展，以及學術精神的發揚提倡，應爲一國文化工作之本。蓋卽就政治性的文化工作而論，我國較之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亦望塵莫及。這無非因爲我國的一般文化質量，還遠嫌不够。政治文化所表現的是國家的發言力量，但這力量必得來自整個國家的向上發展過程。從這一點言，注重一般文化的創造活動與培養深刻的學術精神，不僅不與政治文化的目的相違，而且倒是其存在與發展的根本。（三一、一〇、五）

我國新聞事業的回顧與前瞻

孫頌方

誠如新聞學權威威廉博士 (Walter William) 所說：「形成現在之勢力凡三：一曰科學，二曰商業，三曰報業。科學之發達可使相處窳遠之人類近如咫尺，可使四海之內成爲一家；商業之能力，可調劑各地出產之盈虛，報業則能使世界人類之思想，互相交換。苟商業與科學而無報紙爲之宣揚，則思想無從交換，科學與商業，俱不能發達，而世界大同之目的，亦難實現。」新聞事業的重要，隨着時代的需求，在人類底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上，充分發揮它的現實性，以及報道與指導的機能，已經是不可爭的事實了。

在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限度，比世界任何一國爲廣，而它所負的任務，更因中國在國際關係的縱橫裏，占有特殊的地位，愈爲重要。

以人口的數量言，中國擁有四億五千萬的民衆；以幅員的廣大言，中國擁有一千一百餘萬方里的土地；一份報紙若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一千一百餘萬方里上的四億五千萬民衆，它在人類底政治生活與日常生活上所發生的影響，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所憾者，中國的新聞事業從漢唐以迄於清，以邸報爲中心；在這期間，全國統於一尊，言禁甚嚴，人民沒有論政的機會，直到清末才有外報與民報的興起，前者給人民貫輸了一些科學商業知識，後者予人民以政治上警覺，開人民論政的嚆矢。然而，爲時太暫，加以經濟上的限制過大，漸漸地趨向營利之途了。直到今日，中國在新聞事業的發展上，還是一片待墾的沃土。

儘管官報獨占了中國新聞史的什九，造成人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愚昧心理；儘管外報怎樣利用它底特權，操縱中國的政局，推行它底殖民政策；然而，隨着客觀環境的要求，以人民為中心的報紙，終於在外侮日亟，內政窳敗的清末出現了。而且就憑靠這些澎湃似潮的民報底影響，普遍深入民間，完成了中華民族底空前大業——辛亥革命，這是中國新聞史上光榮的一頁。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報人反對帝制恢復及軍閥割據的鬥爭，同為不可磨滅的偉績。

戊戌維新運動中的報人有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以「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清議報」「新民叢書」「政論」「國風報」（最後三報係梁啟超亡命日本時所辦）等為發表言論機關，提倡立憲政治，鼓吹大同思想，不幸在守舊派的見忌和慈禧太后高壓之下，同歸消滅。從容就義的六君子：譚嗣同，林旭，楊銳，劉光第，楊深秀及康廣仁。而康梁僅以身免，亡命海外了。

但是，民氣不是高壓所能消滅的，繼之而起的有「蘇報」「民呼報」「民立報」「經世報」等，澎湃如怒潮，而不可遏止。主持其間者有汪精衛，胡漢民，宋教仁，戴天仇，章太炎，于右任諸氏。在清廷的天羅地網中，他們所遭受的不外是拘捕，監禁和出亡。然而，他們底主張與精神是一貫的，此仆彼繼，再接再厲，以辛亥革命的完成為最高的任務。

從中華民國成立到十六年北伐的完成，其間有兩度帝制的倏現和北洋軍閥的割據，當時的報人，乘着戊戌維新及辛亥革命的傳統精神，豈能默爾而息，於是，操秃筆以前驅，而盡報人的天職。其中殉職的有黃遠生，林白水，邵飄萍諸氏，都是中國報人的先烈。至於十六年北伐的完成，全國報人一致響應之功，更屬不可湮沒。

中國新聞事業雖有上述的光榮傳統，然而默察現狀，展望將來，我們非但不能以過去的光榮傳

統，沾沾自喜，且欲不斷地加以檢討，而勇猛精進。

對有中國新聞事業的前途，我們是該抱着極大的信心的。誠如新聞學權威廉博士所說：

「中國之新聞事業，將來極爲有望，並獲良機，以實現真確之輿論，爲社會效力。卽自經濟及教育以言，可爲之機尤衆。今日不過其發端，橫逆之來，乃筭路藍縷時所應有。觀乎其東隣日本之情形，亦有嚴酷之報律，然並不足以礙其追步歐美，而反以此爲特點。於此，吾人可言，中國新聞事業之發展，可以持日本之過程以推測之也。」

憑着這個信念，我們對於中國新聞事業的前途該作怎樣的展望呢？

○發展地方報紙 中國新聞事業以上海一隅而論，已經部份地走上了現代企業的大路。這是新聞紙的物質基礎，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今日，一個報紙若沒有大規模高速度的機器，任憑在精神條件上擁有怎樣優秀的人才，也無法克盡它對於人類政治生活及日常生活的責職。

中國新聞事業有一個畸形現象：上海以全國商業金融及文化心臟的所在，同時人口衆多，邇近首都，它底報紙幾至控制全國的地域，相當地握有全國輿論的中心，這是其他各國極其罕見的現象。在美國，紐約的「每日新聞」雖然擁有近二百萬份的銷路，但是，它決不能侵犯到「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網，因爲它們各自是一份完備的報紙。芝加哥的讀者可以把紐約的「每日新聞」當作參考，而非必要。但是，上海的大報幾乎成爲全中國讀者必要精神食糧了。要一份偏處一隅的報紙影響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及日常生活，是一樁不合理，不可能的事，尤以中國人口之衆，幅員之廣，更屬不合理，不可能。

對於地方報紙，我們要提出兩個至低限度的要求：從一般方面而言，地方報紙應該全力以赴地做

到一份完備的報紙，否則漢口，廣州，或天津……的讀者，若非看到上海的報紙，就覺得無以釋然，這並非說，上海的報紙已經達到理想的境地，而是比較地完備而已。從個別方面而言，地方報紙應該全力以赴地做到它影響所及的區域的代表報紙，換言之，就是加重地方色彩，以補遠地報紙的不足。

⑧ 培養健全報人 人是事業的中心。在中國報人的浮沉錄中，我們時見老成的凋謝，而後進的崛起却極少。因此，黃遠生先生的殉職，戈公振先生的病逝，就成了中國新聞界無比的損失。我們要培養黃戈兩先生那樣忠於職守，勤於治學的新人，來担负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大任。培養健全報人的最大途徑是普遍地實施新聞教育。環顧國內，以一個報館的力量担负起實施新聞教育的責任的，尙付闕如。我們建議，除了大學裏設有新聞學系或新聞專科以外，新聞函授學校的設立實在是刻不容緩的急務。因為對於新聞事業有信心，有興趣的青年，未必個個有力深造，而函授是唯一的補救方法。以中國幅員之廣，假使函授學員能够普及全國，不但報紙的地方通訊可以編得有聲有色，而且，對於地方報紙的發展，也儲備了大批的生力軍，豈非一舉兩得！

不過，培養健全的報人，實非易事。人生有三種職業是不能輕易決定的。一、醫生，二、律師，三、新聞記者。自己若不潔身自好，即將貽患國家，貽患人類，戈公振先生曾經說過一句沉痛的話：『從事報業，須以興趣爲前提；服務報業，須以人格爲要件。』環顧國內報人，個個應該有黃遠生先生去國時痛下「罪己語」的精神，何況在修養上，與黃遠生先生的距離，又是那樣的遠呢。

⑨ 最後，我們要提出的，一個理想的有力的報紙，要做到成爲一個運動(Campaign)的中心無可諱言的，報紙應該有政治性及宗傳性，以實現它所懷抱的政治理想，所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行遜」，就是這個意思。不過，人類的生活是多方面的，政治只是其中的一面，人類需要較

高的文化生活。因爲它更富於永久性。因此，報紙的更大職責在於文化的推動，使人類生活得更合理，更圓滿。

在先進國家，如日本，及英美，一個報紙的力量與影響，全視它能否成爲一個運動的中心以爲斷。

在政治上，如保障人權；在文化上，如普及教育，這是兩個偉大的運動。報紙應該竭盡所能，傳達民間的事情，促起社會的注意，以底於成。

以今日的情勢而論，一個關係中國，東亞及世界的偉大運動在邁進之中，報紙應該怎樣發揮它底功能，成爲這個運動的中心，這實在是今日中國報人的最大課題。（三二、一、一八）

從文化交流談到反英美的思想戰

唐士匱

什麼叫做文化的交流

『天下，海內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按照古時的解釋，中國就是世界的全體，四境皆環以海，所以稱爲天下外及四海，而中國爲海內。用現代的眼光來解釋，所謂天下或四海，是世界的全體，而中國只是世界的一環。

世界本來是人類的大家庭，由於地理和歷史的分野，就形成了各個獨立的民族。它們各具獨特的生活型式，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和風俗，而文化就是人類諸行爲的總和。

世界既是人類的大家庭，這個大家庭裏的各個單位（民族），任憑在地理上怎樣遠隔重洋，在歷史上怎樣各營其生，還是脈脈相通，彼此影響的，於是有文化的交流。

文化交流的最大目的是：各民族分別貢獻出本身生活型式中最精華的質素，經過攝取，克服與統一的過程，各自充實自身的生活內容，進而使全體人類生活得更圓滿，更合理。

日本怎樣吸收外來文化

在文化交流上，日本最能吸收他族文化的精華，把它們織入國民生活的纖維之中，導引一個正確

從文化交流談到反英美的思想戰

的方向，匯集成一個新的文化實體，轉而影響其他民族，貢獻全體人類。

日本以自身原有的文化爲基礎，接受了亞細亞精神兩極的中國與印度的思想與文明，予以濾清及批判。首先予日本國民以不朽的感化的是中國的儒教。

在中國，儒教就是孔子之道，叫人怎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種道德與政治哲學。傳到日本，就真能使日本的國民道德向上，進而爲政治實施的指導原理，士人持此以修身，諸侯持此以治國，一時蔚爲風氣。菟道稚郎子的自殺，就是悲壯地證明了日本人民嚴格忠實地奉行了孔子之道。

其次，是老莊的思想，也予日本國民以極深的感化。『日本國民愛枯淡閒靜之心，愛寂味愛澀味之心，實在都是得自老莊和禪。此種心情在可稱爲國民藝術與宗教的茶道及花道中，由一杯茶味而及全人生，由一輪花賞而及全宇宙之美，直到今日，還予國民以幽玄審美的修練。』（請參閱大川周明博士著「日本二千六百年史」）

再次爲印度文化精華的佛教傳到日本，佛陀的福音中所含有的一切要素，都得登峯造極，直到今日，仍不失爲規範國民宗教生活的一種信仰，甚至與工藝及藝術的發展有關。

以上是日本吸收東方文化的成果。至於西方文化，首先傳入日本的是基督教，以五十年的傳教工作，從神道，儒教和佛教的教徒中，爭取了百萬以上的信徒。到了豐臣秀吉因教權侵犯政府，下令禁制的時候，基督教的根已經深植於日本國民之中。豐臣秀吉逝世以後，德川幕府的壓迫妨礙，有增無減，終於發生了「島原之亂」與「有馬村起事」的殉教悲劇。犧牲者達二十七八萬人。日本基督教徒的堅信，誠實和獻身，其熱烈和純潔，在世界的基督教徒中是可歌可泣的。他們拒絕了伴隨着宗教而來的政治影響，而吸收了它底精神，使它成爲本色的宗教。賀川豐彥就是現存基督徒中以宗教的精神致

力社會事業的一人。

因爲這一殉教的悲劇，德川幕府對於一切西洋文化，加以禁絕。直到明治維新之際，日本又在「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與統一力量」之下，廣求世界的知識了：從英國學習海軍；從法國學習政治（盧梭民約論予日本的憲政以極大的影響，即其一端）；從德國學習陸軍，醫學與工程；從荷蘭學習航海術與造船術；從美國學習航空與商業……而這些都是日本成爲一個近代先進國家所不可缺一的條件。

日本著名的「海軍兵談」上有一句話：「仔細想來，自江戶的日本橋起，至中國而荷蘭爲止，是一條毫不隔絕的水路。」世界本來是一體的。日本從東方文化裏吸收了精神原理，從西方文化裏吸收了科學知識，再配合她自身一種謙遜和堅韌的精神，蔚爲今日的大國，不啻是近代史上的一個偉蹟。一位駐節東京的德國大使考爾夫博士曾經說過：「實際上，世界智慧的潮流，的確都已趨向於日本了。」假使這一支流始終不逆轉的話，日本不但是「亞洲文化的博物館」，也將進而爲「世界文化的博物館」了。

英美文化的侵略性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由於內在經濟上的要求（推銷剩餘商品與攫取資源地帶），就得用武力向外擴展，而弱小民族及生產落後的國家就成了擴展的對象。

英美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兩大主流，尤其是英國，擁有世界上最廣大的殖民地，她們對外擴展的主要目的是經濟，而以軍事爲手段，再以文化鞏固之。

就以中國爲例罷。近百年的中國史，從敗於鴉片之役起，所謂「天朝」（這是清廷不明世界大勢的妄語）的「銅牆鐵壁」給英美帝國的大砲轟毀了，於是，以「江甯條約」開不平等條約的嚆矢，向中國大陸撒下了天羅地網；割地，賠款，開商埠，設領事，賠商欠，定稅則，以至駐兵等，取得了軍事上，經濟上的優越形勢，猶以爲未足；還要取得自由傳教權，作普遍深入的文化侵略。「如中英天津條約」上就明文規定：『耶穌聖教暨天主教原係爲善之道，待人如己。此後，凡有傳授學習者，一體保護，其安份守己者，中國官廳絲毫不得苛待與禁阻。』

英美對於中國的文化侵略，就是一種「心的征服」。所謂「攻心爲上」，宗教就是一塊敲門磚。試看中國的大小城市，幾無一沒有教會學校的設立，甚至窮鄉僻壤，也有傳教師的蹤跡，當然，也有教堂。因此，英美傳教師的蹤跡所至，也就是英美商品推銷所在，這是指就經濟意義而言。至於精神上，英美把宗教的毒汁灌輸到中國人民的骨髓裏，來麻醉人民的意識（國家的與階層的），使他們忘却現在的痛苦，從追求「天堂」中的縹渺的幸福上求滿足，找安慰。

百年來，英美的文化侵略，在中上層的中國人民當中，造成了一個買辦階級，使他們忘記了國族的利益，而以個人的利益爲務；於是，不僅爲虎作倀地替英美帝國榨取同胞的血汗，甚至喪心病狂地反對抵制外貨，促成軍閥內訌，以至喪權辱國，無所不爲。至於大多數的下層民衆，宗教的麻醉使他們變成愚夫愚婦，連自己最後的一滴血都將給吸盡，還不自覺。但有一點，上自買辦階級，下至愚夫愚婦，是共同的：他們都承認英美在種族上的優越性，天賦是治者的民族，而自身是被治者。

『哀莫大於心死』，英美帝國在中國的最大「成就」，就是對於中國人民的「心的征服」，也就是文化侵略的蓄意所在。

反英美的思想戰

戰爭是長期化了，我們應該有作長期戰的準備。

在目前，所謂英美勢力，就有形的軍事，政治及經濟三方面而言，一年多來，已經在日本的戰果之下掃蕩無餘，今後的問題，就是怎樣確保戰果，完成勝利？至於無形的勢力，就是英美侵略性的文化，根深蒂固於東亞人民的心裏，非加以澈底廓清不可。

中國大儒王陽明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話：『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英美的文化侵略是處心積慮，細針密縷的，欲求其全部的消滅，決非空喊口號，張貼標語，所能一蹴而成。

因此，反英美的思想戰，實在是當前的急務。首先我們要從本身思想的統一及純化出發，洗清英美文化的浸沉面，克服一切已成的習俗，進而歸還東方文化的本來面目。否則，即將重蹈上次大戰中德國的覆轍，雖然在軍事上未曾喪失寸土尺地，而在最後一線（第四戰線）的思想戰上，以慘敗下場。

在這裏，筆者願意提出反英美思想戰的兩個重點：

（一）我們不能再蹈義和團時代的絕對排外主義。當時的滿清，內政窳敗，外交無能，弄得民怨騰沸，不可遏止。清廷的一般守舊份子以慈禧太后爲首領，對於國權上的奇恥大辱，責無可道，於是轉嫁移禍，把一切責任，輕輕地推到吸收外洋知識，模倣外洋制度（雖然是非常不澈底的）的維新份子身上，對於「義和團」的原始性的農民暴動，竟推波助瀾，恃此而對外正式宣戰。迷信那裏能够敵得過鋼彈，「扶清滅洋」的謬舉終於造成了空前的大慘劇。

我們不能再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的今日，再妄演「知識上的義和團」。英美帝國的侵略，尤其是文化侵略，決非消極地排斥所能抵制的，而且，我們也無法阻遏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只有批判地接受，轉而豐富自身的文化，才是唯一的途徑。

(二) 我們不能抹殺英美文化的優越性，在技術上，科學知識的運用，身體力行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做效的。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迄於今，可以說，一部份是受英美文化之賜。爲什麼日本接受了英美的文化，發憤圖強，終於實現，而中國反受英美文化的貽禍呢？小泉八雲曾經說過一句話：『在日本，你可以看出世界文化的大成，但是，無一不表現日本自身的真精神。』

只有通過科學與力行，才能使國粹發揚光大，這裏國粹兩字，就是中華民族在物質上與精神上對於人類的貢獻，而這種貢獻還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

結語

戰爭只是人類歷史躍入一個新階段過程中的暫時現象，「世無百年的戰爭」，人類的正常關係終久要恢復的。

我們要肅清的是英美文化的侵略性，而非英美文化的全體，更非英美國家的存在。

總之，世界是一體的，隨着交通的發達，接觸的頻繁，世界愈縮愈小，文化的交流却愈趨愈暢。在進行反英美的思想戰中，我們應該持有一個信念，假使我們東方人能够真正地的東西文化融會貫通，一定可以爭取到世界文化的中心讓全世界的人們沐浴在一個新的文化底光輝裏。(三二、二一、八)

致日本知識人士

吳誠之

在日前本市文化界同人招待日本作家林房雄氏的席上，曾有人提及林氏最近的一首詩作，林氏詩的內容是：

頭顱在阿拉斯加，

腳趾在馬來亞，

這之間的黃河，

是煩惱的世界。

所謂黃河是煩惱的世界，意義是非常明顯的，換句話說，就是指中國問題的煩惱而已。因而席間諸人會相次就這煩惱問題發抒意見，大體上都認爲今日這一煩惱問題，已早不在於理論，而在於現實。至少就中國的知識人士而言，他們對於理論的理解性，是決不弱於日本的知識人的。不過中國知識人以及一般人民從現實上所能證實的理論，其經驗恐非日本的知識人及其人民所能體味，這不僅是中日文化溝通前途的問題，且是「黃河是煩惱世界」的整個問題關鍵所在。

這裏不想將席上的談話再予覆述，不過我們總覺得日本知識人對於目前中國的瞭解，尙不脫片面的階段。如果要舉一個例，我們不妨將日本作家片岡鐵兵氏於二月號「現地報告」雜誌上所發表的「告中國知識人士」一文來檢討一下，片岡鐵兵氏在同文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致日本知識人士

「今在和平地區內任職於國府各機關之知識人士中，尚有抱懷疑或思想不安定者。事實上在國府方面任職或協力國府政策者，其是否按其本身之良心而行事，若更進一步言之，即其良心是否肯定建設大東亞之思想，此種自感不安者，或不乏人。」

就一個日本知識人言，對於中國的知識人抱有這樣的疑問，自有其理由。但就中國知識人的觀點言，他們縱承認這種疑念有其根據，不過他們並不認為是甚麼思想問題或良心問題。和平建國的思想不是甚麼新穎的東西，欲加理解並非難事，而對建設大東亞的思想，中國人傳統思想就向來主張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的，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和日本的八紘一宇思想並沒有甚麼不同。

那麼中國知識人的良心又怎樣呢？片岡鐵兵氏曾謂：「論其良心何以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不相符合，其原因厥在缺乏智慧及信賴日本之勇氣，同時認為日本係藉大東亞為美名而侵略中國。」片岡鐵兵氏的坦白論斷，頗足佩服，但假定中國知識人的良心今日確與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不相符合，然其原因則並不如片岡鐵兵氏所解的。

所謂缺乏智慧，可暫置不論；至於缺乏信賴日本的勇氣，此一問題實有多方面的看法。就日本知識人言，他們對於自己國家的崇高理想，自必應加接受信仰，可是今日中國知識人的煩惱，信賴他人的勇氣是其次，信賴自己的勇氣乃其本。片岡鐵兵氏曾謂人類之本性似極難信任他人之純潔，若干中國人對日本之純真目的所以懷疑，乃出於人類最卑劣的本能，而謂中國之知識人，除一部份革新份子外，尚未提出內心鬥爭的課題。

但吾人願為日本知識人士告者，中國知識人確已提出其內心鬥爭的課題，其屬多數人或少數人雖不得而知，然彼等內心鬥爭，則無日不在苦鬥之中。而此所謂內心的鬥爭者，直言之，即彼等所欲接受

之思想與事實之揆異是。吾人敢言中國知識人在理論意味上，對於日本從事戰爭之真意與目的，概能瞭解，而所惶惑者，乃在彼等身受目睹之種種事實。

日本對中國並無侵略意圖，在理論上中國知識人無不樂意接受。片岡鐵兵氏曾謂其在去年來華時，在其所遇日本人士中，敢保證決無一人吐露侵略之意見，此就吾人所接觸之日本人士間亦有同感，吾人且嘗遇見熱烈同情中國處境之友邦人士。

然懷此公正見解之日本人士，仍未可得言其已澈底了解今日之中國。要知今日在中國之日本人士，其所見所觸，與中國人民本身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觸，實頗多異趣之處，即就日本來華知識人而言，彼等足踏中國境界，其行動自由與生活境遇，與其在國內時可無大差異。彼等旅行遠較中國人爲方便，彼等所受之待遇遠較中國人所能企望者爲優。這都是日本知識人不能感覺而中國知識人有所感喟者。不過這決不是說中國知識人士和一般人民不能爲大處着想，從而缺少爲成全目的而犧牲的精神。片岡鐵兵氏雖有認爲中國人對於同甘共苦，有一同甘則喜，同苦則敬而遠之的樣子，惟實際則中國人確在負担犧牲中，祇是對於其犧牲的價值，往往有難言之隱痛吧了。

我們願正告日本知識人士，目前站在和平陣綫上的一般中國知識人，是能够瞭解大東亞戰爭的目的，且願意爲這一目的而奮鬥的，他們對於理論性的理解非常充分。然而他們與日本的知識人一樣，亦懷有堅強不動的愛國心。日本人士中還有一部份人似乎認爲中國人缺少愛國心，這是錯的，是受的過去英美人侮蔑中國人的偏見影響。中國人愛國心的表現雖不盡與日本相同，因爲中日兩國的國體根本不同，但其根本的愛國熱情，是絲毫不弱於日本的，尤其是現代的中國知識青年。

中國人不僅有愛國的良知，且更有愛普遍人類的美德。這有時也許表現爲中國的弱點，然而中國

人的人性愛，却正可以在這裏獲得說明，從而中國人的愛國思想，並不屬於狹義的愛國主義一流。然而中國人的人間愛是根據怎樣方式產生的呢？一言以蔽之，是對善與惡的直覺。英美帝國主義縱在政治，經濟各方面壓迫中，但要是個別的英美人在與中國人的接觸中顯示善，那麼中國人就具有明白分清人與政治間的判別，反之，個別的人而爲惡，則整個政治的善即將受其影響。因爲一般人判斷個別的善惡容易，個別的善惡切近現實，容易造成人的直覺印象。至於理論的，政治的善惡，是非具卓識不可的，其基礎也在個別善惡判斷的直覺。

我們這一番說話，也許還不够直率，可是我們認爲是足夠使日本知識人理解的了，中國知識人目前所需要的不是單純感情意味的同情，而是真摯的，深刻的理解。中國知識人亦相當理解日本知識人所處的困難，但我們希望有機會到中國來的日本知識人，能在在華日本人自己的圈子以外，以及在大旅館大飯店的宴會之外，更深入中國民間來體會中國人現有的處境和心情，並希望他們能將他們所見所觸的各種事實，傳達給在日本國內外的日本人。這我們認爲是中日文化溝通和解決「黃河是煩惱世界」問題的關鍵。

根據這一希望，我們要求來到中國的日本知識人，切勿自以爲來到中國的任務是在宣傳日本的文化或主觀的甚麼。他們希望中國所能接受的，必須先從對中國的認識中帶回一些去。因爲我們一再說過，在理論上瞭解日本，在中國的知識人是容易做到的；而現在中國知識人所要求於日本知識人的，是希望他們暫時放下理論，來清清楚楚，公正的，理智的，觀察一下中國目前所處的實情。中國知識人正熱烈的伸出雙手願求日本知識人的合作，兩國知識人到達真正的理解與合作，而使此種合作與理解融合爲真正的民間溝通，那麼便是黃河煩惱解決之日。（三二、二、二三）

貢獻於時代的報人者

孫頌方

解題

吉卜賽是一個深知報人甘苦的詩人，曾經在一首詩裏，描寫報人們在深夜的緊張之中，怎樣辛勤工作，跟時間搏鬥；又怎樣在工作完畢之後，沒有倦極歸家之前，像那班清晨上寫字間的人們，從容不迫地點上自己的烟斗，檢討當日報紙編排的得失，計劃明日的改進；有時縱談忘倦，還各自說出悠悠的夢境來。那時候，人們正在好夢之中，一日的行程尚未開始，而他們已經替人們安排好一日的精神食糧，並且籌劃明日的精神食糧了。所以他說：『他們時刻睡在人們的心頭上。』

新聞報紙是一個民族的，甚至世界的生活中活潑潑的力量。一個有正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報人，是應該有終其生值得憧憬和追求的遠象的。但是，爲什麼要冠以「說夢」兩個字呢？

現實環境的一切本來就難於使人滿意，而深思敏感的報人，更感覺到週圍是一片淤塞，於是，就從這着力挖一小孔，說出自己悠悠的夢境來，私心中以爲夢境必有實現的一日。那班身在陽光之下，心在暗角埋葬的人們，還以爲這是癡人說夢呢。假使夢境果成事實，做一次癡人又何妨。

生死不渝的理想

沒有靈魂的報紙，雖出千百年，充其量，人力物力的浪費而已；反之，有靈魂的報紙，雖只與世

人作一短期的謀面，也會予人類歷史以不朽的影響。

一個報人，不但自己應該有一個爲它而生，假使必要，也爲它而死的理想；同時，必須做到，使那千千萬萬直接或間接受到它的教養的讀者羣衆，具有這個理想，使他們能够在日常生活與政治生活上實踐起來，推動這個世界，走向更圓滿，更合理的境地，當然人類的生活也跟着更圓滿，更合理了。

偉大的法國文豪巴爾扎克說過：「拿破侖用刀所完成的，我要在文學上用筆來完成它。」是的，一個報人的鬥爭武器，就是：如刀之筆。

新聞學權威魏克漢·斯蒂德在「論新聞紙」一書中寫過：「早在一九二二年，拿破侖百年祭的前幾個禮拜，我問福煦將軍（他對於拿破侖的認識，在協約國將領中任何一人之上。）若以拿破侖取他本人在大戰結束階段的協約國或聯軍總司令的位置，會不會有更好的表現；否則，就是現在的複雜環境使拿破侖變得渺小了。福煦將軍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在大戰期間，每過拿破侖之墓的時候，就時常想到這個問題，得到一個結論：以拿破侖無限的韌性，他可以憑此一點，在六個禮拜當中，熟悉現代戰爭的環境，進而發明一些新戰術，覓出一些新巧計，予敵人出其不意的打擊。」」

這是一個空前的多采多變的時候，作爲一個報人，要以非常之才，盡非常之任。有人甚至這樣誇張地說：報人是天生的，而非人爲的。我們需要的報人要像拿破侖那樣的有天才，有韌性，一個戰鬥者的報人。

一個社會制度及生活秩序，儘管當初是推動世界進化的，但是，現在，它已經盡了對於時代的任務，反而阻礙進化了；換句話說，當初它以進化性否定舊制度，舊秩序的，現在，到了它否定自身的

時候了。

樹枝上的枯葉一天不跌落，新葉的嫩芽就一天不能生長；一個制度與秩序，愈到否定自身，形將沒落的時候，就愈加拚力掙扎。在這個時候，有世界眼光的報人，應該盡情地揭發它們的醜惡和腐爛，讓他們赤着身子給人們看，讓依附它們的寄生蟲，不重新做人，就自取滅亡，這是消極的一方面的。

至於積極的一方面，有世界眼光的報人，應該是新制度與新秩序的催生者，不但要「睡在人們的心頭上」，更要站在人們的前面，透闢理解新興一代的要求，把他們心中蘊積的思想表達出來，引導他們走上嚮往已久的道路上去。

新聞道德與事業前途

新聞道德是報人的第二生命。

根據客觀事實的要求，把值得刊載的新聞刊載出來，愈富有新聞性愈好；隱蔽或曲解，都是不可恕的罪過。報紙應該是公衆的僕人，但凡對於公衆福利有貢獻的，也就是它應該效力的；它不阿諛公衆，討好讀者；一個忠實的僕人，應該把真情實事告訴他的主人。

魯迅先生對於報人不守新聞道德一事，曾經痛下鍼砭：「牠（指新聞的威力）對甲無損，對乙却有傷；對強者，牠是弱者，對更弱者，牠却還是強者；所以，有時雖然忍氣吞聲，有時仍可以耀武揚威。」這就是活畫了十里洋場上一班敗類報人的兩副臉譜。黃遠生先生於民國四年去國時，曾經大聲疾呼，力誠一班報人痛下「罪己詔」，也是因爲目睹當時新聞道德的掃地，有感而發的。

從新聞道德的建立與發揚，可以連想到：一個具有遠象的報人，他所爭取的，不僅是報紙底營業

的前途，更是事業的前途。

在不影響事業前途的原則之下，原可努力於營業的前途；反之，爲了爭取報格，有時，勢必遭到反營業性的威脅；但是，在健全的社會里，這兩種前途是相成的，而非相毀的。

新聞事業的蠱虫是利潤的貪婪者，廣告的兜攬者和發行的市儈。

爲了攫取非法的利益，他們可以把一份擁有廣大讀者羣衆的報紙，徒供少數違背民衆利益的野心份子所利用；可以記載誇張歪曲和毒害的黃色新聞；可以刊登侵犯新聞，甚至牴觸新聞的純商業性及欺騙性的廣告；可以……因此，向以獲得全部自由見誇的英美報紙，由於被操縱在新聞「托辣斯」的手里，完全採取營業本位的路線；現在，已經覺得真正束縛牠們的，還不是國家的檢查制度，而是成千成萬的廣告戶，他們可以左右報紙的新聞，甚至評論。

一個國家的靈魂應該握在宅底報紙手里，但是，報紙本身已經受制於少數的金融寡頭，它不但不能闡明真理，教育民衆，反而，伸出爛潰的毒爪，戕害國家的靈魂了。

巴爾扎克曾經慨乎其言地說：「新聞紙本來應該是一座神社，倒反變成一件工具，再由一件工具，變成一筆買賣了。」這就是英美新聞事業的寫照。而我們是要走相反的一條路的。

生活教養的再提出

就一般的情形而言，報人往往受到社會人士較高的評價和尊重的。因爲報人供給了精神的食糧，指示事態的動向，慰藉大衆的心情。

報人本有「無冕帝王」及「布衣宰相」的尊稱。然而我們的報人，在認識上，在技術上，能够趕

得上時代嗎？能够受之無愧嗎？

蕭伯納曾經這樣地批評過英國的報業人：

「報館的編輯室簡直是一間牢房。再怎樣認識清楚的編輯，一入其中，就難免不與世界隔絕。什麼政治集會，科學演講，音樂演奏，甚至數小時的聚餐，都因為工作時間的限制，無法參加。今日的新聞紙，因為編輯們的「隱居」，落在時代背後的二十年。而燈塔上的看守者，因為有無線電的設備，是應該遠較一般人先知先覺的。」

這情形，又何嘗不能應用在今日中國報人的身上。報人因「隱居」而落伍，固然是太可悲的事，尤其可痛的，是一般以報人爲幌子，爲害社會，與人類。一個最壞的醫生，頂多戕害了數十人以至百人的生命，就逃不了法律的制裁；而一種最壞的報人，其影響所及，何止於千萬人呢。

然而，真正有作爲的報人，是應該充實生活教養，準備起毛瑟三千，如刀之筆的。（三二、三、一）

肅清文化的沈滓

鄭無籍

上海是全國文化活動的中心，也是全國經濟的總動脈，但同時，也正是更凸出更光怪的一個殖民地的剪影。這反映於文化方面的，就是在地主的封建文化之外，還有一種可以說是買辦文化。前者代表頑固落後的舊傳統，而後者比較具有一種圓活變化，善於投機的性格，而這恰恰投帝國主義者之所好，且從而控制之，利用之。因為帝國主義者是最希望我們既不過於保守，也不十分前進的！前進了，固然於它的統治有妨礙，但若果過於保守落後，則對它也有接觸方面的極大不便。然而這樣的局面一造成，我們的文化的命運，是落到更大的可憐與悲慘中了；我們的眼光，就為一種厲害的商品觀念所蒙蔽和麻痺。

自然，在眼前的社會機構裏面，要想文化完全和商品絕緣，是不可能的。可是縱使如此，我們也還有一個理性的節制，道德的約束。而不幸的是，在今天有許多短視的出版家或文化人，他們正和政治上的貪官污吏，商業上的巨賈豪閥一般，他們活動的目的，只要有利可圖，就什麼也顧不了。換言之，市僧主義的風氣已經瀰漫於上海的文壇之中，而作為它特色之一的，便是色情文學的趁機起哄——而特別是近一二年來，這些文化界的沈滓的泛起，更令人覺得「目擊心傷」。

我想，以上海淪為孤島以來的戲館、酒吧、賭窟和飯店的蓬勃林立，一切消費享樂的事業的發達，而一般小市民又怎樣的瘋狂沈湮的現象，來說明色情文學之所以充斥的理由，大約是很愜當的。因為

它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性：在麻木了的，或衰弱了的神經裏面，需要一種奇異的刺激。這正如有一時期的「熱血沸騰」的青年，愛讀武俠小說一般，但這種心理，至少還可以說是純潔上進的，而眼前的製造色情文學以及它的愛讀者，却令人說不出有同情，原諒的道理。

遠在十餘年以前，有一位作者已經感到上海灘上色情文學之風行了，他曾經有一段很精闢的話：「我終於是一個中庸主義的人：我很喜歡閑話，但是不喜歡上海氣的閑話，因為那多是過了度的，也就是俗惡的了，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爲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見周作人著談龍集內「上海氣」一文）

他把這些文學簡稱之爲上海氣，並且以爲「上海氣之可厭，在關於性的問題上最明瞭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褻而在其教正。」這是不錯的。我們只要看這些色情文學作者的態度，有時固然是極其的油滑輕薄，有時却又極其嚴肅，譬如男女兩性的肢體本來是一樣的簡單平凡，但他們一寫到女人肢體的任何一部分時，却會得加上許多惡俗的描寫。當寫到一個男子的宿娼和一個寡婦的再嫁時，他們又要將責任分得異乎尋常的輕重，而且他們承認女子是應該被男子消遣，調弄，而性交的權利，是只有屬諸男子——而且是官紳階級的。他們笑罵道學家的拘泥虛偽，但在骨子裏，他們還是跟道學家二而一的。總而言之，他們就是將平凡看作嚴肅，而應該嚴肅的，却又化爲浮薄胡鬧，他們的目標便是想努力的把兩性關係弄得離奇，而離奇的事物也必含有刺激性，於是乎銷路就「不脛而走」了。

色情文學的可惡，還是在於這些文字的空氣，和作者的思想與態度。如果僅僅寫上一點生殖器，

性交之類的字眼，那在生理學家或醫學家的著述裏面，就多的很，而且還是無法避免，我們決不討厭，而討厭的是，對於兩性問題，他們一定要加上許多不必要的渲染，刻意的挑撥着庸俗的讀者的趣味與感情。換言之，他們不過向跳舞廳，紅倌人搶生意而已。——因為他們的製造色情文學，完全為的是「生意眼」，所以我這樣說，並沒有怎樣刻毒的地方。

在事實上，我們倒需要談一點關係兩性間的文字。孔子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性的問題，正占據着我們的人生一部分。但這裏却需要「有藝術的趣味，科學的了解，道德的節制。」總之，我們需要選擇和提煉。我們甚至不妨將猥褻的文字放進裏面去，假如通過了上述的三個條件以後。所謂醜惡的描寫和暴露，一向是文學上的重要課題，但那些色情文學家却够不上資格。他們對於這些醜惡的題材，第一便是缺少選擇剪裁的本領，往往毫無條件，毫無約束的全部裝進去，結果便是泛濫，便是荒唐。我聽過鄉間的社戲與山歌，裏面有很多猥褻的詞句與動作，但却還不失為壯健與結實，有一種原始性的純粹。至於這些充滿上海氣的作品，却只有頹廢衰老與怯弱。

人們或者會捧出中國的金瓶梅，西洋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來。甚而沾沾自喜地引為同調。但「金瓶梅」的翻印，原是引起劇烈的爭執的，而且它究竟還有一點可取：對於當時的上層生活有大膽的暴露，以及其豐富的文學性，所以還能擠於「文學遺產」之列。至於勞倫斯的「查泰來夫人的情人」，他原是想把西洋道學家們的虛偽，和近代文明的歪曲矛盾的地方予以暴露，諷刺。然而我們的色情文學家們，有沒有這種態度和技巧呢？有沒有這種純正的企圖和熱烈的情緒呢？不論是什麼人所寫的作品，縱使他只有極少部分的優點，那麼，這部作品還可以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可憐的是今天這些上海氣的作家們，實在難得有使我們可以喝聲彩的「傑作」。

我是一個講究趣味的人。我們誰都感覺到我們的生活實在枯燥極了，苦悶極了，我們的心靈彷彿是一片大沙漠，一天到晚有的只是澈骨的寒風，跋扈的泥沙，而缺少的是潤澤和光采，尤其是在這樣畸零徬徨的天地之中。我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的調和，進而使工作時更添上一點精神的力量，這大約是每個人都有這種要求。但這趣味必須從世俗的見地中解放出來，——將趣味的內容儘量提高，使之稍有風趣和雅致。我這所謂雅，固然是跟「俗」的對立之稱，然也決非一塵不染的清高潔白，只是說，我們應該把生活的趣味略顯大方方正與健全，有一種藝術性的薰陶和涵養罷了。但有些色情文學家，却以為他們寫這些東西，便是使作品增添「趣味化」。這可見得他們心中的所謂趣味，又是怎樣的一副面目！以女人的大腿酥胸，作為遣弄趣味的對象，我們實不能不吃驚於這些「家」們見識的卓特了。

我們主張人不妨受道德的節制，但決不同情那些猥瑣的道學家。執秤子的縱慾，恰如道學家的禁慾，一樣的是使性的關係，得不到健康平正的解決。英國性心理大師藹理斯告訴我們，從精神病醫生的嘴裏，知道悲慘的瘋狂病者，就是高潔地過着禁慾生活的老處女所獨有的。她們在起初對自己的境遇好像很滿意，但過了多少年後，不可抑制的惱亂和色情衝動却逐漸顯出來了。這在中國尤不缺乏顯明的例子。我們想到中國歷來的太監，何以多數具有專橫弄權，貪殘恣肆的性格，就更記起了藹理斯的話來。我們在眼前的過渡時代裏——其實是我們永遠在過渡時代——新的道德既沒有建立，舊的又在無聲的崩潰之中，我們對於兩性的觀念或維繫，未嘗不稍覺紛歧與困難。但如果我們要建立一種新的，健康結實的兩性觀，也惟有在這樣的時代，雖然這中間需要謹慎的批判，處理；不要弄到姨太太跟汽車夫淫奔，便歌唱起來，扯到什麼「打破階級戀愛」上面去。

看到紙價逐漸的高昂，而這些文化的沈滓也跟着抬頭的今天，我們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雖然我們在題目上寫下了「肅清」的字樣，但一面也抑不住自己的苦笑。因為我們不止一次的要求根絕這些魚情文學，不過「帝力之大正如吾力之微」，事實所給予我們的，惟有空虛和冷淡！（三二、四、五）

大時代的文化人與文化

一 正確了解中日關係

唐士負

自從和平運動展開以來，中日兩國的智識人士，根據歷史的動靜脈，把中日兩國已往的友好關係，尤其是文化的交流，盡情闡發，唯恐見遺。當然，這是敦睦邦交之一道，不過，中日之間，除了這些衆所周知的友好關係以外，還有綿延百年的流血的記錄，其中的來蹤去跡，實在不是一味避諱或曲解，所能抹殺的。

歪曲歷史是一樁不可恕的罪過。尤其是兩個駢肩禦侮的伙伴，對於過去的嫌隙和破裂，若沒有兄弟般抱頭相哭大澈大悟的精神，其前途是在沒有希望的一面的。

許多人把中日兩國過去流血的記錄，不分皂白地推到英美身上去，這是一個有害的傾向；我們不否認英美對於中日關係所施的推波助瀾的卑劣手段，所懷的幸災樂禍的鄙賤心理；然而，因日本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不幸紀錄，也斑斑可尋，不容曲筆。中國國民對於過去的種種，還是不得其解，這種心理一日不清除，無疑的是中日前途的暗影。

這樣說來，難道我們要記仇嗎？不，決不。冤仇宜解不宜結，我們要了解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過，當然，我們也要日本國民了解中國的立國經過，尤其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革命運動的近百年的事實，以共同擔負起對於人類歷史的任務。

愈是過去打得頭破血流，才愈覺得今日握手言歡的可貴，因為過去的血沒有白流。

汪主席於廿九年一月廿二日在青島接見中外記者的時候，曾經發表：『和平運動乃中國百年大計，應從共存共榮之見地，深植其基礎，並非求一時之甯息也。』又：『和平運動乃是從一種主義，一種信仰出發的。』

西園寺公一在致汪主席書中，曾經寫道：『無論是中日兩國間的問題，或是中日兩國與第三國間的問題，我以為不可不竭力避免徒謀目前苟安的妥協態度。我們必須做目光遠大的愛國志士，盡力樹立中日新關係，使世界均承認之。如果爲半途的小乘的妥協，致使中日新關係不能公平，那末，我們在最近的將來，也許會二度或三度重複演出兩國間的悲劇，使數億良民陷入水深火熱的苦境罷。』在這裏，我們以誠摯熱情，懇求中日兩國的智識人士接受他們的真知灼見，放勇敢一點兒，如火之燃，如泉之達，提筆重寫中日兩國的歷史，剖析它底來跡，指陳它底去跡，使中日兩國的新關係放一空前的異彩。

三四年來，我們聽到日本有識人士的肺腑之言，感於那種不可抗拒的誠摯與熱情，就禁不住中心感激，熱淚交迸，其中感人至深，發人猛深的有近衛文麿，頭山滿，西園寺公一，室伏高信，馬淵逸雄，武者小路實篤，大原山洋（請參閱本報「寄中國青年」一文）諸先生，或爲日本實際軍政的負責人，或爲開明遠見的智識人士。而中國方面，如汪主席除對於中日關係披瀝根本的信念以外，更一再提示罪己的精神，勗勉中國國民實踐「責己重以周」及「重以周古不怠」的古訓；陳公博氏一再大聲疾呼，希望中日兩國人士消除互相嫉妬及蔑視的心理，本着悲天憫人之懷，以正義及最高理想爲根據，商討東亞百年之計，更進而期望日本國民深切認識中國人民的心理與生存以及國家的進步；周佛

海氏呼籲兩國人民自責而不責人，互信而不互疑，以實現真正的親善，永久的和平。

國父指示我國：中日兩國在種族上，地理上，歷史上，環境上以及一切精神的文明，物質的開化上，爲友是自然的，爲敵是不自然的。無論人事上發生如何糾紛，總應該視爲一時不自然的現象，予以適當的解決，使之仍向着恆久的自然的和平親睦的方向前進。

是的，中日兩國是一脈相通的，儘管百年來干戈相見，爭紛不已；現在，是臨到創造新的歷史的一頁了。「東洋的本能」聯繫着這兩個民族，只須真正互相了解不致把德法兩國循環報復的悲劇重演於中日之間。

我們願以愛中國，愛日本，愛東亞的誠摯與熱情，向中日兩國的智識人士致其衷心的期望：歷史決不是陰差陽錯的偶然事件聯繫起來的，我們要用科學的方法與精神，讓真正的歷史站出來講話，中日兩國間過去的友好，親善，應該繼續發揚光大，同時，更須以實際的行動彌補過去不可諱避和曲解的缺陷。

二 政治·戰爭與文藝

南 容

當一個社會在變革的前夜，「文化」總是作了先鋒，牠先要言所欲言，糾合大眾，激起浪花；當一個新時代已經站立起來了，「文化」更負起教養的責任，來完成必須的教育。文藝是文化中的一部門，牠所負的使命與責任，自是不能例外，但因牠經過藝術的加工表現，所以比那「文化」直接的宣傳更覺感人至深。牠對於整個生活的教化力量，我們雖然不願如辛克萊的「拜金藝術」所言，把文藝看作宣傳品；但我們理解藝術的產生，不論在作家心中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或者即使是游離於政

治的，我們仍不能把藝術同作家所處的社會及政治環境隔離開來；因為作家本身就是身處任其中的人。雖然他是逃世的作家，我們還得把他逃世的原因，他個人的性格，受生活的與當代社會的諸種影響追溯和分析起來。

我們會見多少歷史上的大文藝者，都是和政治發生密切的關係。歌德一生，有很多年是在政治舞台上週旋；英國的拜倫，是死在參與解放希臘戰爭的軍中，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是出名為解放農奴而鬥爭的作家；到了近代，作家和政治的聯繫，變成彰明昭著，而且是自覺性的一種傾向了。並且，竟可從政治這一點關係上測驗每一個作家抑是向着新生，還是走向滅亡？一個大作家的一生，每每能反映一個時代，便是這個緣故。

政治與藝術的關係，祇是一個作家或一件作品裏的意識的測量。在藝術的創作法上，這種存着完全為了政治宣傳的公式化的東西，當然不是我們所贊同的。文藝是綜合地反映人生，表現人生；這反映和表現，是藝術的能事；但作品裏必然顯示着作家對人物，事件，時代的意見，作家愛護些什麼，憎恨些什麼，文藝對時代的推進力和對所厭惡者的打擊力，便是在這個地方。一個沒落的作家，他在這裏也會表示出他的本相。

文藝家要從時代游離而去，這怎麼可能呢？文藝家既是身處於現實生活中的一個，他本身的生括與從事的工作，便是決定其作品的內容與形式的主要中心，因此，他便不能不選擇他的路，他的方向，也就是他工作的崗位。

有經驗的思想家同時也是大作家曾經肯切地說過：「在一個大時代大事件到來之前，人們為得要喚大家起來，叫大家表示同情和反抗，集結力量，文藝在這時期特別盛張；但正當事件到來的時候，

真正有熱血有勇氣的人們，因忙於戰鬥，文藝便反而沉寂下來了；直到一個新時代展開了，文藝家纔又開始他們的謳歌與再教育。二

歌德對於作家與作品的產生，說環繞在作家周圍的國民修養給與作家的培植也是非常有一種因素。譬如在追求輕巧與浮泛的趣味享受的場合，深沉的作者與作品，便祇好暫時被窒息，沙石的瘠土裏，究竟難獲豐收。俄羅斯十九世紀中末葉的文學，在舊社會與新時代的交織，沉悶的壓積與新希望的探求，吸收西歐的思想與藝術，產生了不少偉大作家與作品，像那樣的文藝底黃金時代，便是在革命後的俄羅斯，爲忙於建設與對於世界新危機的應付的準備，在文學上的成就，藝術的評價，雖然作品上已另是賦與一種新精神與新形式，但實質還不能超過十九世紀的成就。這是說明，戰爭在精神上的消耗，多少要將文化——文藝暫時撤輕一下，雖然也許將來的某幾種文化或藝術作品會從現在的戰爭裏孕育，但祇是孕育而已。

現在呢，現實的脚步總跟不上希望一樣快，有許多年青的，在各處埋頭工作着，他們愛文藝，更愛別的工作，每一種工作便是文藝的胞胎；我們不得不將希望，安放在許多青年工作者的身上，他們起初也許不是文藝家，但我們原很知道，作家除了戰鬥的社會生活以外，並沒有第二隻學校的。（三二、五、三）

文化界的當前使命

劉 輝

——爲上海雜誌聯合會成立獻詞——

每一個時代有着每一個時代的知識情緒，思想，和意志，去繪寫那個時代的現實底生活，表現於科學，藝術，道德，風俗等各方面之成就，以呈露其「時代的個性」，放在歷史中去和別的時代作着區別，並代表其地位，給人們以辨認的文化形態，指示出歷史行程之來蹤去跡，不斷提高人類生活之向上，及揮發其啓悟底功能。

各種雜誌之出版，就其存在的當時的各種實踐生活之剪景的映畫，而爲代表他所代表着的各種人羣的生活之苦悶與要求的喊出的聲音。這聲音，讓我們每一個渺小底個人，不爲本身肉體機構之限制而局限於個體的小底週遭之感受，能够放開目光，拉長耳朶，廣大地深刻地去體驗和理解自己所處的偉大底時代，是如何在變動與發展，並引導着自己的脚步。

最早的雜誌，早在古昔的定期市集——節場中就已經刊行了。隨着商業的發展，和交通的推廣，人類意識領域和生活情趣之活潑，因而各種各色的雜誌之編出，就逐漸增加，充實，蔚成近代出版界的洋洋大觀。

另外，也是由於社會構成之繁複，過去的各種雜誌是各別活動，各別發展，各自代表一個階層或一種意識或情趣而出現，以完成某一時期，某一地域中文化界之矛盾的締結。

爲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能解決的問題，爲變革前次世界大戰所頑固地僵持底世界之局勢，從西班牙內爭，中日事變等各個局部糾紛匯合擴大，引起重建新秩序之世界的再戰，以致全世界被籠罩進砲火之中，已有這久。血與死，到處以沉默責問着人類的咆哮與覺悟，不早就該推翻英美帝國主義嗎？這兒，在敏感底文化人，必要而且不得不從各方面集中和統一起來，爲舊時代作出堅決底結論，和打開新時代的路向。因此，我們對於上海雜誌聯合會之成立，遂有了萬分底期望和無限底祝頌。

上海是國際市場的大動脈，文化界是代表着時代的靈魂，在當前局勢之下，我們東方人民，在日本英勇戰鬥精神領導之下，中日兩國的精誠合作，果敢地砍斷了英美帝國主義繫連在東方之鎖鍊，文化界不僅應該急劇奮力去擊毀斷留在一些人們精神上的枷拷，放納並接引他們到新生命之路，開始再造新底東方，在上海樹立起新中國之新底風氣與新底向望，從各個雜誌本身之新底努力出發，展開到文化建造之各部門去。善良底習俗，樂觀底情緒，積極底意識，邁進底精神，科學底態度，藝術底興好，要去接替頹廢，哀苦，幻滅種種衰退底心理，以補充並健碩死不去的軀殼。

我們知道病的社會現象與變態底羣衆心理，表現出生活的過分享受與生活的困苦的打拚之畸形場面，這正是某一個期間，在戰爭斷傷下的精神性格與物質異貌，是必然而且一定有的情況，問題在於作着整理經驗與啓發悟性的文化工作者，如何去收拾與領導。因爲時代之推移，永遠是不息，而且向前行進着的，每當一個突變的階段，舊的崩潰與新的飛躍，如果沒有或缺少中心力量之維繫與牽引，或有而領導力量貧乏，固然事實本身畢竟向前發展，不許可兜過大的圈子，或橫流逆溯，風潮之泛濫洋溢，究竟是人類的災害，要到受浸蝕的各部份完全生新才算得救，因此，文化界本身如何從舊的散漫底自由放任底自相矛盾底雜亂中，把各部門的人才與工作，相互集合起來，堅強團結統一目標，是

目前文化界對本身應有的使命，和負擔當前文化任務之先決的主觀條件。我們看到上海雜誌聯合會之成立，所以要欣幸且更願望各種文化團體再能迅速地相互綜合組織起來，樹立新中國的文化工作之新底陣容，在建設新中國解放大東亞的戰鬥上，達成內部之充實與心理的健康。

在這兒，我們要指出：揚棄舊底渣滓，與培育新底生命，必需對於封建殘餘影響與英美帝國主義之侵勢餘威之肅清，一方面就是集體生活之號召，另外在對於中日關係之明朗底認識，以求東方民族之大團結，共甘苦，同生死，去爭取東方人民之合理生存與發展。這些，首先就是要文化界在事業上去努力的，行動要求意識之正確，意識要求行動之一致，應該立即展開到每個文化部門去作着軸心，而起運動和影響，我們祝頌上海雜誌聯合會的成立，並寄予深切的厚望。（三二、六、二八）

大東亞戰爭的文學政策（提綱）

魯 風

一 文學的意義

「文學」兩字，一般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專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特定的形式的作品，廣義的則包括一切敘述，說理，解說文的文字在內。就狹義講，本人可說是門外漢，但照常理講，是不必限於那樣偏狹範圍的。中國古代的學者，是主張「文以載道」的，似乎頭巾氣很重，但是他們早已指出：「言文無文，行之不遠」的道理，孔子對當時鄭國的外交文書備致讚美，正因為它經過裨諶、世叔、子羽、子產等的草創，討論，修飾，潤色的功夫（見論語）。外交文書是實用文，其有賴於文字的修飾鍛鍊工夫，並不在純文藝作品之下。推而至於其他，也莫不盡然。

人們常把純文藝作品和應用文字分為截然兩事，這當然是不合理。寫作實用文字固然有賴於文學的修養，始能擴大其效用，純文藝作品更不能脫離了時代，和社會環境，忽略了對當時當地所能發生的影響，古人雖有「藏之名山，傳諸其人」的話，但歷久常新，永不磨滅的作品，都是滲透了當時當地的血液和氣息。中國古代聖哲是非常重視文學的實用性，孔子訓其子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又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篇）當

然文學的功用，不限於眼前的實用，把文學的效用，看得如此，恰恰削弱了文學的真正效能，但是，文學的不能也不應「遺世而獨立」，則古代的哲人已早揭出。

文學的盛衰，從來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以文學是屬於社會上層建築之一，必須政治上軌道，人民生活安定，然後文學才會受人重視而興盛蓬勃，太平之世，帝王始有「右文」的盛舉，而文學人才也相繼而出；另一種說法，則認為古來偉大的文學作品，大都為離亂之世或失意者的產物，歐陽修有「詩人窮而後工」的話，不僅詩人如此，其他足以代表一時代的偉大作品，也都非出於文學侍從之臣，以中國為例，最古的文學詩經，其中大雅，與三頌各篇什，不及國風及小雅各篇的膾炙人口，古來的大文學家，如屈原，司馬遷，杜甫，辛棄疾等，其所以能創作偉大的作品的背景，或身當離亂，或遭遇不幸。以英國為例，則歷來受王室豢養的桂冠詩人，其作品為後人所誦習者也不多。

所以，文學的價值是在真切，在能深切地刻畫時代，在能揭出深蘊在社會深處的真實相，在能發生時代的呼聲，如此，其作品始能獲得讀者的共鳴，激發並鼓舞起讀者的情緒，甚至超越了時局與空間的限制，永久活潑潑地有生氣。

各種人物，大多數在少年青年時代，其思想信仰的最初確定或改變，常由於文學方面得到某種啓示。所以，文學作品對讀者的初步影響最大，而初步的影響，常常就是印象最深的。所以文學的功用，並不弱於政治經濟等部門。

二 當前的使命

文學應反映時代，應為時代服務，已如上述。大東亞戰爭是歷史上空前最偉大的階段，是東亞十

萬萬人民族解放，自由，幸福所繫，十萬萬東亞民衆，都應爲這偉大的任務服務，文學工作者自然也應用其所熟練的武器，運用其所熟練的技術，盡其時代的使命，爲大東亞戰與大東亞建設而服務。因之，這一時代的文學，應負起左列的各項任務：

(一) 宣揚並提高戰爭精神。爭取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爲今日十萬萬東亞民衆的第一課題，一切努力均應以戰爭勝利爲第一義，文學的使命，也應該以鼓勵戰爭爲第一義。

(二) 鼓勵生產。戰爭的前途，除屬直接的軍事外，就決定於物資，無論軍需或民生日用的物資，其量的多寡與質的優劣，均具有決定作用；所以生產戰的反映及鼓勵，爲文學工作者的第二個課題。

(三) 發揚東亞民族的自覺精神。

(四) 克服英美思想，克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浪漫主義的思想，發揚奉公爲國及東方的道義精神。

三 文學的內容

爲完成上述使命，大東亞的文學，應具備左列內容：

一，戰鬥性。文學的存在，不是少數人欣賞享受的裝飾品，而是一種戰鬥的武器，所以它的本身，就應該有戰鬥性，一方面鼓勵自己鞏固自己，一方面針對着敵人作戰。

二，民族性。大東亞是多種亞洲民族所組織成的，其中因文化歷史的關係，和過去遭遇的關係，除中日兩國外，一般文化比較落後，爲提高各民族的自覺精神，應儘量發展各民族固有的文化，而民

族文學的提倡和發揚，尤爲當務之急。無論在軍事或文化上，日本都居於東亞領導的地位，今後東亞一體，尤有充分介紹日本文化的必要，但因過去東亞各民族，久處於殖民地地位，備受侵略者的限制，爲發揚其民族自覺精神，以加強戰鬥起見，對民族文學的恢復工作，更爲切要。因爲，必俟民族覺醒普遍之後，始能吸收東亞較高級之文化爲己有。

三，東方性。大東亞文學，應發揚東方固有的道義精神，以互助律己，代替過去英美所遺留的自由浪漫主義。

四，建設性與向上性。互助與律己精神，並非以苦行爲目的，已飢已溺，正所以求大眾的不飢不溺，大東亞的時代文學，應指示大東亞建設的繁榮，和各單位生活向上的遠景。

以上所述，不過是建立大東亞文學的一個綱要。文學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一個文學工作者，必須經過長期的修養和鍛鍊。所以東亞民族各單位當局，必須盡量扶助文學工作者，珍視文學工作者，使之克服各種困難而完成其使命。（本文爲作者出席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提案全文，其中一部份經譯載東京日文各報。編者附誌）

我國教育過去的檢討與今後的改進

吳明揚

教育是立國的重要原素。一個民族的盛衰，與其人民所受教育的良窳，有密切的關係。中國遠在三代的時候，就有教育制度，尚書堯典說：「帝曰：契，百婁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當時的五教，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禮記王制篇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還有孟子盡心章也說：「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皆所以明人倫也。」周代最盛的時候，教育也很普及，除國都學校外，還有小學和大學，我們祇須翻一翻尚書的大傳，就可明瞭。

我國學校教育，在現代的意義上，嚴一點說，只占着三十年。但我們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幾千年來，難道我們沒有教養國民傳遞文化的方法麼？當然有的。不過歷代的學校自始就和選舉並行，唐代以後，更漸被考試所壓倒。中國自實行所謂新教育以來，爲時三十年。我們現在要問：已往的教育，已經盡過了多少責任？實施新教育以後，爲什麼沒有收着我們所期望的效果？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必須把過去教育事業，作一個檢討。

過去的教育，就作者管見所及，覺得有幾個重大的錯誤：

我國教育過去的檢討與今後的改進

第一，教育制度專事抄襲西洋的陳規，未能審察國情，切合時宜。我們知道中國新教育運動，是跟着英法聯軍入京之役而展開的，那時清廷仰慕西洋人的堅甲利兵，於是設立同文館，造就繙譯人才，以便介紹西洋的學術，復派遣青年赴美游學，創辦駕駛學堂，管輪學堂，水師學堂，武備學堂。然而這些新興的事業，毫無成績。後來又有張之洞倡議「中體西用」。當時所謂西學，不外是西政西藝，所謂西政西藝，又不外像張之洞所說：「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算、繪、鑛、醫、聲、光、電學。」他們絕想不到西洋人除上面各種「學」外，還有他種學，張氏努力的結果，養成爲學不澈底與浮誇的風氣。

民國成立以後，教育宗旨常常變更。民十一年，實行新學制，所謂新學制，就是把美國的「六三三」制搬進中國。新學制中學的一段，分初高兩級，初中的任務，在試探青年的才能，作爲深造和就業的根據。其實這種制度，未能顧及國民經濟力。初中畢業而無力升學的人，因爲沒有專長，不能服務社會，三年的光陰和所費的金錢，豈非虛擲！初高中課程，有許多重疊部分，而各科教學時間，也不免有輕重倒置之弊。至於小學修業年限，定爲六年，若以此作爲初等教育，未爲不可，如以六年修業完畢，即作爲義務教育終了，未免太嫌短促，原因是中國文字艱難，小學生畢業時尚在幼稚時期，學習能力薄弱，不能獲得生活上所必需的知能。

第二，過去的教育，是少數人享受的特權，大多數國民，都被擯於學校之外。中國曾於民四頒布義務教育施行程序，規定初等教育的四年爲強迫就學的期限，民十袁希濤氏刊行「義務教育之商榷」一小冊子，從事義務之鼓吹與宣傳。民十九舉行過全國教育會議，其主要任務，便是擬訂實施義務教育的具體方案，但是目前全國失學兒童至少有四千萬人，我們只看見方案，議決案，而沒有見到事

實。再說到成人教育，更是畫餅充飢，從前清末年學部簡易識字學塾以迄於今，失學成人補習教育雖不能說毫無成績，但有許多地方是可以譽讚的，民國十二年晏陽初氏會組中華平教促進會於北平，是一個有力的平民教育研究機關，他又在定縣設立試驗區，從事實際工作，可是政府漠然視之，絲毫不加協助。民國十八年民衆教育的呼聲，甚囂塵上，政府也曾頒布識字運動宣傳計劃和民衆學校辦法兩個大綱，可是未能恪遵力行，而占全國人口半數的二萬萬餘人的教育，終於是紙上談兵罷了。

第三，中小學校師資未能專業化，教育的效果和教師的健全與否，關係異常密切，我們希望增進教育效能，必先培植優秀的師資。過去中學教師，大多未曾受過教育的專門訓練，上焉者一味傳授知識，對於教材的選擇，組織，分配，以及教學方法，都未能注意。小學教師呢？畢業師範學校受過教育薰陶的固不乏人，而學力淺薄，毫無教育素養的更屈指難數。就是畢業於師範學校的人，其能忠於職務，任事勤奮者，亦寥若晨星。推原其故，一般設在都市內師範學校受業的學生，不知不覺中沾染著奢靡的習氣，缺乏勤儉克苦的訓練。

考先進國家教師養成的辦法以及政府訂立的教師法規，多能顧及當前的教育的需要；所定教師標準，相當嚴格。例如日本制度，小學教師必須得免許狀，免許狀之取得，須卒業於師範學校及文部省指定的學校，曾經檢定及格。他們能認真執行，又如德國規定師範學校畢業應第一次考試及格後，始准暫任教師，於任職二年至五年內應第二次考試及格者始能充正式小學教師，交地方教育行政機關於一年內派定職務，且爲終身職。中國呢？政府雖然曾經規定過檢定教師的辦法，但事實上未能澈底施行，不合格教師，到處都有，如此而欲求教育的進步，真是緣木求魚了。

第四，過去教育未能充分的科學化。自民七美國杜威來華講學後，有些進步的學校，即開始新教

學法的試驗。「教育卽生活」，「學校卽社會」，遂成爲教育上流行的口號。民十有孟祿，民十二有麥柯，民十四有柏克赫斯德女士，民十六有克伯屈，民二十有華虛朋等到中國來游歷，或公開講演，或協助研究工作，有少數學校，試行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其中最有成績的要算南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和上海吳淞中學。前者以試驗設計法爲教育界所稱道，後者以試行道爾頓制爲時人所注目。

兒童心理和教育心理的研究，教育上統計與測量的應用，也在民七八年間開始。小學兒童智力測驗，包括個人的團體的書法，作文量表，先後編訂出版。但是最近十年中，教育專家們或忙於行政工作，或貪圖安逸，對於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工作，好像不感興趣，這個開闢未久的園地，任令荒蕪，殊堪嘆惜。我們祇要看看一坊間印行的測驗材料，大多陳舊不合時宜，而且偏頗不全，教師們不能充分利用，設計，道制等新教育方法施行後的成效，難以令人滿意，甚至有若干學校，標榜新教法以炫奇惑衆，自翊爲前進的教育者，殊堪痛心。

第五，過去教育提倡個性適應個別發展而忽略集體的訓練。個性適應主要的意思：是教育者要依着學生的天賦性格施以適切的教育，從而發展其特長使成爲有用之才。但從另一方面看，個人的欲望，常和社會的利益相衝突。假如教育上偏向於自我發展造成許多個人主義者，那就於社會有害了。個人主義以滿足自己的衝動爲前提，處處要營與其特性相應的生活，個人成爲孤立的分子，不是全體中的一部分，個人要想支配全體，而不受全體的支配，像這樣的人，豈非危害社會！從前的教育過於尊重個性，提倡個人自由，結果徒然發展了一些自利的衝動，而使個人與全體發生衝突，只圖一己的私利，罔顧整個社會的幸福。

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錯的已經錯了，我們沒有辦法使他不錯，可是已有的錯誤，不能再錯下

去。反之，我們要奮發淬勵，痛改前非。今後的教育應該怎麼樣呢？

第一，我們要把握時代的需要，發揮教育的最大的力量，培植有用的人才，勿盲目的抄襲外國的制度，勿標新立異，可是要取人之長，補我之短。無論何種教育規章，務須適合國情，尤其是國民的經濟力。

第二，從國民和政府的關係說，教育是人民應享的權利，這種權利，不能賦予少數人民。目前中國有幾千萬兒童，二萬萬成人，還沒有踏進學校之門，怎樣使達廣大的失學者得學？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三，教師的良否是教育成敗之所繫，今後教育行政機關應致力於培養健全師資。有志於做教師的，對於學科的本身要奠定堅固的基礎，對於教育的目的，方法，教材的取舍標準等，應使之有深切的認識與了解。

第四，教育上的一切設施，應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舉凡課程編制，教學方法，教材的選擇與組織，都應根據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若僅憑少數人的意見，武斷地實施，不免僨事。政府應設立研究機關，獎掖扶助教育者的試驗探討工作，以推進教育事業。

第五，個人主義的教育，絕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今後各級學校應注意於團體精神的培養，使學生多營集團生活，體認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知道只有全體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

孫中山先生少年時有上李鴻章書發表政見。茲摘錄其中最足警惕的幾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育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途。」（三一、九、一四）

我們需要那一種教育哲學

王知非

在沒有說到本題之前，我先要說一說教育和哲學的關係以及教育哲學的意義。

教育與哲學的關係，非常密切，而事實上教育哲學所以可能，便因兩者有密切關係之故。我們如考察哲學史，便可知哲學的發生，由於教育的需要。古代希臘人最初所發展的哲學就其範圍和內容論，與其認為哲學，莫如認為科學，因為他們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構成和變化，絲毫不曾涉及人生的問題。以研究社會人生問題為對象的真正的涵有現代的意義的哲學，乃從希臘古代的許多游方教師，即所謂哲人開始。他們游行各處，教導青年，在實際教育經驗中，發生了個人與世界，個人與社會，知識與行為彼此間的關係的問題。因教育上實際的需要，才把哲學的研究，由自然轉到社會人生的研究。哲學不單起源於教育，並且在獨立以後，還隨時影響教育。我們只要翻一翻西洋教育史，便可見到各時代的教育理論，都是當時主要哲學思潮的反映。西洋有許多哲學家，同時就是大教育家，他們要借教育的力量，來實現他們對於社會和人生的理想。德國斐希脫的「對德意志民族演說」，和法國盧梭的「愛彌兒」，在教育上都曾經發生過偉大的力量。

哲學與教育的關係，已略加闡述。現在再把教育哲學的意義簡單的說明一下。

教育哲學，是一種新興的學問，其內容如何，至今還沒有確定。因之，他的對象和定義，也很紛歧。我們如其把各家的定義考察一下，便可發現一種共通性。即是所有教育哲學，均在於明認哲學和

教育的密切關係探討教育所根據的哲學的根本原則。更明顯些說，教育哲學，是教育的最高的指導原則。無論何種事業的實施，都需要一項或數項最高的原則來作指導，然後這種事業的進行，才有一定的趨向，才有一定的方策，這最高的指導原則，便是這種事業的哲學。教育是社會上重要活動之一，自然也應該有他的哲學。

教育的實施，須統整於一個或數個原則之下，世界先進國家的教育，都各有他的哲學，在指導，規範本國教育的進行。

中國的教育有沒有哲學呢？我們的答語是「沒有」。在科舉初廢，學校初興的時期，中國教育，未嘗沒有他的哲學。當東西文化開始接觸和衝突的時代，中國的教育哲學，就是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義。這種哲學確實支配了自前清初興學校到辛亥革命為止。這若干年的教育。自從民國成立以來，「中體西用」的哲學既被推翻而新的哲學却並未建立，弄得教育目標，一年一變，教育制度，盲目抄襲，教育方法，一味模仿，總之，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紛紜變化，失去重心，教育效果之不良，是意中事。

中國過去的教育，既因缺少一種哲學而失去重心，那末今後的教育，自然需要最高的最根本的原則，作為實施的準繩。中國需要的是那一種教育哲學呢？這要看整個民族國家的需要而定，不能從任何個人產生，也不能期待教育界產生。

有人說：中國過去的教育，太偏重教育方法而忽視教育目標的研究，換句話說，大家只注意於「怎樣教」和「怎樣訓練」的問題？而忽視了「教什麼」和「訓練成怎麼樣的一個人」的問題。這種批評，頗為中肯，那末，懲前毖後，我們現在所應集中研究的，便是「訓練成怎麼樣的一個人」的問題。

我們需要那一種教育哲學

題。這個問題能有圓滿的解決，「教什麼」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要討論上面所提的問題，有兩個先決問題必須注意，就是：（一）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如何？個人爲社會而存在呢？還是社會爲個人而存在？（二）理想的社會組織，應該尊重個性的自由發展呢？還是尊重社會全體的福利？這兩個問題，也就是社會哲學的中心問題。如其我們採取個性自由發展的社會哲學，那末，教育的目標和方法，應該是一種精神；如其我們採取尊重社會秩序和組織的社會哲學，那末，教育的目標和方法，必定是另一種精神。

從個人和社會的關係講，社會哲學約可分爲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前者認爲社會由個人組織而成，社會應爲個人而存在；後者主張個人不能離開社會，社會是原始的，社會不是個人的集合體，而有其特殊的價值，社會可以支配個人，個人應處於整個的社會支配下始得生存。近代教育家中，採取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可以南尼氏（T. P. Nunn）爲代表。他曾著：「教育的重要原理及其根據」一書闡發他的學說。他認定個人的重要，和個人的牢不可破的權利。他從生物學的事實，認定個性乃是生活的理想，教育的實施，必須尊重男女的自由活動，教育的使命，並不是製造個性，却只是就每個兒童的自然材料，憑他原有的能力，無阻礙地生長起來。南尼之外，有羅格與蘇梅克（Ruggard Shumaker）二人會合著：「兒童中心學校」一書發揮個性發展的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以自由反制裁，（二）以兒童作始反教師作始，（三）以自動反被動，（四）以兒童興趣爲課程的基礎，（五）注重創進的自我表現。個人主義在教育上所表現的有選科制，道爾頓制，能力分組制，學生自治制，自表的藝術，廢除預定的課程等。採取社會觀點的教育家，首推杜威（J. Dewey）。他說：「教育離開社會環境，所謂發展個人能力，是毫無意義的。」他又說：「學校惟有自身實現可以代表社會生活

的種種情況，才能準備社會生活。否則他好似教游泳而不入水。一此外，諾篤爾普（Zatun）涂爾幹（Durkheim）白爾格門（Bergmann）也都站在社會的立場以探究教育。諾氏認個人是不存在的，涂氏以爲文化的要素如語言宗教，科學等，無非是社會的產物，教育只是社會化，離了社會，就沒有教育的存在，個人不過是教育的原料，不能成爲教育的目的。杜威曾於一九一二年任芝加哥創辦試驗學校，實地試驗他的教育理論，而獲得美滿的成效；已故的德國教育家凱興斯泰來（Kerschensteiner）也曾設立工作學校以貫徹他的社會主義教育的主張而博得全世界教育學者的重視和贊許。社會教育學派不僅主張教育的目的，應該是社會的，並且還主張教育的組織和方法，也都要社會化。

中國過去一二十年中的所謂新教育，就事實論，是失敗的，失敗的主因，是在沒有一貫的思想，教育界是意見紛歧，莫衷一是。前進一些的學校，也不過做些新教學方法的實驗，一般學校，大多是風紀蕩然，散漫，凌亂，無組織的現象，不一而足；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往往因細微的事故，可以掀起巨大學潮，當局竟可以弄得束手無策。學生的自我觀念根深蒂固，團體觀念，却異常淡薄，只知爲己，罔顧全體的利益，像這樣的人，我們要他做什麼！

我以爲今後中國教育，再不能倡導虛偽的自由思想，我們的着重點是要使兒童們，青年們認明個人是全體的一部份，個人必須融化在全體中，才有存在價值，民族國家或較民族國家更擴大的組織，須被認爲是一個有生命的全體，各個人民是一些肢體。我們要藉教育的力量，把全體做成一個真實的全體，把肢體做成一個真實的肢體。我們的職責，乃在於使「全體」生長在人的自身中，一切爲「全體」的服務，成爲自己意志的滿足，和品格的完成。這樣的教育，絕不是個人的「自我實現」，而是個人的「自我犧牲」，犧牲愈大，成功也愈大。

在消極方面說，今後的教育，要教育人去克服利己心，而克服利己心的途徑，莫善於愛好工作和對公團的服務。在事業的野心和對於公團的野心覺醒之後，利己心也就自然而然消滅了，代之而起的是對於工作的忠貞和同伴的情誼。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圓滿的服務力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培養服務力的要點，是養成強壯的體力，和靈敏的頭腦，學校不是讀死書的地方，却應該想種種方法，使學生多得團體工作的機會。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要教育兒童們和青年們負起責任來。在個人主義的教育，名義上雖然是發展個性，實際上却缺乏個人負責的訓練，將來生活於社會中，個人永遠不能負責，而只能掩藏在多數後面。如其我們把全部教育集中在「親身負責」這種核心上，那末，個人才真正的健全起來，各盡其能，爲整個社會謀福利。

我們無論從生理方面或心理方面去觀察，一個人總有許多需要，這些需要，必求滿足而後快。同時個人的需要，往往容易和社會的習俗，風尚，成訓等衝突，當個人的需求和公衆的利益衝突的時候，如果他能够以公衆的利益爲前提，而不顧及個己的欲望，那就是一種崇高的德性。今後的教育；便須極其全力以養成這種崇高的品格。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中國需要社會主義的教育哲學，是毫無疑義的。（此地所稱社會主義，是與個人主義對立的名辭，絕不是政治上或經濟上所說的社會主義）我們如其採取這種哲學，那末，今後的教育無論在形式上或精神上，都要大大的改觀了。不過，我們採取這種教育哲學，並非要抹殺個性差異的事實。近代教育之科學研究的結果，使我們對於教育的對象，認得格外清楚。我們要應用教育科學的成果，使教育的過程，盡量的心理化，否則，我們不免因方法的錯誤而沒有良好的收穫。（三一、一〇、二六）

改進上海教育芻議

吳明揚

過去的上海教育，就量的方面說，是相當的令人滿意的。因為公立學校教師的待遇，較別地優厚，可以羅致人才，中日事變之後，上海人口不下三百數十萬，怎樣使這許多市民受到適當的教育，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了。

上海的教育問題，可分學校教育與民衆教育兩方面：

一 學校教育

學校教育問題所應討論的有課程，教師，視導三大端。茲分述如下：

(一)課程 課程是學生在學校裏所從事的一切有目的有組織的學習活動，我們要改革教育，應從革新課程着手。課程原非固定的，應適合時代的需要。我們鑒於大東亞戰爭已經獲得了輝煌的戰果，奠定了勝利的基礎，我們應考慮及共榮圈具體的建樹問題。大東亞解放戰的目的，是在求亞洲十億人民的真正自由與復興。這個重大使命，是每一個青年所應了解的。我以為各級學校的課程，應以大東亞各國和各地域的歷史，地理做骨幹，關於中國，日本，滿洲國，泰國，以及緬甸，菲律賓，印度支那，北婆羅洲，荷印，馬來，印度，澳洲等的地域環境，資源，人民生活，社會文物制度的過去與現況，應該作為學生學習的主要題材，其餘的學習活動，也要和這些教材發生聯繫。

日語的教學，在全部課程上作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文字是傳遞文化的工具，我們為謀溝通中日文化，必須養成學生吸收文化的能力，根據這一點，今後各級學校應減少英語學習時間，儘量增加日語的分量，以提高程度，培養充分的閱讀能力。

關於學生的訓練，應根據新國民運動綱要，以規範青年的生活，以確定青年的新的國家觀與新的人生觀。日本青少年的規律化和勞動服務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取法的。

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就是科學知識的灌輸與科學研究態度的培養。因為這是大東亞建設上的先在條件，我們如其要使青年們有建設共榮圈的實力，對於科學教育的充實，是刻不容緩的事。中日事變後上海各校的設備，大多因陋就簡，科學教育，名存實亡，教育行政當局，宜籌劃經費，多闢公共實驗室，供各校學生共同試驗。

(二)教師 教師方面的問題，可分待遇，組織，進修三點來說。就待遇說，一般學校教師每月所得薪金微薄，在米珠薪桂的今日，教師有斷炊之虞，目前小學教師，多由女子擔任，男子因所入不能仰事俯蓄，於是裹足不前，無形中減少一部分優良師資，這是教育上的一大缺陷。今後行政機關，要比照常地的生活，定出一個合理的教師俸給標準，並在可能範圍內，設法救濟，以安定其生活而提高教育的效率。

全上海的教師，應有一個健全的組織，在全體的組織之下，再分成若干區，每區設一教師協進團，指定一校為主席，定期集會，交換意見，聯絡情誼，研究教育問題。

教育是前進的，教師如其固步自封，或囿於成見，則難期教育之進展，因之，教師進修，是必要的。進修辦法很多，如發行刊物，舉行講演，參觀教學，組織讀書會等，都屬可能。

(三) 視導 行政機關爲謀貫徹教育政策，必須厲行視導制度。視導工作的實施，要恪遵幾個原則：

- (1) 視導與指導不容分離：視察爲手段，指導爲目的。
 - (2) 視導工作之本質：要求視導人員專任，視導事項分任。
 - (3) 關於教學視導：中學視導應以科分，小學視導應以級分。
- 爲求視導制度的完密，教育行政機關設視導主任，並將全上海分爲若干視導區，各區設視導員若干人，以一個學校爲單位，根據中學分科，小學分級的原則，由區視導員負責實際的責任。

二 民衆教育

民衆教育和學校教育，只有對象上的不同而沒有本質上的差別。民衆教育，是對年長失學的成人所施的教育。我國過去因教育之不普及，全國文盲，約在半數以上，上海數百萬市民中，需要受教育的，當不在少。因之，我們今後努力的途徑，除加緊訓練在學的兒童和青年外，還要加緊訓練一般成人。

民衆教育的職能是什麼？簡單的說，是對於一般成人給與必需的知識，訓練必需的技能，和培養必要的理想，希望民衆獲得這些知識，能力，和理想，爲社會謀福利。這些知能，理想，當然與社會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民衆教育的職能既明，今後當務之急是什麼呢？我認爲最迫切的有兩項：一是識字訓練，一是國民訓練。茲分別說明於後：

改進上海教育獨議

(一) 識字訓練 識字訓練的主要目標，是在掃除文盲。我們鑒於文字是求知的重要工具，也就是國民訓練的基礎，所以要加以重視，初步的識字教材，宜採日常生活上應用最廣和在一般民衆經驗中的，其陳義深奧以及生僻難學的，概不選取。全國通行的簡體字，既便書寫，又易認識，確是很好的材料。據學者研究的結果，字形觀察的錯誤和字的繁簡有密切關係。

我們要辦理識字教育，除慎選材料外，又很明瞭漢字的學習歷程。文字本身是代表某種意義的符號，學習相當困難，漢字的學習，因爲包括形、聲、義三部分，學習尤非易。什麼叫做識字？所謂識字，是見字形而了解其聲與義且無錯誤，完全的識字，不但是字形的識別，必須識別與默寫或聽寫兩俱不錯。才算達到目的，識字教育，就要做到這個目的。要做到這一點，自須研究經濟的學習法，以節省成人的精神與時間。

(二) 國民訓練 國民訓練是民衆教育中心的工作。民衆訓練的目標與內容，應與學校教育一致；具體的說，一方面灌輸關於大東亞各國和各地域的史地常識，使他們認識實現的環境，獲得建設共榮圈的概念；一方面是培養講衛生，有禮貌，守紀律，肯服務的良好精神。訓練的材料，務求淺顯易明，對於初學的人，事實上還不能利用文字，有賴教師的講述與啓導；並應多用圖畫，影片等做教具，以資輔助。

今後的民衆教育，如其能將識字訓練和國民訓練並重，雙管齊下，集中精神於剷除文盲和作育新民，那末，民衆教育，必有宏大的收穫。致於實施的辦法，還須縝密計劃，以免和社會實情鑿枘。我個人以爲與其開辦民衆學校，不如利用原有的學校的課餘時間，訓練不識字的與需要繼續受教育的成人們。

總之，目前教育行政上最主要的工作，莫過於製定適合時代需要的學校教育和民衆教育的課程。並根據課程上的需要，進而謀教師的健全，再以嚴密的視導制度來貫徹我們所定的課程。學校教育與民衆教育，本質上既沒有什麼不同，二者應予並重，不可偏廢。（三一、一一、七）

從體育到德育

鄭撫籍

江蘇第二屆全省運動大會於十四日起在江蘇省垣開幕，同日，本報的社論已對此有所發揮。記者今更趁此進一步的，對德智體三點加以補充的意見。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所以，反映於一般知識分子思想方面的，就是對田園生活及山林趣味的渴慕，於是在性格方面，也以斯文風雅爲一種美德。而特別是在東南一帶，如江浙兩省向來被視爲人文薈萃之區，當時清廷編纂四庫全書，及查禁民間書籍的時候，即特別的注重到江浙。因而一般的人民，雖然在智力方面比較優秀發達，但在體力上却就趕不上北方之強了。惟人僅只是智力的豐富，畢竟還不够，尤其是在今日，同時還須配合體力的鍛鍊。則這一次江蘇第二屆運動大會之舉行，其意義之重大，情緒之熱烈，自也無待我們的費詞了。

其次，我們再從中國過去的教育思想作一簡略的攷察，其特點便是政教合一，想以教育來輔助政治，以造就從政的人材爲要務，所謂君師是一直被並尊的。如古書所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以政治的氣魄與教育的責任並驅齊觀。像論語所記的子張學干祿，學而後則仕之類，以及孔門師弟日常的授受問答，有很多都於政治教育攸關。它的原則我們不能說不對：要培植行政人材必需先從學問知識入手，如論語所記子貢問政一段裏說：

一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

這意思就是說，食雖然比兵重要，但對人民的誠信却比二者還要重大急切。其他的一部分記載，同樣可以看出孔子在回答門弟子「問政」時，怎樣的着重於本身學識的充實。然而可惜到了後來，流弊也跟着多起來了，一般人只記得「仕」立一句話，於是就只憑學問作利祿的工具，不惜鑽營挑撥。「唯利是圖」，心中念念不忘的就是怎樣的去迎合流俗，竊取高位，像戰時的許多策士說客一般，只能成政治的附庸，而不能對國家社會有改造建設的能力，所以有人說儒家的缺點，就在於熱中——。熱中其實並非怎樣的要不得，它的另一面便是積極，比諸老莊之徒清淨虛無的個人思想來也許要更勝一籌，因為它究竟對於現實在關心，在正視，但如果只熱中於一己的權勢，而忽略了羣衆的正當利益，那就無怪要興「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嘆了。

但自然，這不過是它的某一種流弊，我們決不能以後來的流弊，來抹煞它原來學說的價值。這裏我們可以把孔子作一個例。

自戰國迄秦漢以來，這些苟苟營營，或所謂「邪說橫行」的策士之輩，他們在表面上無不以聖門弟子來做幌子。可是在孔子的本身及其學說，又何嘗是這樣的面目可憎？孔子的時代，正是一個最苦難混亂的時代，而他之所以棲棲皇皇，寢食不遑者，完全是想於當時的現實有所促進和改善，因而他雖然奔走風塵，周遊列國，但終於沒有得到高冠厚祿的原因，也正由於他不肯迎合人主，隨波逐流作政治的投機。所以，他對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的顏回，也最看重最愛惜。雖然他學說的某一部分，在今天還有待於我們的批判溶化，然從大體上看起來，其思想的中心還在於重視人民，教導人民。同時，還有一點難得的地方：他雖是一位沒落的貴族，但他門下的這些弟子，可說全都是屬於平

民層的。換言之，在他之前的學術教育，幾乎全被貴族們所占有，到了他的手裏，方才解放出來使平民層也有接觸的機會。他固然明白當時的時局的泄沓紛歧，使人悲觀，但由於「知其不可爲而爲」的信仰在驅使他，促動他，故就不辭勞瘁，致力於教育及學術的發揚光大，特別是在他的晚年，更以教育當作了終身事業——這一點，也正是我們之所以向這位先哲表示敬愛之所在，並且還應該對他的教育精神學習與取法。

由此而復使我們感到：智力的優越果然是極其緊要，但德育的薰陶却也不可或廢。所謂「文人無行」，便是指那些雖有高深的學識，却沒有道德的涵養的人。這些人在魏晉時候已經有自古已然，於今爲烈之嘆了。而在眼前的過渡時代——舊道德正在崩潰，新道德尚未建立之際，該是如何的使我們戰戰兢兢，警惕奮勵，這在「大學」的第一章裏，也開章明義地有直白的指示：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可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都是交相爲用，有密切的聯繫，而修身也自然莫先乎德育之培養。然而空口的提倡道德依然是失諸空洞，於是遂有實踐之說，必須身體力行的做去，方能發揮道德的效果。像過去有許多的論調，似乎太顯得空泛和孤立，對於物質環境——人民的合理的生活未免忽略過去。因爲任何新舊的道德，必須和一國的經濟條件相呼應，相照顧，否則，無論說得怎樣的熱烈動聽，則道德如此而人民的生活如彼，就決不會得到正規的發展。這一點，管子說得好：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叫人民空口的遵守道德，而於實際的生活却無毫厘保障，結果就未有不差以千里。即以這次蘇省的運動會來說，誠如本報社論所指出的，其所以能够有這種盛況的原因，正見得

「人民經濟生活逐步恢復常軌，對文化與體育的興趣也必然提高」之故。推而言之，凡是體育事業最發達的國家，他們人民的經濟條件也必最充裕而優越。

復次，我覺得孔子有一句話，對於一般體育健兒很有意思，即「知恥近乎勇」是，這就是寓德育於體育之中。所謂「勇」，不惟適用於外在的肢體，而且還應貫注於內在的精神與意志。這可以分兩面來說，從消極方面，知恥便是能反省，能自勉，看到別人的好榜樣而感到自己的慚愧，但這是非有勇氣決心不能做到。於是發展在積極的一面，就是於自反自勉之餘，對自己的信仰，以堅定的，強毅的步伐走去，這樣也就會產生出「勇」來。好像在競賽的時節，如果因自己一時的體力不勝被落了選，這時該能積起極迫的出以「知恥」的態度，再加上智力的修養，就未嘗不有捲土重來的機會，發揮「勇」的餘地。否則，像我們時常所見某些的運動員，往往不反察於自己的技能，反而還妒忌人家，毀謗人家，甚至故意的誣陷評判員的不公正，而將自己的弱點遮掩諱飾，這就是不知恥，縱使他的技能還相當傑出，然因德育之欠缺，去勇的真諦也就遠了。從前曾經有一句很風行的話，叫作「費厄潑萊」。這是從英文翻譯過來，其來源是出於運動場中，意思就是公正光明的態度。這對於從事體育的人的確非常要緊，而和上述知恥云云有可以發明的地方。

從這裏我們得到的結論是：德育所以薰陶我們人格，智育所以深化我們能力，體育所以增進我們健康，三者都需要相輔相乘而不可偏廢。（三二、五、二七）

清鄉的成效如何

李蒙政

若干朋友最近從清鄉區內歸來，秋夜無俚，談起清鄉區內情形；可歌可泣者有之；可恨可惡者有之；可悲可傷者有之；遠非都市人所能想見，更非被重慶宣傳矇蔽者所能獲知。茲舉數事，以概一般。

第一，這次清鄉，一般人以為和民國二十年以後的江西剿匪，同樣的困難。經過兩個月來的事實，却不盡然。其原因有如下數種：一，江西都是山區，而目前的江南地帶，則為水鄉，因平原的關係，匪類不易躲藏；二，匪類的成因，江西時代，因佃農多，一受其宣傳的炫惑，一受其燒殺政策，因此頗多自動挺而走險。目前的江南地帶，自耕農較多，參加「新四軍」「江抗」「民抗」者，大都迫於當前情勢；三，江西匪共，一直流轉於戰爭中，而江南地帶的所謂游擊隊，則游而不擊，遍設稅卡，坐地分贓，與軍閥時代割據無異；四，江西匪共敗退時，盡挾民衆俱走，而此次江南封鎖之前，匪類撤退者，僅為少數「黨幹部」。「非黨幹部」與羣衆俱留原地，蓋匪類以為這次清鄉，一如過去日軍的「大掃蕩」，不久即能恢復；五，江西時代，農民既大都成爲匪共，自非做到底不可，而目前江南地帶民衆，則渴望和平，猶如望歲。

鑒於上述五種原因，遂形成如下現象：一，封鎖區內，已無大股匪類，目前所存者，僅爲三五人一起的零星匪類，只都伏處一隅，不敢再出；二，與匪類有過羣衆關係的農民，大都聲請自首，「非

黨幹部一大多數已被逮捕，而其中不少爲農民自動捕獲，送請究辦者，如某地的匪首徐青萍，卽由農民環請正法；三，大多數農民自脫離匪伍後，迅卽恢復工作，因此生產也見增加；四，和平運動的意義與清鄉工作的重要性，由於過去匪類的矇閉，反撥的爲大衆很快的接受。這種現象，無疑的是清鄉工作的進展，而非江西剿匪時代所能企及，這是可以注意的第一點。

第二，上述的進展，從整個看來，還是消極的清鄉工作，在積極方面目前所包括的問題，是很多的，舉其著者，有如下三個：一，恢復交通問題：江南地帶匪類盤據時代，完全在所謂「反封鎖」中，所謂「反封鎖」，一個匪部有一個匪部的辦法，層層密密，除了匪類自己的交通線外，民衆的交通幾乎是完全斷絕的，而成了另一個世界。在匪區裏，聽不到外界的消息，有的祇是匪類自己所編印的宣傳刊物，至於避難在外的士紳，與本鄉的消息，也是隔絕的；物資的流通，已成爲匪類的財源，而因爲交通工具的缺乏，大多數無法流通。所以要溝通內外消息，使民衆眞能了解當前的局勢與和平的意義，非先恢復交通不可；要使避難在外的士紳還鄉，除了確立治安外，也非先恢復交通不可；至於流通物資，更非先恢復交通不可。二，調整物資問題。目前清鄉區內的物資問題，第一是解決交通上的困難，其次是要予以適當的調整。目前物資的現象，是日常用品的缺乏，如火柴，肥皂，紙類，布疋，煤油等，不但價格飛漲，甚至有錢買不到東西。多的是農產品，水產品，無法變成現金，購買他物。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不特使無產者無法生活，就是有產者也感到生活困難。所以如何將日常用品大量的運進去，用合理的方法如消費合作社等來分配，如何把物產運出來，適當的銷售，卽調整有無，是目前一個急要的問題。三，工作人員操守問題。一般民衆對於匪類的痛恨，固有種種原因，而匪類的言行不符，亦爲一大原因。匪類在宣傳上是如何如何，而行動上剝削搜括，綁架勒贖，完全是土

清鄉的成效如何

匪行徑，這是這次他們失敗的重要原因，即他們在民衆的心理基礎上是並沒有建設起來的。清鄉工作人員，到目前爲止，固然有若干不肖的鄉鎮長等，利用職權，受賄爲人作保領取良民證等情事，然而在大體上還沒有貪污瀆職等事發生，這是我們可以慶幸的。不過，工作人員既多，良莠不齊，難免不有人以爲這是搜括的好機會，來腐蝕清鄉工作的意義。假使有這等事，而被民衆認爲一丘之貉，那便是前功盡棄，整個失敗。爲了保證清鄉工作的成功，對於工作人員的操守，予以嚴厲告誡與監視，也是目前急須進行的。

綜上所述，兩個月來的清鄉工作，證明了一個預定的計劃，即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正確性。目前清鄉的軍事工作，在日軍的協助之下，進行是順利的，成功的。最困難的是政治工作，他所包舉的既廣，而事實的處理上最困難。如處理自首，審訊人犯，一不小心，即成枉縱，有一枉縱，即可影響全體。又如民衆急待解決之問題，在民衆之立場上，自屬應爾，而在實際施行上，自有種種困難，如何能得適當之解決，自爲煞費苦心之事，再則二三年來，民衆習於匪化，今在行動上固有迅速之糾正，而在思想上的爭取，即所謂獲得「民心」，更有待於種種之努力。復以如地方制度之更張，如何適合實際，而無流弊，亦爲在在必須注意。李士羣氏於巡視太倉時語記者：「據報各清鄉區匪類，業已肅清，經親自巡視後，就觀察所得，深知所報非虛，但我人之目的，當不僅於匪類之絕跡，我人將盡最大之努力，期使此後各地，永無匪共之發現。」我們以爲「永無匪共之發現」，是否能如所期，完全寄托在政治工作上。因此，我們今後對於政治工作，必須加倍的努力，以爭取永久的成功。

其次，兩月來的清鄉工作，還使我們增加了對於強化國府的信念。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氏在視察清鄉地區後發表感想謂：「余此次視察清鄉地區之一部份，而深有所感者，即從事清鄉工作中

日軍民各機關，均充分了解清鄉之宗旨，予以密切協助，而漸獲得顯著之成果。又謂：「日軍俟清鄉工作完成後，即將維持治安之責任，移交中國軍警，而實行撤退。清鄉工作之意義，對處理中日事變，及強化國府上，實甚重大。」畑氏的這個談話，不特做了過去兩個月清鄉工作的結論，也予未來做了有力的保證，這是極爲重要的。我們希望國府負責諸公，對於今後清鄉工作，能予以更深刻的注視，隨時予以貢獻和鼓勵，尤其負責領袖要躬親實地視察，我們以爲能如此，一定可以加速清鄉的成
功！（三〇、八、三一）

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新使命

孟 祺

清鄉工作在新中國建設事業上所佔的重要意義，在今日已早無可疑問。清鄉工作的政治創造性，在今日確已構成了新中國全體政治機構一條大動脈。這樣說法，絕不含有絲毫誇大。因為清鄉工作所負擔的任務是新中國政治綱領之具體而微的實踐，它的每一節行動，都含有新中國政治綱領的執行意義，我們要具體指出清鄉工作於過去兩年間的總的實踐，固然不無困難，因為如前所述，清鄉工作所負擔的任務是新中國政治綱領的具體而微的實踐，它的行動，深入到國民生活的各個部面，從農村的茶館，一直到最高的政治機構間，無不有清鄉工作所創造的政治影響在。因此，如果一定要指出清鄉工作的具體實踐，那麼可以說清鄉工作已形成了今日新中國政治的細胞質點，形成了新中國政治生命的活力。

個別的細胞質點可以放在顯微鏡下觀察，清鄉工作的個別業績，也可以一件件的加以指摘，但細胞質點的現實生命活力，是一種超越個別細胞的存在，生命活力是現實，同時也是概念；同樣，清鄉工作發展至今日，已早超越了個別存在的意義，而變化為一種普遍的質的存在了；換言之，清鄉工作已脫却其初期的特殊形態，而變成了新中國整個生命的活力源泉。這一點，是我們欲把握今日清鄉工作的政治性格所必須瞭解的。清鄉工作對於新中國的政治，已早不是一種特殊或個別的存在，而是新中國政治的全體，是新中國政治構成的質點，至少在理論的觀點上是如此。

但如此說來，清鄉工作既是新中國政治的全體，是其構成的質點，則豈非將自行否定了清鄉工作存在的必要嗎？清鄉工作失去了其獨特存在的性格，豈非就是等於否定了其本身的存在？可是事實却並不盡然，原來清鄉工作的政治創造性格，在理論的意味上雖已質變成了新中國政治的全體，因清鄉工作的內容本為新中國政治的全體內容，可是清鄉工作的實質建樹，到現在為止，仍不出創造性質的階段，換句話說，清鄉工作的初期創造活動，在一般的理論意味上，已經證實了其成為新中國全體政治的必然性，然而此種必然性的全部實現，却不僅沒有否定了清鄉工作的必要，而是必然要求清鄉工作的再飛躍與再擴大的。這是現階段清鄉工作的一個重大特點。

國民政府實施清鄉工作以還，在時間上還不滿兩年，而清鄉的區域，從蘇常崑太澄錫各縣開始，繼而展及太湖東南地區與上海特別市區，若將整個中國的地域作為背景，則清鄉工作的實施範圍，儘可說得是微乎其微。然而僅僅是量的觀念，決不足以理解清鄉工作的政治意義。政治的基點不是量，而是質。雖然量與質間有其密切的關係，但清鄉工作的政治出發點，是質而不是量。

清鄉工作一開始的政治目標，是確立治安與改善民生，這顯然是屬於質的要求而非量的要求。如果清鄉工作不能完成這兩項任務，則那怕以一紙命令化全國都為清鄉區域，對於實質的政治要求，仍舊不會有絲毫意義的。但清鄉工作的出發點決不在此，它僅僅提出確立治安與改善民生的兩大政治目標，它的實際工作的開始，也不在容易作份量號召的大都市，而是極小極小的農村區域。清鄉工作開始之際，並不是用既經存在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或經濟力量等，作它工作的前鋒，而倒是從它工作的實踐中去掘發並創造諸此力量。清鄉工作固然利用過軍力，政治力，經濟力等等的幫助，但這些力量的作用僅是外鑠的，僅是構成動力作用的。清鄉工作並沒有帶了自己的銀行與錢莊去建立農村經

濟，它也沒有既存的龐大組織去辦理民衆工作，可是在清鄉工作的過程中，民衆的自衛組織自行誕生了，銀行與錢莊及其他工商業的機關，也自動在清鄉區先後出現了。清鄉區域治安良好好冠於全國的事實，清鄉區經濟復興較未清鄉區確有進步的事實，在僅僅一年半的短時間內，以一種神秘的力量，吸收了大批的人，到清鄉區來。

「到清鄉區去」的口號雖然沒有給正式提出過，可是在目前江南區域的千百萬人心，已經普遍自發地滋生了這一口號。清鄉工作的新政治創造活動，在質的意味上，無論如何應該說是成功的。

但就建國事業的偉大性格言，尤其就新中國政治創造的任務言，過去兩年間清鄉工作的成功，其評價要仍不出嘗試的性質，其成功尙屬典型性的成功。在理論意味上，清鄉工作已變質爲新中國政治的全體存在，是毫無疑問的了。然而典型創造的成功，若僅僅當作一種靜止的形態看，它就會變做一種特殊的存在，它的理論性格將僅僅是實驗室中的理論——雖然是正確的，却缺少普遍實踐的意義。而清鄉工作的本身既是一種生命，一種活力，它就決不能停頓於典型創造的現狀，它一定要在再擴大與再進展的過程中，使典型的成功化爲普遍的成功。清鄉政治的本格昇華爲新中國政治的全體，尤必求之清鄉政治的不斷再生產。

由於這一要求，清鄉工作現在在鎮江地區，蘇北地區，蘇淮地區，浙東地區等先後展開了。但我們必須注意，現階段的清鄉工作發展，決非是僅僅量的進展，而依舊是質的。清鄉工作得同時在廣大的地區間如怒火焚燒般的展開，這一事實本身，已經可資說明其質的發展意味，所謂從點——線——面，本已說明了清鄉工作進展的質的趨向，現在是已接近面的階段了，雖然尚不過在開始。

就地區言，鎮江地區的清鄉工作，無疑是前期清鄉工作成功的直接後果，是清鄉政治再生產過程

中最值得注目的一環。清鄉工作是新中國政治生命的大動脈，而現在的鎮江地區，却又是扼住長江南北經濟，政治生活的一條實在的動脈，東南地區三千五百十一平方哩的長江三角洲，其樞軸所在就是鎮江。鎮江清鄉地區所包含的鎮江，揚中，丹陽，金壇，句容各縣，所佔面積即達二千一百四十五方哩。而首都南京，即以鎮江爲其正面屏障，長江南北的經濟溝通，亦以鎮江爲其樞紐。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重要，單就這二點顯而易見以事實言，也可瞭然。

確立治安和改善民生經濟，當然仍舊是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具體目標。但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政治任務，還不止此。單就確立治安與改善民生經濟的目標言，以過去清鄉工作的經驗，是比較容易處理的。祇是就全部清鄉運動的第四期清鄉工作言，鎮江地區的清鄉工作，同時負擔有過去三期清鄉工作的農村清鄉與都市清鄉的任務。此外，鎮江地區的清鄉工作，因係中國參戰後最初一次的大規模清鄉，隨中國整個政治任務的擴大，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政治使命，與過去幾期的同類工作，亦有了新的內容，此即滲透參戰意識於新地區的國民層間。這一如鎮江地區清鄉主任袁殊氏所說：

「隨國府之參戰，清鄉工作之任務是格外重大了。對於國民政府的地位，其與日本及對大東亞戰爭的關係，非予新的認識不可，因此在鎮江地區的清鄉工作，非同時完成軍事，政治，經濟的綜合體不可。」

這是說：新地區的清鄉工作，除了其原有的目標外，更負擔有確立新地區戰時體制的重要使命。確立治安與改善民生經濟清鄉政治目標，現在業已隨新的政治局面的產生，不得不放在建立戰時體制的總前提下來加以實現不可了。清鄉工作的實質政治性格，在這裏又獲得了一重明證。

鎮江地區的清鄉工作，配合蘇北地區的清鄉工作，在對付匿居於江北地區的渝軍份子與新四軍部

鎮江地區清鄉工作的新使命

九二

隊上，亦負有重大的責任。我們知道自從蘇州地區清鄉工作開始後，一部份的淪共部隊，即散處蘇北一帶，他們早先估計蘇州地區的清鄉工作，祇是一種政治的號召，是不會獲得成功的。自從他們匿居蘇北蘇淮一帶建立新的匪區後，就不時伺機待動。可是現在鎮江與蘇北地區的清鄉工作，不待他們有蠢動的機會，已開始主動的進擊了。在這一點上，鎮江與蘇北地區的清鄉工作，不僅繼承了蘇州清鄉地區的一貫使命，且欲完成反共建國的根本政治綱領。

無論就新中國建設偉業的一般政治任務或特殊政治使命言，清鄉工作之爲新中國政治生命的主要動力，是無可否認的。但正唯因此，負擔着清鄉工作的領導人員，應該重視其本身所負的使命。（三二、三、一五）

迷霧中的重慶

余致中

重慶的天氣，一年中有七個月在霧中。劇作家宋之的曾寫過一個劇本，叫做「霧重慶」，描寫一羣飄流到重慶的青年男女，在幻想發財的迷霧般的生活中消磨了壯志，而走上發狂，悲憤，厭世的絕路。其實不僅是一部份飄流到重慶的青年是如此，重慶政權也是一直在迷霧中兜圈子的。特別是對共黨的關係上，更顯出「自相矛盾」與「莫衷一是」。

共黨主張及其政策的不洽國情，與其十幾年來的貽禍國家，爲一般所熟知的事實，渝方諸要人，知之最切，過去蔣介石會動員全國之力，興師百萬，圍剿四五年，始將共黨驅於陝甘一隅。如果國共可以合作，則民國十九年至廿五年間又何必興師動衆，勞民傷財，重圍十覆，長征萬里！說者每謂渝蔣再度容共，由於西安事變時共黨斡旋，爲一己苟全之恩，不惜貽國家無窮之禍。其實狐狸埋狐搯，遠早於此。民國廿四年起，一面在西安成立剿匪總部，再築長圍，一面則陳立夫，張冲輩已與共黨代表相往來，秘密談判再度合作，爲「抗日」之預備。民國廿四年冬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張冲以中宣部電影科科長一躍當選爲中委的原因，由於酬其一勳勞者半，由於抬高其地位以利談判者亦半。西安事變的禍起蕭牆，未始非種因於此。大學有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統帥舉措既表裏不一，部屬自揣測意旨而預爲之地了。

自西安事變後，民國廿六年春在南京召開國民黨第五屆中委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根絕赤禍案」，在表面上雖說得冠冕堂皇，實際上已洞開「容共」之門，過去所用之「赤匪」「共匪」字樣，已一改爲「共產份子」「共產黨人」。同年七月，中日事變發生，本來未嘗不可如民國廿五年的成都事件，北海事件一樣由大化小，由小化無，而在共黨所左右的輿情挾制之下，日趨擴大，誠如張羣所說：「陰錯陽差地打了起來。」其後，共黨殘餘僅存於陝甘邊境的武裝，正式改編爲國軍，如虎附翼，在華北各地，突然飛躍地擴張。民國廿七年，流竄在大江南的共軍殘部被收編爲「新四軍」，又造成後來東南的毒瘤。這是渝方「容共」政策的實施時期。

但事實上那時所推行的政策，仍和過去一面剿共，一面談判一樣，「容共」的事實已見於實行，而「防共」的設施也着着佈置。民國廿七年的夏天，渝方把華北「民軍」各雜色部隊的政工人員，都調到武漢去受訓，另派大批嫡系人員去接替，開始所謂「摩擦」。渝方所以需要「摩擦」的目的，當然在防止共黨的發展，而實際的收穫，恰恰相反，「摩擦」愈烈，共黨的勢力愈擴大。一直到民國廿九年的秋天，渝共之間的關係已到無法緩和的地步，延及去年一月，終爆發了皖南圍殲「新四軍」事件。這可以說是從「防共」發展到「反共」的階段。

「反共」的行動雖開始，渝方又不能貫澈下去，不久又在暫維現狀的惰性狀態下停滯了。從德蘇戰爭開始到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渝蔣頗有利用當時的國際形勢再幹一下的企圖，本年三月廿三日，會頒「中正梗手」的密令給第三，五，七各「戰區司令長官」，令以全力消滅華南中華南的共黨勢力，並將共黨對之稍有好感的「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撤職。但一則因渝軍的實力不够，二則根本上沒有把握着「反共」的中心，實踐「反共」所必需的先決步驟，所以毫無效果。直到最近所傳的消

息，渝方的措施，反而變本加厲，漸有對共妥協的企圖。如宋子文的一再與周恩來談商，在「十中全會」中又有「宋慶齡，孫科，馮玉祥，馬超俊，劉維熾等聯名提出之容共聯蘇扶助農工及調整渝共關係之根本對策案」的傳說（據中央社十八日南京電，見本月十九日各報）。當然，那些提案的人，並非渝蔣嫡系，這類的案子，未必能通過於渝方會議，但從渝方的政情觀察，所以會有那些人列名於這一類的提案，已爲可以注意的事實了。

前年，宋慶齡從香港到重慶去，這是她民國十六年以後第二次到「首都」（也可以說是第一次，因爲民國廿五年十二月的到南京去，是專爲西安事變去慰問她妹妹宋美齡的，沒有出席任何會議，也沒有與任何政治上的人物會面），有一些非渝蔣嫡系的「中委」向她訴說許多不滿意現狀的話，當時她會允許在適當機會領導發言，別人也都表示當在她發言之後繼續發表意見，以形成一種反對嫡系包辦一切的空氣。第二日「中央黨部」舉行懇親會歡迎孫夫人，宋慶齡如約發表一些意見之後，馮玉祥，于右任，以及孫科以下的一羣，因爲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何應欽，張羣等都在座，均噤若寒蟬，不發一言。其後孫科部下的馬超俊，劉維熾等且紛紛與陳立夫朱家驊等相結納，以自保權位。所以，今天那些人敢列名於宋慶齡的提案，決不是敷衍門面，至少他們相信如此做了之後，也不會開罪於渝蔣。

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是東亞的一個毒瘤，誠如好富情報部長在十月廿五日廣播中所說：「中國共產黨自中日事變以來，其勢力漸形擴大，終至擁有正規軍廿餘萬，黨員八十萬；帝國政府勢必粉碎華北之共產軍，以拯亞洲全土免於赤化。」而對中國尤爲心腹大患。重慶方面，對這一點未嘗沒有認識，在最近幾年來的措施中，如把最精銳，最龐大的胡宗南軍團（共計四十七師，約六十萬，在渝方

共有的十五個砲兵團中胡部擁有十個砲兵團，留在陝甘兩省，四年多來從未參加作戰。在渝蔣嫡系各種機構中的教育口號，採取「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方針。而前年下半年到今年春的一切措施，也可以認為渝方未嘗沒有反共的決心。但在實際執行上，渝方不僅不能貫徹反共，而且有時反而對共黨妥協。如上述所引的提案，就可以說明其對共妥協的契機。

爲什麼如此矛盾呢？就是因爲渝方沒有把握反共的先決條件。要反共，必需放棄「抗戰」，對日和平。這是汪先生早已提出的，這是不易的真理。渝方一面既不肯放下一「抗戰」招牌，不肯直截了當地對日和平，於是其反共方針就必然因內外情勢的限制而流產，而變質。

我們如果回憶過去渝方反共流產的原因，可以證明渝方的甘爲外國操縱和甘供外國犧牲。在德蘇戰爭發生之前，渝方的妄戰，完全依賴蘇聯的接濟，財政上靠蘇聯的借款，軍械靠蘇聯接濟。一切靠蘇聯，自然不敢過分得罪共產黨了。去年一月十七日渝軍委會宣布撤銷新四軍的番號，莫斯科馬上取消一月十九日歡宴邵力子的宴會，無異對渝方下一嚴重警告。去年四月，蘇聯還有軍械運到，自然渝方要「誠惶誠恐」了。其後，蘇聯爲德國所困，不能再援助渝方了，渝方所寄予極大期望的美國，同樣一再勸告渝方對共黨妥協，寇里，拉鐵摩，福克斯，以及威爾基，幾乎都間接直接表示過。拉鐵摩在沒有擔任渝蔣的政治顧問之前，在美國所發表的文章是非常露骨的，羅斯福特別介紹這樣一位人物給蔣介石做政治顧問，其態度當然不言可喻。

這一點是出於渝方意料之外的，蘇聯要袒共，是理所當然。爲什麼美國也要袒共呢？不錯，紐約華爾街的銀行老闆同樣要反共的，但今天他們需要利用中國的共產黨，因爲中國的共產黨勢力沒有威脅到他們的利益。他們無其愛於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在華北能擾亂治安，牽制一些日本軍隊，

對他們是需要的。反正受其害的不是美國人，更不是美國的資本家。所以他們也不願意渝方反共，而不斷對渝方加以壓力。渝方爲了繼續妄戰，需要仰賴美國的有限的接濟，於是不能不接受美國「不准反共」的願望。這是過去沒有貫澈反共行動，現在轉而採取對共妥協態度的原因。

渝方妄戰之非計，汪先生已在將近四年前就指出了，到大東亞戰爭之後，妄戰的根據更喪失殆盡。渝方的不肯放棄妄戰，其結果不僅延長戰禍，使全中國人民不能享和平幸福生活，而且由於繼續妄戰必造成「容共」局面，尤將貽全國以至亞洲無窮禍患。對這樣自毀其立場的結果，重慶方面有識之士，必深切感到。

我們希望渝方明達之士，堅持「反共」，從而深認要貫澈「反共」，必需停止妄戰，實現全面和平。如此，則始可撲滅共黨勢力，而致中國於長治久安。否則妄戰一日不止，反共任務即一日不能貫澈，茫茫神州，外供英美帝國主義作貓頭爪，內則徒爲共黨造機會。失今不圖，噬臍莫及！（三一、一一、一三三）

爲什麼主張參戰

周化人

爲什麼主張參戰？最簡單最有力的答覆：是爲了實現 國父的遺教——實踐大亞洲主義！

或者會有人這樣問，我們有什麼力量參戰？參戰了又怎麼樣？ 國父是反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我們爲什麼要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對於上項的疑問，也可以最簡單的說話答覆：國府治下有千千萬萬廣大的羣衆，有幾十萬優秀的軍隊；意志就是力量，決心就是力量，不斷的努力就是力量。

參戰之後，我們一定是更要吃苦，但人不是苟安的動物；也沒有不勞而獲的幸福，唯有能吃苦，始可得安逸。

國父解釋反對參加第一次歐戰的理由，在「中國存亡問題」中說得很明白，他認定第一次歐戰是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中國自然沒有理由去幫助一羣帝國主義者去打倒另一羣帝國主義者；而現在的大東亞戰爭，則爲舊秩序與新秩序的鬥爭，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鬥爭，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應該是聯合全東亞被壓迫的民族去反抗帝國主義者。

在當時主張參加第一次歐戰的人，所計及的不是國家民族生存的問題，而是若干經濟的利益私慾，是希望幫助一個帝國主義以打另一帝國主義之後，求得一些餘利。當時加入的條件，最顯明的是關稅增率，賠款延期，庚子條約改正，一萬萬借款等。其實一個國家不求自立，不求振作，而希望在

魔手之下漏出幾滴還是自己的血液來以養生，其卑鄙無恥是真不足道，所以 國父在「中國存亡問題」裏，逐點指出他們的錯誤。

國父在「中國存亡問題」裏說：「有時國家不能不戰爭者，爲達其國家存立發展之目的」。國父並非否定一切戰爭，特以戰爭不可常，不過爲不得已的手段而已。我們可以看民十三年 國父在神戶講演大亞洲主義，正說明了要抵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唯有聯合了亞洲各民族，向侵略亞洲的敵人反抗，保護我們的生存。這就是說，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我們也不能不採用不得已的手段。消除加於我們的威脅。

中國國民革命的目標，是在打倒國內專制的統治階級，是在打倒外來侵略的帝國主義！可知當時國父反對參戰。不是反對與帝國主義者對抗，而是反對投機取巧的參戰，反對幫兇式的參戰。

英美帝國主義者加於中國的恥辱侵略行爲，加於東亞的恥辱侵略行爲，真是多至不可指屈！我們怎樣可以將數說不清的恥辱洗除？怎樣可以抵禦歐美無鑿的侵略？理論的問題，大家都明白了，並且方法的理論問題，在 國父大亞洲主義裏也曾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我們原本與英美帝國主義者沒有結解不了的仇恨，自然，我們已用盡可能的和平方法去阻止侮辱的再增，侵略的再增，但是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不能達到目的時，這仇恨自然是加深了！這是說，即使我們是負傷了的一頭走獸，到了窮途，對於那兇狠的追逐者，也決不能靜待死亡！即使我們真是最劣等的民族，也不能不盡最後的一分力量來維護最起碼的生存權利。

國父遺留給我們中國人，給全亞洲人的，第一個是東亞人必須精誠團結起來，打倒侵略東亞的帝國主義者；第二個是東亞人必須聯合起來，建立親愛精誠的東亞的永久和平。在 國父的指示，中國

人、東亞人、除了走這條路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除了打倒帝國主義之外，被壓迫的民族決不能以別的方法求得生存。

然而，由於共產黨徒的偏激社會改革觀念，由於軍閥政客地盤私利的爭奪，由於英美戴上和善的面具，由於中國人，東亞人彼此絕少透過隔膜的了解，因而中國人是忘記了 國父的遺教，忘記了大亞洲主義。中國國民革命的上半期，雖已完成了，但是野心軍人歪曲了國民革命的路線，由打倒帝國主義變而爲投降帝國主義。並且將民族主義曲解了，意思是想把中國成爲一個在東亞上唯我獨尊的大中國，甚至要想把中國成爲帝國主義。這些過去現象，成就了被英美與共產黨徒利用的結果，不但中國不能『完成中國革命，繼續完成東亞革命』的國民革命目的，反而使東亞人自相打了起來！五年來的中日戰事，不但祇是中日兩國的損失，在整個東亞反抗英美侵略的立場上說，也是個無與倫比的損失！因爲東亞間能稱爲獨立的國家只有三國，能够領導東亞人走向永生之途上的就只有兩國，這兩國，就是 國父在『中國存亡問題』與『大亞洲主義』裏所口口聲聲要精誠團結，互相協力，休戚相關的中國與日本。我們不但互相鼓勵於解放東亞的實力的養成，反而鑄就了拚力於彼此實力損耗的戰爭的錯誤。我們須知，中國不應在建設大亞洲主義之中，拖倒一個有力的戰友，並且這個戰友是決不會給我們拖倒的；日本也決不應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的途上，消滅一個唯一可做戰友的中國，並且這戰友也決不會給日本消滅的。中日兩大民族，不應爲敵，祇應爲友，是歷史的教訓，決不僅是一個口號。

日本雖然沒有揚起大亞洲主義的旗幟發動大東亞戰爭，但共是爲解除東亞的被毒害，轉中日爲敵以爲友而同甘共苦於對英美爭取自由，更呼籲中日兩大民族，同起領導各民族的自力更生，這與 國

父大亞洲主義的遺教，是完全一致的，這與中國國民革命的後半期所應做的工作，也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爲什麼在可以結束過去彼此的錯誤時而還要繼續自相爭鬥，爲什麼在必須同一步伐領導全東亞人走向生存的路上時，自己放棄了應有的利權？我們可以說，革命的完成，是歷史給予我們的任務，同時也是人類的一種權利，即使我們不要權利，但義務是必得負擔的。

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是負擔了東亞歷史的絕對任務；我們忍受苟安的痛苦，忍受英美繼續屠殺重慶內地民衆的殘酷，這無疑是說：我們放棄了獨立國家的地位，放棄生存的權利！東亞間各被壓迫民族矚望中華民族能幫助他們的正殷，而我們却在幹自相殘殺的行爲，不要說我們對不起矚望我們的其他民族，就是對於國民革命這聖潔的旗幟，也顯然是屈辱的自慚的！這是我們主張參戰的第一個理由。

我們所主張參加大東亞解放戰爭，與國父所反對的參加第一次歐戰，其不同之點有下列幾種：

第一：參加大東亞解放戰爭，是聯合被壓迫的民族，打倒帝國主義者。第二：英美的血債，要我們自己去清算，不能依靠別人。第三：第一次歐戰，我們是漩渦以外人；大東亞戰爭，則凡是東亞人都有責任的，即是說，第一次歐戰，無參加的理由，大東亞戰爭，則參加是當然的必需的。第四：參加第一次歐戰，反而增加列強的縛束，陷中國於更不自由，而唯有參加大東亞戰爭，始可以解除列強的縛束，把中國從次殖民地中恢復其獨立的地位。第五：參加第一次歐戰，是違反國民革命的行爲，而參加大東亞戰爭，正是完成中國國民革命後半期應有的工作！——這是我們主張參加大東亞戰爭的第二個理由。

幸

至於「我們有什麼力量」一問題，粗看起來，是值得考慮的，其實也是不足作爲反對參戰的理

由。即以中國國民革命而論，國父與諸先烈，也決不會等待先有了力量，然後才發動革命，但是結果終是革命者獲得勝利；北伐時，我們也沒有恐懼軍閥的力量比北伐軍的力量大，但廣大的羣衆跟在北伐軍的背面，龐大的力量在北伐軍進行之間長成，這都是一面奮鬥，一面產生力量的最好例子。並且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決不會等到我們有了可以抵抗的力量時才侵略，相反的，沒有力量時，才是最好侵略的時候，並且決不容我們準備抵抗的力量！一件事情的結果如何，不在起首時的困難來決定，而在奮鬥過程中的決心和努力來決定！我們祇要問不應該參加解放鬥爭，不應問這戰爭的成敗，有了決心，力量自然會生出！即如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前，沒有人敢料定日本能這樣迅速地收穫如此偉大的戰果，然而日本在其全國上下的決心中，在全國上下不斷的努力中，在不斷的吃苦掙扎中，卒達成今日的成績，可知只要我們肯努力，只要全東亞民族肯努力，力量是一定有的，勝利也一定會得到的。這是我們主張參戰的第三個理由。

我們的參戰，是中華民族翻身的僅有機會。我們必須自己警覺責任之重，意義之大，是無以復加！我們不應存心以日本的戰功爲我們的戰功，只應認定我們必須協力與日本求大東亞解放戰的完成，在不能不盡義務的東亞民族的共同要求前，一切是用不着觀望的，只應一步一步趕上前，一步一步的努力下去！

中國如果參戰之後，決不會馬上得到享受甘的日子；相反的，最初我們當會感到若干的痛苦。但事實告訴我們，我們除了必須在困苦中煅煉成一個堅強的戰士之外，還必要把全國國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各按自己的崗位去工作，更加努力於戰時的農業工業生產，使我們在作戰之中，建設成一個充滿實力的新中國！（三一、一二、一四）

戰時行政機構的單一化

尹繼剛

行政機構的簡單與繁複，以所管理的業務多寡爲準。從工作的效率講，無論戰時平時，中央機構，除若干部門直接管轄的事務較多，不能不稍形龐大外，餘凡管轄地方機關，其具體工作大部份由地方機關辦理者，中央機構應以簡單爲尙。否則上層機構過於龐大，人力財力，徒然消耗於文書交馳，對實際工作，毫無裨益。此在平時已然，而戰時尤甚。因爲戰時應集中全力於爭取勝利，國家財政不應耗費於豢養冗員，而政令尤貴於簡單統一，使地方官吏及人民得集中精力於完成主要的工作。

國民政府於民國廿九年三月三十日還都南京時，除恢復五院及軍事委員會組織外，行政院分設十個部（內政、外交、財政、軍政、海軍、教育、司法行政、工商、農礦、鐵道、交通、社會、宣傳、警政）四個委員會（振務、邊疆、僑務、水利）。當時情形，轄區有限，政務清閒，爲什麼反較民國廿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以前增設六個部呢（海軍部已裁部設署，分實業部爲工商農礦兩部，鐵道部已併入交通部，至此又分設，新設者爲社會、宣傳、警政三部）？一言以蔽之，爲：還都之初，集中人才，不得不因人設事，以位置賢才。如果以實際工作講，行政院祕書處及參事廳的人力，已儘足應付十八個部會的工作而有餘了。

民國三十年八月，中央政治委員會決定調整行政機構，合併工商農礦兩部爲實業部，鐵道部併入交通部，裁社會、警政兩部，於內政部設警政總署。但不久之後，又設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其組織

規模，甚至超過一部（社運會除祕書參事等外，有六處一會，簡任薦任的高等文官達百餘名）。警政部所屬政治警察署與其他工作部門，在軍委會添設一調查統計部，至九月底，行政院又添設全國糧食管理委員會，最初本以實業部爲主體，會同有關部會負責人員而成的臨時機構，並不成其爲一個獨立的行政機關，但後來則發展而爲脫離實業部的獨立的常設的機構。民國三十年八月的行政機構調整，所減少的不過一鐵道部，然而在交通部內却添設了鐵道路政兩署，（雖然那時沒有一條鐵路或公路歸交通部管轄！）實際上還是沒有減去什麼。

本年一月九日國府明令對英美宣戰以來，最高國防會議會對行政機構作一番更張，其要點爲：（一）裁併部會，邊疆委員會裁併，內政部設邊疆局，僑務委員會裁撤，於外交部設僑務局，糧食管理委員會改爲糧食部，社會運動指導委員會與振務委員會合併爲社會福利部，水利委員會與交通部合併爲建設部。（二）移轉管轄：原隸屬於行政院的全國經濟委員會及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均改隸國民政府；原隸屬於考試院的銓叙部改隸於行政院。（三）集中責任：各部原有政務，常務次長各一人，改爲次長一人；省政府由委員制改爲省長制，原兼任省府委員的各廳處長各以本職爲省長僚屬。

經過這番更張以後，行政院減少了六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及新運促進委員會本不具行政性質，所以不計算在內），增加了三個部。過去本與各部平行的幾個委員會，現在已縮併爲部以下的局了。

現在隸屬於行政院的計有內政、外交、財政、教育、司法行政、實業、建設、宣傳、糧食、社會福利、銓叙等十一部，再加上實際爲軍事委員會統轄的陸軍、海軍兩部，共計爲十三部。究竟有沒有如許組織的需要？是否合於戰時行政單一化的原則？在一般關心戰時行政，以及行政效率問題的人士，確是一個亟待解答的問題。

以友邦日本爲例，在大東亞戰爭發生前後，其政務的繁重，當然遠較我國今日爲甚，但日本的國務機關祇有外務、內務、大藏、陸軍、海軍、文部、工商、農林、遞信、鐵道、厚生、大東亞等十二省，而且工商農林兩省，遞信鐵道兩省的大臣，常由一人兼職，事實上祇有十省。而且近年以來，省內的官吏都有減少的趨勢，許多有經驗的人材陸續調到各地參加實際工作，加強現地各事業的策劃指導，提高現地工作的效能。這的確是符合戰時行政的極則的。難道我們不應取法嗎？

對擁有十三個部的行政院，或許誰都有還太龐大之感吧！

我們想：現在是戰時，每一個人應該有的信念，是如何加強工作，在這偉大的時代如何盡其一分心力，以貢獻給國家吧！誰也不應該計較官職的高低，機關的大小。祇要工作能做得好，一個局或一個司，並不會比一個部差到那裏，更沒有人會加以輕視的。

現在行政院的十三部，如果加以合理的調整，至少可以裁併四部，而成爲九個部。其理由如左：

第一、銓敘部所管的事完全是事務性質的，用不到設一個政務機關，（如果說銓敘部長決不能因個人的主張好惡而有所軒輊）。在內政部設一個銓敘司，就儘足以辦理一切了。

第二、單獨設宣傳部，在先進國家中僅德國有此前列，我國無模倣之必要。可在行政院設一宣傳局或情報局，其主管的事業，當然不妨照舊，但管理指導的機構可以縮小。節省的經費，可用於有積極意義的事業方面。

第三、社會福利部所掌事業，最含糊而空洞。其組織則極龐大，除各司之外，又有政治指導，及公益兩署，振務一局。對國民的政治領導與動員，不久之前，最高國防會議會通過原則，着重於自治

組織（保甲制度），不再通過職業團體，顯然爲民政方面的工作，不必再有重床疊屋的機構，反使人民有無所適從之苦。至於公益與振務，主要需社會人士負責，政府祇居於推動輔助與監督的地位（事實上以今日國家的財力而論，也不能負擔此項全責），更無需設立龐大機構。祇須在內政部設一公益司，就儘足辦理一切。

第四、糧食部的工作，今後最重要者爲增產，與農林水利息相關。爲完成其任務便利起見，應將實業部主管的農林部門，建設部主管的水利部門，與現在的糧食部合併成爲一部，其名稱可定爲農業部，或斟酌另定。實業部所管的工商礦各部門，與建設部所管的建設交通等部門，相互之間，也息息相關，也可以合併爲一部，可定名爲經濟部或建設部，如不嫌累贅，也可以稱爲經濟建設部。

如此，行政院統轄之下爲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司法行政部、經濟建設部、農業部七部，再加上直接隸屬於軍事委員會的陸軍、海軍兩部，共爲九部，爲現在的三分之二，但工作決不會受到何項影響。

至於現行各部會的組織，也有不少可以縮併。如外交部設總務、國際兩司，已足應付一切，通商、亞洲、歐洲、美洲等司，類於閒曹，不妨裁併，財政部的關務署，因戰時關稅不能期其增多，不妨改署爲司，或與稅務署合併，以節省經費。內政部的地政、禮俗兩司，現在的實際工作也極少，不妨降格爲處，甚至降而爲科。

以上所舉各端，僅爲個人的見解，當然未必盡當，因感於戰時行政的亟須統一單純，簡潔有力，庶幾人民觀感一新，執行功令，如指臂之相使，所以不揣譎陋，貢其芻見。（三二、四、一九）

當前的水利問題

金 狷

據中國工程師學會某年年會中建議規定工程師節的理由，六月六日是大禹的誕辰。不管這個考證是否可靠，因此而喚起國人對大禹的刻苦負責精神，有所敬仰觀摩，是有意義的。大禹的所以偉大，當然是爲了他的治平洪水。而他在治平滔天水患之後，受全國上下的愛戴，功業巍巍，炳耀千古，但他絕不自滿，更不以功自居。孔子稱他「卑宮室，糞衣服，惡飲食」，而有「吾無間然」之嘆！以大禹的功業，尙且自奉如此菲薄！這是全國上下應該嚴自檢點的：我們有何功德？我們的享用如何？而且今日正在戰時，應如何自肅？是各人應該嚴格檢討，而決定今後的生活態度的。

大禹是以治水出名的，人們也必然因此而想起今日的水利問題。一提到事變以後的水利，實在使人有千孔百瘡，無從說起之感！大至黃河，近而小的如黃浦江的疏濬，都包含着嚴重的問題。

黃浦江是上海的吐納口，上海的繁榮是建築於巨型船舶能駛入的。黃浦江雖然沒有挾帶很多的沙泥，但日積月累的淤積，也很快會影響到黃浦江的深度，特別是沿岸的淤塞。所以濬浦工作是上海繁榮的生命線。自中日事變以來，濬浦工作已受不少影響，近年來每逢秋汛潮漲，上海低窪的區域就成爲池沼一般，雖由於下水道失修關係，主要即係浦江河身填高所致。濬浦經費向賴江海關所徵船鈔抵充，其後因戰事狀態存在，船舶往來減少，船鈔不足應付，又附加徵收濬浦捐（爲關稅的百分之三），最近又增加濬浦捐率爲關稅百分之十。但戰時往來的貨物不能期其迅速增加，所以也不能希望由此即

可獲得充分的濬浦經費。如果沒有其他可靠的補助，使濬浦工作恢復舊觀，則在長期戰爭的過程中，（照友邦日本人士的觀察，大東亞戰爭的長期性，可能延及五十年或一百年。）上海雖不至於淤塞到陷泉州的覆轍（從最繁盛的貿易港變成廢港），但要維持其東亞最大的貿易中心的地位，是大成問題的。而就今天以及今後百年以內情勢發展的可能而講，東亞的貿易中心經濟中心，是捨上海莫屬，要在別處建設一個貿易都市以代替上海，是極不經濟，也是極少可能的。

人們祇要一提到黃河，誰都會想起這已使中國朝野頭痛了幾千年的難題，不知道究竟如何治理始能一勞永逸！而自民國廿七年中牟決口以來，問題更趨嚴重。自古以來，無論那一朝代，總把治河當作要政的，其所用的方法，不外於「防」「讓」「分」三策，而以「防」爲主，雖或奏效一時，至多數十年又發生水患。其癥結所在，即在黃河自陝以下無河身可循，不能冲刷泥沙，而所挾帶的泥沙，含量較多，河道易於填高。

主張「讓」策者，以西漢賈讓的「不與河爭地」爲根據，以爲古時黃河的闊度較後世爲寬，所以河汛期間河水漲度不如後世的陡高，衝擊隄岸的破壞力較殺。所謂「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的上策。不知道放寬，水流更無冲刷挾帶沙泥之力，河身更易增高。

主張「分」策者，從大禹「播爲九河」一語着眼，也就是賈讓的所謂中策。以爲分爲數道，水勢自小。但一則因開鑿非易，二則河分流遲，更易淤積，收效極難。（黃河屢次改道的河道是自然流成的，分播就必須以人工開鑿。）

因爲「讓」和「分」都是工程鉅大且使民間蒙受暫時的極大損害，而效果還是很難計算得失是否足以相抵，所以歷來都是以「防」爲主。在黃河的兩岸，築起高大的隄防，河身增高，隄岸也增高，

有些地方，則連築三道隄防（如事變前的開封附近）。日積月累，黃河的河身比平地高出丈許至數丈，已成爲從古已然慣例（賈讓「治河議」即有「河高出民屋」的話。而蘇北淤黃河故道現已爲農田，較兩旁田畝高出一兩丈）。所以一經大決，極難回復故道。水性就下，自難於強其回至高處。但就低處流成的黃河新道，不到數年也就重現故態，已高出平地。

民國廿七年中原戰爭，因戰鬥關係而改中牟決口，於是黃河即經賈魯河南流，入沙河再入淮河。國府還都以來，首先即從事中牟堵口工程，迄今尙未竣工。黃河改道以後，發生的現象有二：（一）對華北方面，過去賴黃水爲水源的河道，如南運河，衛河，因水源不足，供給灌溉的力量薄弱，致津海道屬的許多水田不能種植水稻。（二）對蘇皖及豫東方面，更是貽患無窮；豫東平原，決口後即爲黃水所淹，成爲澤田，因黃水挾沙甚多，水退以後，田畝上已積沙一層，必須翻轉土層，始能耕種；黃河奪淮，更使蘇皖人士特別是蘇北爲之談虎色變。過去黃河會奪淮一次，當時淮水尙直接入海，自淮水入海道爲黃河水所經，即逐漸淤塞，其後黃河改道而北，淮水即無出口，洪澤湖周圍，就淪爲澤國。事變以前政府曾積極進行導淮入海工程，以工鉅費多，尙未告成，事實上淮水出口還是經運河入長江。江北運河堤工爲運東十餘縣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經過每逢大水，屢次生險，其主因即爲淮河上游水漲，運河不及宣洩，如再遇長江漲水，則運堤更爲危險。近年來黃水流入，運河河身，尤有爲沙泥填塞的危險，如果時間一久，且將影響及於長江。

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會計劃引黃河積水以灌溉津海道一帶水稻的工程，在鄭州黃河鐵橋下游，開鑿一長達五百公里的引水幹道，預計動員民工六百萬人，至明年五月完成。引水流量爲每秒鐘四十立方公尺。工程完成以後，華北各河流都可以得到充分水量以灌溉農田。這當然是一個極有利的

工程。但也有人顧慮到如遇汛期，各河水量均增，則低窪之區又有遭遇水患的危險。因此華北當局又在靜海天津開鑿獨流減河，使過多的水量可以直接入海。獨流減河自靜海縣獨流鎮起，開鑿五十餘公里，河面闊度爲七十公尺，已施工二年，本年可以完成。華北方面的水利工事，除上述兩者之外，還有開鑿石津運河，蘆運河，灤河三大工程，每一工程，每年必動員勞工數百萬，耗費千萬（聯準券）。這些大規模的設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在華中方面是否可以同樣辦理呢？在理論上毫無疑義是可以的。第一步，先完成導淮入海工程，這是一個非常急迫的事；第二步疏濬運河，以保障蘇北十數縣人民的安全。

對黃河的根本治理，最好能開鑿一道有相當深度的河身，然後引黃水流入。以後黃河水流有水道可循，不僅不會把挾帶的沙泥，遺留下來，填積河身，且可藉河水主流的冲刷力，使河身逐漸加深。如此，黃河成爲長江第二，河患可以永絕，而且可收舟楫運輸的利益。

當然這樣的工程是非常鉅大的，真是談何容易！但絕對不是不能舉辦。我們的祖先，曾經築成五千餘里的萬里長城，也曾開鑿過長達三千餘里的運河，難道我們不能鑿一道一千餘公里長的黃河新道，以奠定民族萬世之利！國父所手訂的實業計劃，曾引上次歐戰時各國所建築戰壕及防禦工事的鉅大，說明以戰時動員的力量，要在中國建築十萬里的鐵路，一百萬里的公路，並非難事。這一次的大戰，其規模之大，消耗之巨，尤超過上次大戰數倍，但是無論那一國的人力都沒有中國多。中國要開鑿一道新黃河，也無論如何要比德國的齊格菲陣線要簡單省力，如果不成功，決不是「不能」而是「不爲」！（三二、六、三）

肅清英美遺毒的實質

尹繼剛

實質上已淪爲英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幾近一百年的上海租界，在幾天之後就要收回了！每個中國人，鑒於過去百年間英美帝國主義不僅奴役居住租界的華人，而且憑藉上海租界的經濟地位，以奴役全中國，租界不僅爲一地的罪惡淵藪，且爲妨礙中國主權行政完整的礁石，於創深痛鉅之餘，能見到上海租界的收回，我國主權行政的復歸完整，自然沒有一人不感到興奮的。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有一小部份人士對上海租界的收回，於興奮歡躍之餘，不無一些憂慮，這或許是杞憂，但並非絕無根據的。因爲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區，公共租界就在友邦日本有豐富經驗而又極幹練的專門人才主持下，像把一束亂絲整理得頭頭是道，一切都上了軌道。收回之後，由國人自理，是否能進一步地辦得更好，或能否保持已有的水準？還在未知之數。過去青島市的例子，是大家知道的。當然此時此地不同於過去的青島，而且和南市或滬西，一切的條件也不同，我們深信租界收回以後，決不會使市民稍有失望之感的。但正因爲上海爲全國經濟中心，又是東亞最大的商業中心，交通中心，爲中外人士所密切注意，所以必須做到毫無遺憾的地步，始足以慰國人熱烈的期望，無負友邦毅然交還的熱忱。

國民——尤其是上海市民，對收回租界後的上海，期望甚殷切，綜合起來講，不外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的爲肅清英美遺毒，積極的則爲建設新上海，首先實現 國父建國的遺教，以爲全國表率。

茲先述消極方面：

這裏所說的肅清英美遺毒，決不是一般祇顧表面的改換路名，廢除英文市招等。因為那些工作自然也值得做，但並不是此時此地必需做的，做了固然好，暫時擱着不做，也和國計民生沒有多大妨礙。我們所希望肅清的英美餘毒，是指由西洋帝國主義憑藉租界所創造的毒害中國的慣例，和起源於租界的各種害人之物。上海市民已歷受其害，渴望清除的，有左列各端：

第一，是清除不良份子，用上海話說，就是肅清流氓勢力。流氓是上海租界的特產，以租界為發源地而滋長蔓延到別處去的。一般把流氓和江湖的秘密會幫混為一談，其實全不相關的。撇開江湖上秘密會幫的作用不談（如洪門為明亡後的民族革命組織），秘密會幫是非常重視江湖義氣，有紀律，有組織的，其嚴密的紀律（或者說是殘酷的），主要是為了約束自己，或者用以對付仇視其團體的敵人。當然秘密會幫的行動時常是越軌的，但那是鬥爭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但以上海租界為發源地的流氓勢力，則完全兩樣，在他們的字典上，絕對沒有義氣一詞，除憑藉外力，欺凌平民，勒索敲詐以自肥之外，再沒有別的了。上海的流氓，雖然也披上秘密會幫的外衣，但僅是外衣而已，從來就不顧到什麼規律的。

上海的流氓勢力是怎樣養成的呢？那就不能不說是拜英美帝國主義之賜，因為他們要以極少數統治，奴役，榨取大多數的中國人，不能不假手於甘心作奴才的不良份子，通過他們以壓迫中國民衆。祇要能達到他們奴役榨取的目的，其爪牙的作為如何，他們是不管的。而那批甘心作外人奴才而以欺壓同胞邀功自肥的，就是一般所謂流氓。不久之前，因誣陷敲詐而造成張金海慘案的兇犯郭士元，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上海正不知有過幾千百個郭士元？現在不知還有幾千百個郭士元？上海市民直接

間接，有形無形死於他們魔手之下的，不知有幾多？市民們所受的痛苦，不知有多少？這都是英美帝國主義所遺留的餘毒，首先需要雷厲風行，排除萬難，予以肅清，庶足以保障人民而安閭閻。

第二，是恢復司法尊嚴。上海租界由於久爲外力所把持，許多法律事件是不由法院辦理的。如收回會審公廨及所簽訂的法院協定，就規定着大部份的刑事起訴權屬於捕房而不屬於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檢察官；就是僅存的一部份國事犯，捕房也可以起訴，而捕房起訴之後檢察官就不能再起訴。尤其是許多應由法院處理的案件，過去租界當局常自行裁決執行，絕不經過法院；如果罰不當其罪，也沒有救濟的辦法。（唯一的辦法是向領事團法庭控訴，進行既困難，且極少得直可能）前者（限制檢察官行使職權的例子）當然應隨租界的收回而糾正；後者（行政機關警務機關的濫使職權）尤應禁止，例如囤積物資，國府既明令公布囤積主要商品治罪暫行條例，行政機關就其職權所賦予，自應盡力爬剔檢舉，但懲治之權則應屬於法院。過去英美帝國主義對我一貫的仇視鄙視，所以恣意破壞我司法，現在租界收回之後，則必須養成尊崇法治的精神，庶使中外人士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三，禁止毒害社會的「娛樂」。煙賭娼三者爲害之烈，人所共知。由於英美帝國主義在奴役之外還要麻醉我同胞，所以過去均集中於租界，而且煙賭娼三者又是權取的工具，如十餘年前某方在包庇界內煙賭二項的陋規月收二十餘萬元（如照物價計算，合現在的二三千萬元），爲上海盡人皆知的公開秘密。除此以外，煙賭娼三者又爲帝國主義豢養流氓奴才的手段，於權取欺騙所得中稍分餘瀝，就足以豢養不少大小流氓，供其使用。迄今爲止，租界內妓院和變相妓院固然林立；變相賭博如跑狗場回力球等，則公開存在，被當作正當企業一般；煙館的公開存在，也是市民所周知的事實。租界收回以後，希望當局首先嚴禁煙賭，並嚴格限制出賣色相的事業，而使之逐漸減少，使紙迷金醉的糜爛生活

不再見於戰時的上海。

尤其是租界以外的煙賭場所，應立即封閉賭窟，對售吸鴉片之所，則限制開設數家，非登記之煙民絕對不准入內，而年在五十以下的煙民一律尅期戒絕，不准登記，南市賭窟六家，日繳「娛樂稅」三萬元，其對市財政的補助，每月不過九十萬元，而六家賭窟的必要開支，每月超過一千萬元以上，開賭窟者的盈利還不計算在內，此鉅額的消耗，完全由賭博者獻納，費時失業，不可勝計，傾家蕩產，也日有所聞。斲喪民力也就是斲喪國本，與戰時政策背道而馳，而政府所得，不過消耗總數的二分之一，或十五分之一。過去的所以容許其存在，或由於特殊關係，現承租界收回，刷新上海面目之際，應毫無猶豫地禁止，以示不背戰時政策。

以上三端，爲上海市民渴望清除的三害，其淵源都出於英帝國主義所扶植培養而成，遺禍無窮，痼疾已深，現承租界收回，一切除舊布新之際，深望當局能斷然將依附租界而生的毒害，連根拔去，不稍留餘地，百年痼疾，一旦盡除。如此，始能使一切積極的設施，舉事能收一事之效，集全上海的人力物力，遵行政府戰時政策，貢獻於大東亞戰爭！（三二、七、二五）

建立上海民意機關芻見

魯風

上海兩租界收回之前，中外人士都以建立民意機關爲言，因爲上海租界收回以後的施政成效如何，影響於全中國者極大，影響於東亞者也不小，所以友邦人士對此也極爲關切。上海爲工商業集中之區，現代化的產業，幾近半數集於上海一地。中日事變之前，全國關稅收入，江海關佔其半，全國統稅收入，上海也幾佔半數。可見上海在全國所佔的比重。上海不僅爲中國的經濟中心，就是在大東亞範圍內，因其地點的適中，和港務碼頭堆棧等設備，也是唯一的交通中心。租界收回以後的新上海，其主要的任務爲如何盡其最大最好的努力，以貢獻於大東亞戰爭。這一重要任務既不能完全委之於官廳，也不能僅僅責重於人民，必須官民協力，融洽無間，然後一切事工可以進行無阻，成效立覩。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民意機關的建立，在上海實有首先實現的必要。

前日陳市長於接見中外記者時，會稱：「臨時參議會預定在明年一二月間成立，蓋第一第八兩區，須半年後始可合併，而其內部機構與組織亦能漸致健全。」換句話說，就是因爲現當租界收回之初，事務繁忙，無暇顧及民意機關的建立，必須俟第一第八兩區的機構組織健全而合併爲一之後，始成立臨時參議會。

當然，兩租界甫告收回，百事待舉，繁忙自在意料，但機構與組織的健全，在大體上講，不必俟半年以後，如嚴格講，則半年以後也未必一定健全。上海的環境是複雜的，而各方的期望又極爲殷

切，要做得盡善盡美，當然是不容易的，也不是短時期內就可以奏效的。正因爲如此，民意機關的提早建立，可以運用民間的力量，協助政府解決許多難題，比起政府獨負艱鉅來，或許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民意機關的名稱，陳市長已說出「臨時參議會」。這個名稱，在事變以前已曾有過，成立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由市政府呈准行政院遴選地方人士十九人爲臨時參議員，其職權根據市組織法，議決下列各項：（一）關於市單行規則事項，（二）關於市預算決算事項，（三）關於整理市政收入及募集市公債事項，（四）關於經營市公產及公營事業事項，（五）其他重要事項。成立之初，由史量才任議長，史於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遇刺殞命後，翌年始改選王孝賚（曉籟）爲議長。其間因審議復興公債六百萬元用途及支配案，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十二年七月八日迭次開會，向市政府建議復興滬淞滬災區計劃案後，因市府實際用於災區復興者不足五萬元，於是臨時參議會各參議員王曉籟，虞洽卿，陳炳謙，王一亭，杜月笙，李馥蓀，徐永祚，秦潤卿，張公權，郭順，劉湛恩，陳光甫等聯名辭職。後來雖勉強存在，其效用已等於無，從此無聲無嗅，上海市民也就不再記着這回事了。

今後所要成立的民意機關，是否定名爲「臨時參議會」？「臨時參議會」是否需要到半年以後再成立？這都是值得討論的。因爲這一問題對今後上海的建設以及動員人力，物力，都有密切關係，特提出芻蕘之見，供當局參考，並就正於上海各界。

照個人的意見，現在的上海，不需要成立由政府遴選聘任或任命的「臨時參議會」，而應該成立正式由人民選舉的市參議會。照市組織法所規定，市參議會須至區長民選時始成立，區長民選就是

國父在建國大綱上所定的訓政時期終了，縣自治開始的時期。事變之前，蔣氏政權訓政十年，毫無成就，爲其喪失全國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之一。過去政府的代言人常常藉口訓政未成，不能給予人民以政權，而實際上形成包辦政治，視國家爲私產的不良現象，實爲渝方統治下朝野離心的根源。國父遺教爲我國建國的最高方針，一切政治設施自應以此爲準則。

我們試把上海的現狀與國父手訂的建國大綱相對照，看一看上海是否符合「自治」的標準：

建國大綱第八條：『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會經訓練考試合格之員，到各縣協助人民，籌備自治，其程度以全縣人口調查清楚，全縣土地測量完竣，全縣警衛辦理妥善，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而其人民會受四權使用之訓練，而完畢其國民之義務，誓行革命之主義者，得選舉縣官，以執行一縣之政事，得選舉議員，以議立一縣之法律，始成爲一完全自治之縣。』

以上海特別市所轄的全境講，各特別區公署所屬地區情形或有不同，但就第一區至第八區而論，則顯然已符合建國大綱的規定：

人口調查清楚，毫無疑問已做到了；

土地測量完竣，毫無疑問已做到了，登記已非常完備；

警衛辦理妥善，至少在第一第八兩區，年來在友邦的領導之下，已做到毫無遺憾的地步；

四境縱橫之道路修築成功，更無有一處能比得上上海；

至於訓練宣誓等，事變前曾做過，而去年辦理保甲時，也做過適應於大東亞戰爭新形勢，符合

國父大亞洲主義的誓約。

在上海，從下而上的自治組織（保甲）已全部完備，各種職業組織也整理就緒。如果要舉辦直接

建立上海民意機關芻見

選舉，以產生市參議會，是輕而易舉，絕無困難的。

自然我們不會忘記，現在是戰時，我們不應要求高度的自治，如建國大綱第九條所規定：「一完全自治之縣，其國民有直接選舉官員之權，有直接罷免官員之權，有直接創制法律之權，有直接複決法律之權。」這許多，留待戰爭勝利以後再講。今天所可能做，而應該做的，是左列兩點：

一、產生由民選的市參議會，以監督政府，協助政府。

二、區公署署長以下的自治人員，應出於民選。

市參議會的職權，自然我們也不希望規定得太多，以免過分束縛行政官吏。但增加人民負擔以及市財政的預算決算等事項，必須經過參議會的議決，過去舊租界的捐稅，徵收率比市區要高，但市民的怨懟並不一定更甚，其原因之一，就是由於財政公開，如工部局各事業部門，均有民間委員參加設計審核，雖然過去舊租界財政的支出不無浪費，但比起捐稅收入，十分之二歸公，十分之八入私囊的情形來，已使民間有雖出高額捐稅，也值得之感了。

所以，民間機關的設立，在表面雖似乎有束縛行政當局的地方，實際上正是幫助行政當局的，各種設施，能通過民意機關而使人民瞭解其真意，自然人民樂於奉行；徵收捐稅，能通過民意機關而使人民知道其真正的用途，自然人民也樂於繳納。

因為上海特別市轄區較遼闊，在短時期內不易辦理普選，則不妨暫將各特區公署列為例外，先由第一至第八區選舉參議員組織，俟各特別區公署自治工作完成後，各自成立區議會，再推出代表參加市參議會，這和國父建國大綱也並無抵觸。

最後，個人還有一些意見，就是外僑應否推舉代表參加民意機關問題，這在法律上自然是毫無根

據的，但事實上則未嘗沒有必要，因為上海是大東亞的交通中心，商業中心，外僑人數不少，而且也有運用其技能力量的必需，如果在市參議會內特別規定幾個議席，使外僑能推選代表貢獻其技能意見，對上海的市政設施，或許是有利的。

如果不得已而必需以「臨時參議會」為過渡，參議員由政府遴選後聘任（或由國民政府任命）。則不必等到半年以後，儘可以在一兩月內成立，其人選必須確實能代表上海各界的民衆，既不能如過去的納稅人會那樣完全落於馬路政客之手，也不應如事變前的臨時參議會那樣，幾乎全由金融資本家包辦，但這僅是過渡時期的辦法，其任期不能超過一年。（三二、八、一）

東亞經濟資源及其運用

楊立彬

英美勢力被逐出東亞之後，大東亞已經打成了一片，東亞經濟在日本最高指導，一元的計劃之下，一定會向繁榮之途邁進。

大東亞經濟資源的富裕，是誰都知道的事實，不論軍需資源或民需資源，大東亞圈內，大致都可以自給，甚至有餘，不夠的很少。今後在大東亞戰爭的需求上，以及大東亞經濟建設的發展上，問題已不在於資源的有無，而在怎樣開發，怎樣配給，怎樣輸送，以至怎樣加工生產？

就軍需資源觀，軍需三大資源石油鐵和煤，大東亞共榮圈大概都能自給。南洋石油埋藏量極富，荷印石油年產額達七百九十三萬九千公噸（一九四〇年），英屬婆羅洲九十九萬二千餘公噸（一九四〇年），緬甸九十七萬八千公噸（一九三九年），合計近一千萬公噸，約佔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三以上。鐵的埋藏量，滿洲約十二億七千一百四十萬噸（內田義信「東亞礦物資源」），華北約一億七千四百六十餘萬噸，華中和東南沿海區一億四千七百三十餘萬噸（北平地質調查所推計），海南島約四億噸，斐列賓四億至五億噸（日本經濟學者雜誌），馬來數億噸（多於斐列賓），馬來的鐵分極高（約百分之六十以上），年產約一億六十餘萬噸，日本八幡製鐵所的用鐵，大部分就是屬於馬來。煤的埋藏量，中國約二千四百三十六億噸（華北五省佔百分之八十六，事變前年產一千六百餘萬噸），越南數百億噸（年產二百五十餘萬噸，品質爲全世界第一），滿洲（每年約可運往日本三百萬噸）

荷印斐列賓以及日本也有不少。其他於軍需有關的主要資源，如飛機，坦克，軍艦，大砲上需用很大的錫，包括馬來，荷印，泰國，緬甸，越南，年產約十一萬噸，佔全世界產額一大半，其中馬來年產達五萬四千噸（一九三九年），佔世界產額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世界第一位產錫地。電氣工業特別有關的銅；日本約年產七萬七千噸（事變前），緬甸約七千九百噸（一九三九年），斐列賓五千二百噸（一九三九年，埋藏量約達五百萬噸），滿洲三千九百噸（一九三七年，以後續有增加），中國四川，湖北，浙江等處，銅的埋藏量也相當大，四川年產約四千三百噸。日本以前爲僅次於美國的世界上第二產銅國，其後退居第六位，由於需用的增大，及鑛山的老化，日本的銅，後來也由輸出變爲輸入，一九三六年度不足四萬八千噸。就這情形看，大東亞共榮圈內，銅的產量，似還不見發達。鋁的原鑛——鐵礬土，荷印約年產二十五萬噸（一九三八年），馬來五萬六千噸（一九三八年），越南七千噸（一九三七年），荷印的埋藏量在三千萬噸以上，馬來半島的南端也差不多是無盡藏，據說足供日本百年之需。合金必需材料的錳，中國，斐列賓，馬來，荷印，滿洲，越南合計，年產約達六萬餘噸，中國江西、湖南兩省的埋藏量約二百五十萬噸，一九三六年從廣西輸出的錳，達二萬餘噸。事變以前日本每年產錳約七萬噸，輸入約二十萬噸，不足三分之一。

民需資源方面（實際上在戰時也與軍需有關），共榮圈內糧食大致可以自給，就最主要的糧食米而說，中國產米年約五千萬噸許，日本一千八百萬噸（內朝鮮，台灣約六百萬噸），泰國五百萬噸，越南七百萬噸，緬甸七百萬噸，中國日本因消費大，大約各不足一百六十萬至二百萬噸，但南方三大米輸出國，泰國每年約輸出二百萬噸，越南一百五十萬噸，緬甸至少也在二百萬噸以上（泰越的大部，緬甸的小部，一向是輸往中國日本等地）。衣着原料的羊毛，棉花，麻等，共榮圈內似乎比較缺乏（產羊

毛的澳洲和產棉花的印度現還不能包括東亞共榮圈內），這是遺憾的事。包括中國，日本，滿洲及南洋，東亞產棉年額，一九三七年約一千二百萬担，（中國佔一千零三十餘萬擔）一九三八年約八百九十萬擔，一九三九年約六百十餘萬擔（中國佔四百七十八萬餘擔）歷年減少很大，這是爲了東亞棉花主產地華北受戰事影響之故。據東洋經濟新報（第二〇一〇號第四六頁）估計，由於華北治安之不易馬上恢復，棉花產額最近很難有完全恢復原狀之望，目前共榮圈內一年總生產額，至多可達九百萬担；但據大日本紡績聯合會企劃部調查，共榮圈內一年所需要的棉花，約爲一千九百萬担，相去一千萬擔之巨。至於麻，斐列賓等地雖產麻，但所謂馬尼刺麻是硬質纖維，作爲繩索，帆布等固然很好，做衣料却用不着，衣料用的大麻，亞麻，苧麻等，東亞生產非常貧乏，終算生絲和人造絲，東亞產額較多，（日本，朝鮮，中國生絲產額年約四萬九千二百餘噸，佔世界總產額五萬四千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抵補了棉花羊毛不足的一部份。東亞的樹膠和砂糖生產都是大大過剩，以南洋爲主的樹膠產額，（馬來佔世界第一，荷印第二）年約一百五十萬噸，東亞消費祇十六萬噸。三大產糖地——荷印（爪哇糖佔世界第三位），台灣，斐列賓合計，每年產糖約四千六百八十餘噸（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東亞消費祇二千八百四十噸，多出一千八百四十餘噸。

此外，東亞軍需和民需資源還有中國緬甸的錫，中國的錦，荷印的奎寧和茶，滿洲的大豆和木材，泰國的麻栗樹（造船等特殊用的硬木）等等，也都非常出名，這裏不想多舉和多說。

要之，一般地說來，大東亞共榮圈內的經濟資源，是富裕而不愁太少。不過，問題不是絕對沒有，須怎樣把這些富裕的資源加以順利的運用和適宜的配置？這主要是開發和生產問題，運輸和分配問題。譬如上面曾經提及過，據東洋經濟新報說，由於華北治安不易馬上恢復，棉花生產受到阻礙。

日本經濟學者雜誌（第二十年第八號第一八頁）也曾經說：華北華中由於治安問題，食糧困難，資材不足，輸送力減退，以及天災等許多阻力，棉花增產計劃不易成功。日本陸海軍省及企劃院官員所合組的南洋視察隊回日經上海時，談話中也提及過：婆羅洲等巨量煤礦因開採資材無着，難以急切下手（九月九日新申報）。這恐怕還不限於棉花和煤吧。東亞經濟資源有不少是偏在的，如石油偏於荷印，錫偏於馬來，荷印，樹膠偏於南洋，糖偏於荷印，台灣，斐列賓，多餘的米偏於泰，越，緬，僅有的棉花偏於華北，馬來斐列賓等地的鐵，則因當地缺乏粘結性炭，製鐵業不易發展。凡此，都有賴於運輸工具來調整。上述南洋視察隊便曾經說過：荷印大量石油因船隻關係而有不能運轉之勢（同新申報）。經濟學者雜誌（同前一六頁）又告知由於作戰上和船舶輸送上的困難，日本糧食的補給，不容易儘取之於南洋區域，而須置重點於朝鮮台灣，確立日鮮台的糧食自給體制。船舶不足，引起運輸和分配問題確實很大。今年初日本議會裏關於擴充海運一項，曾列為極重要議題之一。平井好一說：造船國策是關連今次戰爭的勝利和大東亞的經營之緊急適切的施策（改造八月號「世界變革和大東亞海運」）。實在，我們上海人日常生活上也常感覺到：荷印石油這末多，上海汽車却因汽油的缺乏而限制行駛；荷印，台灣，斐列賓太多的是糖，可是上海經常買不到多量的糖；泰越緬剩餘的米也不少，但上海吃米却不能不受嚴格限制。汽油和米等消費的受限制，固然於軍需儲藏有關，但運轉不圓滑乃是要因，尤其像糖。

大東亞經濟的建設是必然成功的，因為資源非常豐富，開發也已具基礎，共榮圈的繁榮，不僅必操勝算，且可計日而待；但繁榮也不是徒手坐待可得，如上述若干的困難點，要從速加以克服，就是需要大東亞當局及經濟界作極大的努力的。（三一、一〇、一二）

上海經濟的檢視

楊昌源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上海經濟起了極大的變化。上海經濟已由主要是英美勢力下的買辦經濟，而演變爲日本指導下的共榮經濟了。英美買辦經濟被驅出後，一般人對於上海經濟的新地位，曾經有着不同的估價。一部人認爲那以買辦經濟，租界經濟爲基幹的自由主義的，散漫的上海經濟，實在根深蒂固，一時不易絕滅，這對於東亞共榮經濟的建設，祇有弊無利；東亞共榮經濟既以日本爲領導，就該讓日本首都來担負經營的核心，今後可以不必再重視，甚至可以放棄上海經濟了。但另有一部分人却認爲上海在過去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紐帶，東亞經濟的據點，今後還應該是大東亞共榮圈經濟的中心，在共榮經濟的建設中，可以把上海經濟作新的運用，而置共榮經濟的中樞機關於上海；並且說：大東亞共榮圈經濟的中心，如不放之上海，便無法管制中國經濟，如無法管制中國經濟，便大部分不能實現共榮圈經濟的目的。（中央公論五月號杉村廣藏著：「新支那問題的構想」）

這是關於上海在共榮圈經濟中所當站取的地位問題，我們不想怎樣加以論斷。

但不管上海經濟在大東亞共榮圈中將站取怎樣的地位——主要的或次要的，或甚至不怎樣重要的，無論如何，由於歷史的地理的關係，及其他各種客觀因素所造成，上海經濟的衰落，對於各方面終不免要發生不輕微的影響。無可諱言的，去年十二月八日以來，上海的生產事業，內外貿易及其他一般商業等，都是趨於停滯和衰落的狀態；更由於生產貿易的停滯和衰落，造成物資的缺乏，物價的昂

騰，市面普遍的不景氣等等，使不但人民生活感受種種困苦，有時並影響到在華日軍軍需的供應。

生產的停滯和貿易的衰落是互爲因果的，而原料的缺乏，運輸的困難，實是主要癥結。九月底新申報所主辦上海經濟問題座談會上，潘仰堯氏會說：「自上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發生後，運輸工具減少，原料來源斷絕，工業界雖然想出很多代用品，但是不敷應用，以致減工一半至七八成……」（十月一日新申報）。另外又有不少記載指出最近上海工業生產停滯的情形，據山崎經濟研究所上海所出版的九月號東亞經濟月報載：「目前上海所有工業，可說大部分都停止機能，就舊公共租界內各種工業經營狀態看，大小一千七百餘家工廠中，有千餘家是趨於停業，其餘使用着僅有的原料，開工情形也是極度短縮……預料本年度上海工業生產額，將僅達以前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十月十九日華股研究週報也記載：「上海華商棉毛絲織業因原料困難，生產呆滯；橡膠製粉等業，也祇在有限度下從事經營。」該報又就上海最主要工業棉織業的狀況說：「棉織業界的活動狀況，近月來未見若何進展，最近日方返還的八家工廠，雖曾一度銳意恢復經營，終以原棉不易購得，電力供給減少，交通不便而致銷路梗塞等原因，其經營能力不過在原有的十分之一二。一十月四日上海各報更就各紗廠各別經營的情形記載着：「目前本埠開工的華商紗廠如申新因原棉的不足，僅開工百分之十三，新裕紗廠祇三成，新生紗廠等都不過二三成，永安紗廠出貨也屬寥寥。」日商廠家的情形也許比較好些，華股研究週報載：「八月份有大量原棉在虹口卸貨，結果日方工廠的活動力因以增大，原料已無虞缺乏；但華商工廠的原料仍祇能以存貨爲唯一的依賴，其所有存量最多者約六個月，平均僅能維持三個月。」（十月十九日華股研究週報二七頁）。不過，今年日商廠家的棉花來源，大概也難免要比去年減少，據十月二十四日申報轉載支那情報的估計：按照去年分配率，今年日本在華紡織業可得棉花的

分配量，將比去年減少三分之一，此後在紡織廠的開工率，恐將更見減少。

至就上海的貿易狀況說，大東亞戰爭發生後上海跟歐美間國際貿易的杜絕，乃是應有的事，這雖然影響了上海經濟着實不小，但同時使上海經濟，以至中國經濟脫離了對英美的依存關係，它於東亞共榮經濟的建立，顯然有利。可是，上海對國際貿易的衰落固屬無可奈何的事，但上海跟中國內地（和平區）間物資交流的不圓滑，却不能再等閒視之。自大東亞戰爭展開以來，由於上海生產的減退，交通的呆滯及物價的騰貴等等，使上海輸往內地的貨物，大見減少，據日文中支那經濟年報第一輯（七一頁）載：「去年十二月八日以後，由於輸入的激減，輸送能力的減退，舊曆新正後通貨的動搖，及生產的停滯等，上海流往內地的物資，減少到祇達以前的二，三成……」。同樣的，內地流到上海的貨物，主要是農產物，也相互為因地減少了。上海內地間物資交流的呆滯，造成內地經濟越發走向偏窄的自給自足主義，從而影響整個共榮圈物資的調劑。據東亞經濟月報載：「內地佔據地域內的農民，對於棉花、小麥、生絲等的生產，已不是爲了上海市場，而僅僅以生產其本身用的小型紡織機，磨坊（製粉白），機戶（生絲）等的消費數量爲滿足了。……又內地農民以前求之於上海市場的，除棉織品，小麥粉外，主要是火柴、蠟燭、肥皂、砂糖、燈油等，但現在已多以燧石代火柴，原料糖代精製糖，及以菜油獸油代替輸入絕望的點燈用的火油了。」（東亞經濟月報九月號一六頁森昌輝著「中支幣制統一與上海工業的再編成」），根據栗本寅治氏估計：「包括江南三角地帶，江北及蘇北地方，從來燈火用的石油消費，年約十七萬餘担（五十萬加侖）。如都代以植物油，燃燒耐久性姑照石油一對植物四計，（燈火強弱不管）約需植物油七十萬担，菜種含油量（榨油率）以百分之三十三算，須耗菜種二百十四萬担。」（同上二七頁）。煙葉的情形也很可注意，中支那煙葉株式會社在蚌埠

一帶收購煙葉時，雖運用種種優待的手段，但仍感很多困難，農民寧使拿着烟葉去從事私製。（同上
一七頁）

以上這些情形，更足造成上海原料來源的困難，而內地的經濟生活，也便愈益趨向落後。「上海跟內地經濟結合的疏薄化，上海對內地經濟之遊離的現象，勢必阻害上海經濟的活動，從而實有影響對日物資供給之慮。」（中支那經濟年報第一輯七一——七二頁）。這是值得研討的問題。據說，治安和通貨問題，也影響着內地土產物資的流通，上海出版的日文大陸往來雜誌說：「舊法幣在上海，南京及其他都市地區雖說已是禁止流通，然而在農村裏却仍舊差不多沒有阻礙，甚至上海特別市轄下的僻遠地區，也還有舊法幣的流通。所有土產物資，沒有舊法幣做媒介，就難以運到上海市場。」（大陸往來十月號三一頁——三二頁）。所以，治安問題及其連帶而來的的新舊幣制問題，也需要更進一步的改善。

目前上海經濟界及僑滬日本人士對於上海經濟的衰沉，已感着相當的憂慮，而有提出對上海經濟地位的重新檢討的。水木一郎氏說：「上海經濟的再編成，不但是中國問題之鍵，也是東亞共榮圈的中心之鍵。在上海經濟的再編成上，要排除英美流的性格，給與東亞的性格，而使其立於共榮圈的中樞指導地位。」（大陸往來十月號水木一郎著：「由政治的視野看上海經濟的再編」）。武內文彬氏也說：「上海經濟的建設如何，是中國經濟建設的試金石；中國民心對日信賴感，及對於日華合作上積極的協力如何，須看上海經濟建設的遲速和巧拙及其方法如何而定。」又說：「上海經濟的建設，不單是上海局地的經濟的復興和建設，更是全中國的經濟的復興和建設。」武內氏更認為上海是大東亞經濟建設的重要據點，應和日本經濟要地大阪神戶相連繫，作有機的結合。他主張於驅逐英美經濟之

後，應該接受上海經濟的遺產，利用上海現存的碼頭，倉庫，金融商業機構，工廠，公共事業，設備等，建設上海。武內氏擬分上海建設的一般目標，約有下列六點：（一）軍需物資的調達，（二）民生物資的供給，（三）對日滿華北及對南方經濟圈之民需物資的供給，（四）對重慶經濟攻勢，（五）作為全中國及大東亞共榮圈內物資集散地，（六）作為大東亞戰爭後遂行世界政策的一據點。武內又提出中國經濟建設上的一種「黃包車主義」，他認為事情確立之後，可讓中國多去履行其責任，日本應取着大人的態度，祇要中國忠實履行，對細瑣地方不必多加干涉，靜心等待成果就得。這好像趁黃包車，祇要規定幾點幾分安全到什麼地方，至於從那條路走或怎樣走，讓車夫去辦好了。（日文揚子江雜誌十月號武內文彬著：「經濟上海建設的構想」）。

從理論到實際，最近各方對於復興上海經濟的工作，確是做著不少，如金融界對於工商業的特別放款，農村放款的進行，利息的減低，都表示上海游資有傾向正常活動的趨勢。十月十八日申報載：上海各銀行錢莊已計劃聯合辦理對各紗廠麵粉廠收買原料貸款，總額約擬定為五千萬餘元；二十六日各報又載：中國，交通，浙江興業，上海商業四行已與永安，申安等紗廠，福新等麵粉廠商妥，成立五百萬元貸款合同，供給各該廠向內地產區收購棉花小麥等原料。同時，上海有關當局及運輸業方面也在進行協助工商界關於內地原料的運至上海，聞各工廠已得當局的許可，發給採辦原料證，准許棉麥等原料運入上海租界作生產之用。（十月十八日申報）又據同盟社消息：中華內河輪船及華中運輸公司也已決定協助麵粉商運送大量小麥到上海，以應上海的需要。這些，證明了上海工業生產上的資金問題，原料問題及運輸問題，正在進行圓滑的解決辦法，據說近日來上海各工廠開工的情形，確有相當好轉的現象，紡織業，呢絨業，橡膠業等各主要工廠，生產量約較以前增加二三成不等。（十月十二日

各報)。工部局總董岡崎氏雖說上海經濟最近的將來，須視日本當局在現行局勢中認上海所處的地位而定；但他也表示：上海貿易和工業發展的前途，如以遠大目光瞻望之，無疑的必很優良（十月二十八日岡崎氏對新聞記者談話），這似乎指示上海經濟的繁榮頗有復興的希望。（三一、一一、二）



上海資金的出路

楊昌源

在過去，上海是中國經濟中心，到中日事變之後，雖然因為戰時交通困難，上海和若干重要地區幾乎相隔絕，但一則由於傳統關係，再則由於上海是唯一可以自由取得外匯的地方，全中國的資金如波濤汹涌般向上海奔流。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前，據英美匯兌商人的估計，舊法幣聚集在上海及其四週的達八十萬萬元以上（香港為八萬萬元）這個數目雖不無誇大，但五六十萬萬元的數目當符合實際。這龐大的通貨集中在上海及其附近，當然不斷地刺激物價無限止地上升。到大東亞戰爭發生之後，又因為一部份物資的來源暫時中斷或減少，更促成物價高漲。若干物品的價格，在數年中增加二三十倍至百餘倍，資金雄厚的經營者及大囤戶，從數十萬資本擴張到千餘萬甚至數千萬的，在市上幾「更僕難數」。資金的擴張既為幾何級數般的增加，如果不能導引於正當出路，勢必造成物價的畸形高漲。

本年六月幣制劃一以來，物價起伏波動率的大，和供求關係絕少，主要即為苦悶無出路的鉅額資金在作祟。上海各工廠雖因原料供給不敷，所以開工率平均不到四成（甚至有僅二成左右的），產量不多，但實際上實銷極少，幾僅限於本埠，而過去的存貨則充斥倉庫，外銷極呆滯，最近當局雖寬放運往外埠的額數，如准許每月運布二萬疋到外埠去，但分配到數百家染織廠，每廠所佔之數極微，至於本埠銷路，當然有限，故在各項商品中，以布疋價格為最平穩；更重要的原因還有限價關係，然試將半年來的價格一加比較，也可以看出已漲起不少：以十六磅地球粗布為例，本年五月底每疋最高市

價爲舊幣劃頭三百九十元，當時劃頭折現鈔須貼水二五%，折合現鈔爲三百十二元，卽中儲券一百五十六元，而上週則爲二百六十五元，計漲起七〇%；雛鶴士林五月底最高價爲舊幣劃頭五百二十元，合現鈔爲四百十六元，折儲鈔二百另八元，而上週則漲至三百十元，也漲起五〇%。如以日用品之肥皂爲例，固本皂五月底最高價爲每箱舊幣劃頭四百九十元，合現鈔三百九十二元，折新法幣爲一百九十六元，而上週則漲至五百三十元，計漲起一二〇%；老刀牌香烟五月底最高價爲每大箱舊幣劃頭九千五百元，合現鈔七千六百元，折新幣三千八百元，而上週則漲至八千四百元，計漲起一二〇%。華商企業股票行市，更漲得奇特，如某某企業近年來絲毫不事生產，僅賴出售存貨以維持開支，如俗語所謂坐吃山空者，以投資或企業之常理而論，應無人過問，但其股票却能於半年內由舊幣三一元漲至新幣四三元。至於毫無實用的飾金，五月底爲舊幣四千元，上週已升至儲鈔三千二百五十元，也漲起六二·五%。這些都不是爲了實際需要的增加而漲的。

大家都知道，今年上半年物價的高漲，其原因不外兩點：一卽渝方通貨的膨脹，一爲囤積者的收購，物價漲得愈厲害，囤積的愈獲利，因此愈益加緊搜求而物價愈高。到本年八九月間，當局厲行統制物價，但對鉅額擴大的資金沒有導引於適當的出路，因是仍不免刺激物價畸形高漲。

現在，正是大東亞建設時期，資金的需要極多，照常理講，祇會嫌少不會嫌多的，然而上海的資金却感到出路困難。其主要的理由就是不容易直接用到生產事業上去，以發展生產。過去構成上海的繁榮的兩大支柱，一爲國內外的貿易，一卽輕工業的發達；事變之前，上海的關稅收入佔全國之半，統稅收入佔全國的六成以上，可以說明這兩點。現在對外對內都因爲戰事或非常時期的限制，交通運輸已不及戰前什一，而輕工業生產也因爲原料的缺乏，動力燃料的限制，運輸困難，銷路呆滯，開工率

不足四成。如以上海工業的重鎮紡織業（廠數佔全部工廠的三三%資本佔全部工業資本的四〇%）為例，過去除就近購江西北江南的原棉外還有豫棉陝棉以及印棉美棉可用，而現在則祇有就地取得原棉，據「支那情報」的估計：今年大江南北的棉產，約為二百二十萬担，除農民貯藏自用或另售之外，約可收購得一百四十萬担，因為要就大東亞範圍作統盤支配，所以在華日商及華商紡織廠所能分配到的約為三十萬担，至多不能超過四十萬担。以紡二十支紗計算，每件紗需用棉花三百五十斤，四十萬担棉花可以紡成十一萬四千餘件廿支紗，以工部局限價每件五千二百五十元計，其總值為六萬萬元，這就是全上海六十四家紡織廠，二百十八萬紗錠的全年生產量。根據劉大鈞氏所領導民國廿二三年全國工業調查報告，上海紡織業的全國生產量約為三萬萬元，（民國廿二年上海紗廠均減工，廿三年始全部復工，故此數尚不能認為全部的生產力），當時廿支紗每件的售價不到二百元，如以物價的比例計算，上海紡織業的生產能力現在每年應達到七十八萬萬元，而現在祇有六萬萬元，僅達七·七%。換句話說，單純爲了原料的不足，九十二%的生產力要休閒起來。

上海的生產品當然絕大部份要運銷外埠的，現在則所受的運輸限制極大，如色布一項每月運往外埠的數量為二萬疋，以最高價每疋三百元計，每月不過六百萬元，全年僅七千餘萬元。手頭雖沒有事變前上海內銷的數字可資比較，但相信如以物價比例，決不會達到事變前的一成。

因爲工業及正當商業受到種種限制，於是鉅量擴張的資金就陷於找不到出路的窘境。今年以來上海工商業家以及許多暴利者會作了種種新設施以運用鉅量苦悶的資金，大體上可分作三個時期，第一是開設銀行及銀號，第二是開設保險公司，現在則爲開設企業公司及投資公司等。今年一年中，上海已開設了三十七家銀行，保險公司也有幾十家，企業公司的規模大小不等，數量更多，資本近千萬

元的投資公司最近成立的也有七八家，這些是不是上海資金的出路呢？

今年春季及以前開設的銀號，大部份爲了投機，不必說它。至於銀行，較早的組織動機，無非爲便利國貨或變相國貨，所以設立較早大都獲利甚多，（至少主要負責人都大獲利益），但後來當局管理加嚴，自己既難國貨，放款也受限制，至於存款的吸收，除少數富有歷史的銀行之外，幾乎少到極點，商業往來，存款放款，又不像過去的有季節性，可以預計到存款放款的交互調劑。過去，金融的貸與和收縮，往往可以促進某一企業的繁榮或蕭條，而現在則這種作用已減少到極微；反之，金融業有時感到放款的困難，因爲今日生產事業由於種種關係，使用不了鉅額資金，而且爲求資金容易流轉起見，投入生產事業被擱呆的可能較大。所以，在表面上看，一般銀錢業的放款利率極高，普通在月息二·五%以上，中儲及中交兩對外信用較佳的銀行，供給的頭寸也不能算緊，月息不過一·二%，照理是銀錢業的黃金時代；而事實上則穩健經營的銀行反而感到運用艱難。不錯，現在還有新的銀行在籌備之中，據說其動機已不是爲了進取而爲了保守，某些有資產的人希望躋身於金融界之後，可以早得消息，及時安排其資金於安全之途而已。最近財政部已明令限制新設，當然已不復成爲資金的出路了。

保險公司的風起雲湧，一方面由於英美公司的退出上海，一般人以爲可以分得其所遺的保額，主要則爲吸收資金而能如銀錢業同樣地運用。事實上由於一般生產運輸的呆滯，保額有限而且極少變動，新興公司信譽未著，分保及承受分保都感困難，各公司不乏以高額佣金相招徠，獲利的可能極少。

最近蔚成風氣的企業公司，其性質非常不明顯，據聞大部份從事股票買賣。資金流到股票上去，

自然不能算壞，與投機相比較，已高出多多，但實際上既羣集於收購抬高後再以高價出售，對生產機構或原有企業機構的本身並無實際裨益，不能認為資金已得歸宿。換句話說，如許資金和股票的交流，並沒有使工廠增加一架機器，也沒有使物品多生產一件。有人說變成企業公司股本的資金，實際上依然是游資。這句話或許不能說它完全過分。

至於大規模的投資公司或實業公司，資本雄厚，若干公司所投資的對象也信譽卓著。然而他們大都不是「合固有工廠為經營本體」，僅以「固有工廠為投資對象」。所謂投資，不外購買股票或承募公司債及放款三種，公司債的利息固定而且不能過高，在今日的情形下沒有人會認購的，放款的利益也有限，至購買股票。雖然間接投資比直接投資比較稍安全，但利益則較低。因此，這種投資公司或實業公司，以常理而論，是不會引起投資者的大興趣的。但事實上又不然，如某公司資本，由發起人認足五分之四，其餘五分之一以四倍於票面的價格招募，不到三日，認股者超過六倍之多。這一點頗使人想起民國十年的一「信交風潮」。因為公司既未開業，盈虧無從預測，而股票已超過票面四五倍，如果發起人再出讓其股份五分之一，即可不名一錢而坐享五分之三的權利。最近各工廠的改組和增資，其性質雖不同於前者，但抬高價格以吸收現金，轉嫁其一部份的呆滯資本於投資者的頭上，作用正相類似。這個風氣現在正風靡全滬，為什麼能風靡呢？一句話，就是資金沒有出路。

資金在上海不易求得出路是事實問題，在短時期內，其困難是不容易解除的。但應該疏導到正當的生產事業方面去。筆者認為發展工業既有困難，應該使他流到農業生產方面去。至於如何疏導到農業生產，其詳細容以後再討論。（三一、一一、一一）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的建立

楊立彬

三月十一日最高國防會議，決定設置全國商業統制總會，這是中國戰時經濟上，中國統資經濟上，以至中日經濟關係上，劃時期的重要的設施。

就最高國防會議所頒布的「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暫行條例」以見，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可說是全國物資收買配給之自治性的最高統制機構，它受着政府當局的監督和指導（以實業部爲主），統一的處理關於統制物資的收買配給事項，國內各地域間物資交換的營運事項，輸出物資的供給事項，輸入物資的配給事項，及軍需物資的配給事項等。另外，最高國防會議又制定「戰時物資移動取締暫行條例」規定受限制移動的物品種類和範圍，而暫以蘇浙皖三省及上海南京兩特別市爲實行區域，並即宣布所有原有的清鄉地區物資移動搬出入取締規則，及其他取締物資移動之類似規定，除米另有規定（十二日國府另行公布蘇浙皖米穀運銷管理暫行條例）外，一律加以廢止。於最高國防會議頒布「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暫行條例」及「戰時物資移動暫行條例」的同時，日本在華當局——駐華派遣軍總司令部，中國方面艦隊司令部，駐華大使館，也會同發表緩和自一九四一年九月以來所實施的揚子江下游各地物資取締辦法，而重新訂立「揚子江下游地域（包括蘇浙皖三省及上海南京兩特別市）物資移動取締暫行規則」，規定今後關於上述地區內物資移動的統制事務，移交給全國商業統制會辦理。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已於三月十五日正式在上海成立，這樣具有統一性的，高度自治性的統制機構

建立以後，過去關於物資統制上所發生的種種不圓滑的現象，一部份不合理的情形，以及中日經濟界間和官民間若干隔膜的事情，一定可以得到大大的緩和了；從而，給予中國各地物資的產生和交流，及對於戰爭資源的供應，當有極大的幫助。

無可諱言的，過去由於統制機構的不完備，統制手續的繁瑣，及由於當時環境所產生而不得不施行的過度嚴厲的統制辦法，是曾經產生許多不圓滿的結果，萎縮了中國經濟生產的發展，阻礙了物資必要的流通，以致影響人民生活，影響戰爭資材充分而順利的取得。

譬如：就統制機構上說，過去，中日雙方都有許多重疊的機構，事權不一，許多事情因此往往要大兜圈子，耗時費力實在太甚。而且過去所行統制手段完全屬於缺乏伸縮性和靈活性的純取決於上層的辦法，造成統制當局和人民間的很厚的隔膜以至誤會，妨礙官民的協力。又在進行統制事宜之際，若干地方對於中日人士間差別的待遇，也顯屬無可諱言之事，造成了一部份中國人的畏懼，消極，而減少中國人爲加強大東亞戰爭經濟而努力的機會，並常使中國民族資本對於參加經濟生產事業的却步，這實在有背於中日經濟協力的原則。再由於限制物資移動之過度的嚴厲，使各地方間，都市和農村間，經濟中心的上海和內地間，物資交流發生大大的阻隔，並產生物價上極高的差異。如就上海和內地而說，爲了物資移動的困難，於是造成上海得不到原料品，內地得不到日用品的現象。上海得不到原料品，和原料價格的高昂，是促成上海生產事業衰落之基本因素，正如三月十五日各報所載：最近上海工業界各領袖會數度商討增加物品生產，大都認爲目前上海工業之不能振興，究其癥結所在，乃製造成本趨增，及原料不易獲得等所致，倘若原料能够源源運抵，製造成本必能減低，便可專事計劃增加生產了。據統計去年年底上海工廠數共有一千一百四十五家，和事變前的三千四百八十五家相

比，減少三分之二；工人十二萬名，和事變前的二十五萬名相比，減少二分之一以上（三月十三日申報）；又據說自農曆開歲以來，上海各業工廠，大都是在半停頓狀態之下，開工率不過百分之三十左右。這景象實在太見淒涼。關於內地原料的收購，雖然規定各有專門機構辦理，但隔膜之處常是很多，而收購的價格有時往往不够生產的成本，所以農民多半藏而不願賣出來；又因為農民不能得到來自都市的製成品，以致甯使保持原料，用原始的方法自己生產（如以手搖機紡紗織布及以手工製造土煙等），過着可憐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內地農產品既不能擇善價而自由出賣，又不合算賣給出價不够本的收購機構，而自用復屬有限，加上生活的困苦，因此，農民的生產情緒，就大為降低，從而造成農業生產的萎縮。

都市的工業生產和內地的農業生產之互為因果的萎縮下去，不僅是打擊着中國人民日常的經濟生活，且減少了中國對於戰爭的資源供應力，這現象如果讓它繼續發展，對於大東亞戰爭顯然將有不良的影響，而不能不積極予以補救。在大東亞戰爭中，中國於經濟上的職責，是極其重大的，三月十二日大陸新報更有明白的指出，它說：「中國參戰後所要做的最大貢獻，就是替日本保衛大後方，供給推行戰爭上所必需的物資，而這一種任務，日本很希望能由中國本身來完成」（三月十三日申報）。最近為視察華中而南來的華北開發公司總裁津島壽一氏在南京接見新聞記者也說：「今後最大問題，為大陸各地之物資交流，大陸之發展，必須提供物資以副日本之期望，……各地物資須求其合理的交流，以資培養戰力。」（三月十九日申報）

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的建立，縱然不一定能够全部解決上述種種難題，但無論如何，它對於推動中國經濟生產的增進和物資交流的圓滑，必有極大的力量。今後物資統制既已歸中國作自治性的辦理，

當可增大中國人在生產事業上的熱力，三月十三日大陸新報上說：「此次當局的英斷，對於民心頗多影響，華商方面視線轉變，均能抱定決心，相信其必能順利推進，（三月十四日申報）同時，物資移動限制的緩和，也定將促進生產事業的發展和物資交流的順利。其於安定民生，確保戰爭資源，作用很大。三月十一日全國商業統制總會決定設立時，日本駐華陸海軍當局及大使館會銜發表的談話中有說：「……設立全國商業統制總會，實施重要物資之蒐集配給統制，實為適宜的措施，期能以其自給的統制為基調，達到所期的目的，以資安定民生，復興經濟，並確保戰事進行上之必要的物資」。十五日全國商業統制總會舉行成立大會時，實業部梅部長在其致訓詞中也明白地說：「商業統制會的建立，政府希望構成一全國商業上最高之統制機關，於前方軍需及後方民生均能兼顧。蓋軍需與民生兩者，息息相關，後方民生不振，則前方軍需有虞，前方軍需匱乏，則後方民生勢亦難保。」自然，所謂前方軍需，後方民生，隨時當也有緩急之分的，軍事緊張之際，還應該以軍需為第一。

全國商業總會的工作現今已在積極進行，不久當有良好成績的表現，不過我們也不應就此便認可以毫無阻礙完成所有的理想，聞蘭亭先生說：「會務的前途，我們在眼前並不過分的樂觀，即以農業而論，農民辛勤植田，一擔所獲代價還不够所用肥料之值，試看若要抑價便要傷農，如不傷農，物價反而再高，故問題既如此複雜，必須尋根溯源，各業相互諒解協助，以求最公允的辦法，要達到這會務理想的目標，決非短期間可以見效，還待人事之是否合乎理想的順利……」（三月十四日本報，「全國商業統制總會發起人訪問」）。所以，一切尚須期待中日人士共同的努力。（三二、三、二二）

打擊投機的緊急對策

吳誠之

最近本市物價問題的嚴重情形，已超乎其他一切問題之上。薪水階級的人們，每天在上辦公室往來的途中，望着商店櫥窗中不絕變化的商品物價，心裏總不免吁出重壓般的嘆息。電車上的乘客十有八九是談物價，寫字間裏的職員們所談的是談物價，家庭間的主婦，因為每日直接和市場接觸的關係，物價高漲對於她們的影響最深，所以物價問題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她們和丈夫間造成爭吵局面的主要原因。偉哉物價，偉哉操縱物價市場的好商惡吏！弄至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只有這輩人，不僅對於物價高漲的嚴重情勢絕不關心，而且有空閒捧坤角，吃花酒，跑舞場，坐茶室的幸運兒，也正是這輩人！

你去把物價問題去問做生意人，他們自有一副現成的對答：「先生，水漲船高，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如果賤賣出去，用甚麼來批進呀！」開工廠的老板們說：「原料稀少是事實，成本貴是事實，我們在勉強出貨，總較靠着國原料發財的朋友還有些良心」。所以你要希望工商界的人來自動解決物價問題是早成絕望的了。他們的理由錯嗎？不能說錯。假定今天還有甚麼商店來舉行一次大廉價，保證半天可以出清存貨上排門，如果有工廠可以無限派貨，他們的機器恐怕也不愁沒有人連帶盤去，這不是甚麼笑話。在全上海，不，在整個的和平區域內，人與商品的關係，早已成了勢不兩立。有人就無貨，有貨就無人。這話怎講？這是說，你還想活着做人，就非跟着多少囤些貨不可，甚麼公

衆福利，道德，國家，社會安全，良心，都可以管他媽的，否則你就休想過活做人。

我們這一番話並沒有過火。實際的情形，實在比我們所能說的尤惡劣百倍。我們儘可以說，今天的整個社會，業已化成了一座大賭場，只有有本錢的人，他可以推莊，他可望翻本，他可以靠剝削別人而肥飽自己。在賭場裏，輸得只剩一身短衫袴的人，叫做「白宰雞」，然而賭場老板還決不輕易放過這樣的白宰雞，他還得借件舊大衣給你遮遮身體，叫你通知你的親戚朋友送錢來把你贖去。現在我們的物價市場上，也就差不多是這情形。囤積投機者如果是賭客，他們還有着銀行錢莊等後台老板，好像賭場旁邊開着小押舖一樣；所不同的，做囤積投機的大賭客，他們自己就是賭場股東，做白宰雞的機會是輪不到他們的，他們倒只是愈變愈肥的肥鴨；做白宰雞的只是挨不到擠身投機賭場的一輩靠薪水吃飯的小市民而已。

物價問題把整個社會弄到如此，靠純粹經濟的手段顯已不足解救當前的危急情勢，有之者，只有出之政治的高壓權力。現在這一舉動已由國民政府正式實施，此即國民政府對本市投機囤積者流的特令澈查，並對查有實據者，決計沒收其貨物並由最高國防會議予以最嚴厲的處罰。最高當局的此種決心，其將發生力量當然是無可疑問的。我們對於制裁投機，安定物價，一向呼籲不遺餘力，現在乘此機會，願再貢獻幾點意見。雖不免有打落水狗之嫌，但這輩落水狗不僅應該打，而且應該重重的打，直打至永遠消滅爲止。

我們認爲澈底打擊投機囤積，應從大的開刀，小的實施。所謂大的開刀，國府澈查特令中明明說「查得上海近來有大規模投機囤積重要物資情事」，投機囤積而上聞國府，其背景有大勢力者在是無可疑問的。再證之本市當局三申五令禁止囤積投機之遭奸商漠視，更可證明彼輩勢力，已非地方當局

所可控制，現在國府命令澈查金融機關，目的固在擒賊先擒王，但以金融機關爲對象同時，必不可放鬆操縱此等金融機關的人物，在一般市民心理，封閉某一金融機關或其他違法商號，不若查抄某人私產與嚴懲某一個人來得印象深刻。過去本市當局對於違反限價之銀樓，股票等大商號，曾處過重大罰款，惟對此輩違法奸商之個人，巨大罰款，可說只是九牛一毛，毫不在乎。因此打擊投機，除了澈查機關商號等組織之外，必須懲及主事者的人身。而且身份愈大，地位愈高的人物，愈不可加以放鬆。所謂殺一儆百，所謂一路哭何若一家哭，當局必須有切實執行的決心。

至於從小的實施，即是說安定物價，除澈查金融機關與重要商號外，對於一般另售商店，亦不能放過。金融機關的影響對於市民至少是間接的，雖說是根本的；但一般商店，却與市民直接生活有關。在澈查金融機關同時，對於一般另售商品，必須嚴格執行限價。成本貴，進貨難，這一切理由暫時不必予以顧慮。當局應以壯士斷腕的決心，責令各另售商店將其所有現存的貨物，在只准跌，不准漲的鐵則下出售。如果說賣完了要關門，關門就關門，反正貨價高漲了，他們也老早就上排門，見顧客臨門有如冤家上門，對於目前一般稱作商店的商店，實在不必顧慮他們會蝕本，只怕他們不夠蝕。我們承認我們這種主張不免偏激，但目前事態的嚴重性，只有激烈的處置始有挽轉局面的希望。一支牙膏從四元半漲到六元，從六元漲到十二元；一條手帕從三元六角漲到七元（恐怕眼前已不止七元了），一瓶普通的藥物從二十八元漲到四十八元，而時間不出一月，如果姑息這種情形謂之維持商市，我們相信上海市民十有七八他們寧可不要甚麼商市的。去年新舊法幣兌換時，一頂蚊帳還不過百元左右，今年就要三百元關外，商人願意有這種市面，市民却再也負擔不起了。

不過話得說回來，真正不要商市，當然是不可能的。所謂市民，多數人的第二重人格就是商人。

所以不要商人太澈底了，就無異不要市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意思，祇是爲有效制裁物價起見，暫時對於商業利潤，不妨予以較重的制約。有許多商人所以發了國難財，實在也是出於身不由主，物價要漲，個人的良心無論怎樣公平，也挽不過大勢所趨。這一點，我們雖主張打擊奸商，也是明白的。不過過去既爲大勢所趨，賺飽了錢，那麼現在爲遵守限價，甚至抑低物價，也不見得就會站立不住。

其實用嚴厲手段安定物價的一面，主要目的還是在安定民生，當然也是爲維護正當的商業地位。現在的問題，就在係要個別的商人自動抑低物價，是不可能的，他們大家互相觀望，唯恐漲價落後，那肯自動跌價。所以採取政治性的強迫手段，是不得已的切要一着，也許有人會顧慮用政治性的強制手段命令貶價，商店存貨即將爭售一空，真正鬧上大家上排門的結果。其實這是過慮；要是強迫貶價而僅及少數商品，或少數種類的商店，那麼確也不免有此可慮。因爲目前大勢所趨，所有市民，幾乎個個都是大大小小的囤戶。家裏用完了一塊肥皂再去買一塊的人，說句實話，在全上海可找不出幾個。但限價與貶價而普遍實施，且在一較長時期之內，命定不得漲價，那就決不止於存貨售空之虞。即使一時有售空的現象，囤着肥皂不能吃，囤着紙張寫不完的人，他最後還是要拿出來的，而那時限價仍舊不變，囤戶看高的心理就將無從滋生。

且爲防止限價與貶價有爭相競買之虞，也有不少方法。例如現在買燈泡買套鞋要用舊的去換，這辦法即可擴充及一切類似及有包裝的商品，如香烟，罐頭或瓶類食用品，他如用完了無可掉換的，則利用發票制，即根據一定時日，一定貨物的發票，在相隔一定時日後，始得憑票購售同樣貨物，既換購貨物之發票，由原商店加以收回。如此雖不能說是萬全辦法，至少亦可消極防止另星囤積。

目前本市當局對於一般商品不准發表數字的措置，我們總覺不妥。對主要市場，爲防止煽惑投機心理，固不妨制止其數字發表，但實際上恰赤，棉紗，香烟等誰敢說已完全沒有黑市？這且不論，至於一般另售物價，則當局應即公佈普遍之限價，冀商人不敢混水撈魚，市民有所明白。

以上所述，綜言之要均不出治標性質，爲安定物價，制裁投機的應急之策，但根本的安定物價，唯一對策，當仍不出純經濟觀點的增加生產，疏通貿易，強化統制。尤其增加生產與疏通貿易，最關根本。上面已經說過，目前一般工商業者，對於物價高漲的托詞，總不出原料稀少與成本重大等等，而揆之實際，一部份也是實情。譬如布匹，紡織品類，現下原料難得，無可言是事實。不過我們希望正當的工商業者，一定得自己運用腦筋，設法就可能的生產領域，改組其生產機能。

不久前，本埠日文「大陸新報」會載日商紡織業者因原料缺乏，開工僅及十分之二，爲謀補救起見，現已紛紛將其工廠改造或投資其他工業部門。如鐘紡（公大），現已經營有江南造紙廠，達源染廠，開成硫酸廠，三光洋行，公大皮革廠，公大毛織廠等；豐田紡織廠現經營有華中自動車工業社，華中自動車機械販賣社，華北自動車工業社等；大日本紡織廠經營有天章造紙廠，中國麥酒，佛慈製藥廠等；日華紡織廠經營有日本機械製作所；內外棉織廠經營有大陸軍工業，上海醫療機械製作所等；裕豐紗廠經營有武漢製煉廠，興亞橡膠廠等，華興毛絨紡織廠等。那麼我們的工商資本家，除了藉口原料稀少反恃囤積原料發財之外，也應該動動正當的頭腦了。他們當真相信長此下去，固能保持得他們民族資本家的地位嗎？

我們的結論是：安定物價，保障民生，打擊投機囤積不怕手段過辣過激，但這是治標，應急；講到根本對策，政府在決心制裁投機同時，應同時從速爲民族資本開闢生產領域與出路。（三二一、四、一二）

貢獻於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

唐士復

凡會涉獵近代中國經濟史的，觀於今日上海工商企業的「假景氣」，一定會回憶到過去的一個勃興時期。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從歐美輸入中國的商品驟然減少，價值突然騰貴，而銀價暴漲，當時的工商企業獲利奇豐，紛紛擴充規模，新的企業更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其中成績最佳，獲利最厚的，當推紡紗業。根據伊籐武雄的「現代支那社會研究」所載，歐戰後在揚子江流域勃興的企業有：發電廠二十六所，運輸業十八家，農業企業十八家，紗廠十六家，商業公司十五家，礦山工業十二家，漁業公司三家，其它八家，總資本額達一億五千萬元。若就全國統計，當然不止於此，這是中國近代企業史上的極盛時期。但是，曾幾何時，匆匆四年，歐戰告終；又二年，歐洲交戰各國的經濟狀況漸次恢復，乃捲土重來，競向中國發展，輸入中國的商品大量增加，入超數竟達二萬萬兩之鉅，國入血汗的被榨取，一至於此，言之興嘆。中國新興企業，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自然要受到嚴重的打擊，而陷於衰敗的運命。隨後，內而鬩牆之爭，此起彼伏，外而世界恐慌，逐漸波及，直至一九三〇年，更隨世界經濟的危機，而每况愈下了。

筆者所以首先提起這一段歷史的教訓者，無非希望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把歷史當作一面鏡子，不要重蹈覆轍，自甘暴棄。

也許有人要這樣駁我：歷史是不會重演的，上次歐戰告終，歐美的商品汎濫中國，重振中國的經濟命脈，這一次的情形可不同了，大東亞戰爭的最後勝利，將保證並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建立，英美的侵略勢力（包括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各方面的）將永遠絕跡，我們儘可從容不迫，充實與擴大中國企業的質與量，何必杞人憂天呢。目前的投資政策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

而我的答案是這樣的：第一，今日的戰爭是舉全國總力的戰爭。我們若是在軍事，政治，外交及思想戰上勝利了，而忽視構成總力戰一份子的經濟戰，終久還是要失敗的；第二，世界是有機的，一體的，大東亞共榮圈充其量是其中的一個單位，我們不能與其他單位，或任何單位中的任何一國斷絕政治，經濟及文化諸關係。就以經濟一端而論，我們若並此難逢的機會而不善加運用，就將成爲共榮圈中脆弱的一環，並影響其他的諸環。共榮圈的不健全，必然招致外來的侵略。因爲敵人在一度喘息以後，還是要挾萬鈞之力向我們壓迫的，今日之下，世界一家的方向，是必然的趨勢。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應以歷史爲殷鑒，進而認識世界的動向，這是筆者衷心貢獻的第一點。

二十世紀是工商進化的飛躍時代，人口數額增加無已，而土地肥澤漸減，人類欲望無窮；工商企業爲了適應客觀環境的需要，在機器製造上須精益求精，工作方法上採取合理化，生產成本上力求經濟，再輔以高度的研究與發明，否則，即將目爲時代的落伍。

英國牛津大學著名經濟學家馬克格銳哥(D. H. Macgregor)在「工業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Industry)一書中對此曾有剴切的說明：

『發明之整個計劃，在取土地之物產，化爲有用之貨物，以供給國家繼續增長之人口。迨生活愈趨複雜化，則個人需要之物，可單由生產者負責，不必由己身直接負其製造之責，工作者之地位，乃

自成一件物品——即職業是也。此爲晚近工業發展程序中之特徵，專門藝師，蓋已不知工作先後程序之所在，但知在全盤統系中，佔一地位而已。工業既趨專門化，斯工作卽是最後目標，但勞力之剩餘，終難得其安置，此又發明所致之結果也。自工業進化中之個人主義而言，則國家物產，原以維持人民生活，故工業與社會，應爲相互之結合。」又：

「……社會在經濟上與其他方面，自有一種基礎，絕非個人所能爲力。而羣衆利益之分配，胥以此爲其保障。」

因此，從業人員的再教育是二十世紀工商進化中的一個重點。普通人以爲工商企業的從業人員僅限於青少年，成人及女工，爲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及工作效率，應該施以適當的教育。其實，在現行經濟制度之下，連身心不成熟的兒童也捲入工商從業人員的範圍之內，這是既成事實，不容諱避。因此，以在業兒童爲對象的特种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在學兒童，工商企業界亦應多方運動，務使兒童棄學就業的年齡，儘量延緩。

而今日中國的工商企業，言機器，幾乎全部採自國外，而且陳舊不堪，較之先進國家日新月異的機器，相差有至一世紀者，欲求生產量的增加，豈非緣木求魚？言工作方法，直至今日，大多還停滯在口授心傳的幼稚階段，專家是到處受人歧視的；言生產成本，因機器及方法的陳舊，卽此兩端，已經無法與人競爭；言科學發明，先進國家對於工業所有權多方予以保護，且擴大爲國際保護，而中國則鮮有所聞；言從業員教育，除極少數開明的企業家已經深知保障從業人員的福利，亦卽保障自身外，大多數不聞不問；言工商管理，先進國家早已根據工商心理學不斷地加以試驗與研究，而中國工商界，連對這個名詞，還很生疏。

以上各點，都是工商企業在正當途徑上的致勝之本，而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捨本逐末，所謂投資政策，一言以蔽之，追求暴利而已。健全的投資政策應該是生產性的，現在反爲對於一般消費大眾日常生活的嚴重威脅了，美國著名投資學專家喬登（D. F. Jordan）認爲不謹慎的投資，幾乎是一種錯覺的經濟行爲，一樁不可饒恕的罪過，真是至理名言。

工商進化，一日千里，我們若不迎頭趕上，不用說，要在世界工商企業中爭得一席之地，誠憂憂乎其難了，這是筆者衷心貢獻的第二點。

至於今日上海工商企業家中的「有心人」，所感到的煩囂中的苦悶，也是不容否認的，如：生產手段的緊縮和斷絕，物資移動的遭受限制，企業活動的不能自主及黑市的跋扈等，幾乎使正常的企業活動因窒息而被迫終止。但是，因噎廢食，總是要不得的。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應該認清：這是戰時，痛苦是免不了的，未來的局面終久是要開朗的，現在正是做一番準備工作的時候，在技術，產銷，理財及管理各方面，經之營之，慘淡持久，必有收獲。

中國工業銀行設計處處長潘仰堯氏，憑其三十年服務工商界的經驗，高瞻遠矚的見解，認爲：在國內外戰事結束以前，欲期大規模企業的正當發展，原是緣木求魚的企圖；以企業機構作投機行爲，既非所取，閉門養晦，靜待時機，亦不足效，乃主張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應做左列幾項工作：

一、就自身已定的營業方針，考查國內外有關的工商的歷史和特性，大宗物產的分佈和產銷，研究這次戰爭所給予經濟市場的影響，作爲戰後大規模經營的張本。

二、羅致本業範圍以內的專門技術人材，供給相當設備，使對於本企業經營對象的商品之改進，作精密的研究與實驗，以作戰後大量製造的準備。

三、本業範圍以內的業務，目前不妨就環境許可的限度內，先從小規模着手經營，以期維持最低的開支和股息，並獲取營業經驗。但地域方面不一定要囿於上海一隅，和已感過剩的舊有企業爭奪殘羹；內地各大城市，也未始絕無翱翔的餘地，何不斟酌自己的業務性質，選擇地利人和適宜的地點，以圖發展呢。

四、就本身業務相關的農工商事業和各地所有的生產品，作精密的調查，集合專家從事準確的研究，編成精細的統計，製成適切的方案，爲異日着手經營的準備，尤其關於貿易的途徑，產銷的手續，要有詳細的紀錄，一切業務進行，都應實事求是，避免鋪張。因爲如果內容充實，業績正常而蓬勃，企業前途，自有希望，外界也會知道而予以宣揚的。古語云：「實至名歸」，就是這種意思。

諺云：「勿臨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綢繆。」敢將潘氏之言介紹於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之前，這是筆者衷心貢獻的第三點。

「不當位而言，實有罪。」筆者不揣謏陋，聊貢一得之愚，今日上海的工商企業家果能採及芻蕘，而改弦易轍，即令少數別有用心者目爲「罪言」，也非所計了。（三二、五、二四）

安定民生增加生產之基本設施

邵友農

復興中華，保衛東亞，這是我們國民每個人都應該負起責任，向着這個目標邁進努力地去完成。但是現在民生凋敝，物價飛騰，大多數的國民都在饑餓線上掙扎徘徊，要各個擔負起這個重大的仔肩，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無論政府如何的苦心孤詣，如何的疾呼促進，其收效極微，因為每個人都要生活，生活不能安定，則精神渙散，人人自危，其狡詐者作奸稱霸，正直者反陷困境，現在普遍的現象，除極少數之人外，誰不是陷於「三旬九食」「縑袍無裹」的苦境裏，大家終日仰天太息，其全副精神，都爲着求生存而貫注在「衣食住行」之解決，那裏還有心力去顧到國家的大計，國策的推行呢？這是人類圖存的必然趨勢，古今中外都是一例，這種趨勢更不是什麼壓力什麼強迫可以糾正可以挽回的。

我們覺得國家的施政，要有益於大多數的人民，然後政令方可順利推行。換句話說，在我國的政治，應在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着想，方爲合理。建軍是捍衛國家，而重農爲安定民生，民生不能安定，建軍也根本不能發揮力量。從未聞民不聊生的國家，會有治安，會成爲強國。所謂：「確保治安，安定民生」自有其聯繫性，必須同時並進，所謂「萬衆一心」「衆志成城」也須從安定民生做起，才會獲得效果。所謂安定民生，就是使全國的人民足衣足食，能住能行，不致有饑殍不繼，尺布難求，一椽無覆，荆棘遍地之嘆。

國父遺教說：「我們要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把這衣食住行四種需要弄到很便宜，並且要全國的人民都能够享受」，這個享受的要求，是最小限度需要而已。現在呢，有很多的人，連最小限度的需要都不能得到，這是何等可憐的一幕。

安定民生的唯一途徑，便是增加生產，民無匱乏則心安，民心安則治安可以確保，國策可以推行，一切訓練都可以收效。否則畫餅望梅，無補實際，我們知道，增加生產，政府不是不盡力去求實現，但是結果並無實效，這是什麼道理呢？其原因就是因為政府沒有單一的健全的行政機構。我們爲糾正過去策勵將來着想，深覺政府對此必須加以澈底的調整，則增產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否則政出多門不切實際，計劃難行，而枝節叢生，效果未獲而流弊紛起，不但與安定民生的目的背馳，而且影響於戰事的前途至鉅。

所謂增加生產，在以農立國的我國，當然以農業爲重點，國府最高顧問石渡莊太郎氏，上月接見記者發表談話，其中關於中國參戰後對增產之方策，和運用游資導入增產之途的兩項問題中，一再申言：「應置重點於農業」，「不外由農業着手」，也就是因爲中國是農業國家，努力使農業發達，則生產自然增加，不但國計民生胥賴於是，且對於大東亞戰爭時期的物資需要，更有極大的貢獻，其有關於勝利的完遂，至重且鉅。因爲戰爭勝敗的關鍵，全在人力、智力、財力、物力，這四種力量，能够充分的發展，系統地集中，則戰爭的勝利是可操左券的。但是這四種力量的產生，必須政府有健全的組織，成爲一個强有力的機構，才可以達到目的，因爲政府機構健全才可以發揮人力、智力、由人力、智力乃產生財力、物力，而財力、物力之獲得，就全在乎增加生產了。

我國農業之衰落，由來已久，其原因雖不僅一端（如水旱兵燹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最大的原因，

還是在中央沒有健全的農業行政機構，中央沒有健全的農業行政機構，則無論農業的改進，農政的推行，都無由實施。就是有了好的計劃，好的人材，因為機構的不健全，也就無法致其實效，所以年來高唱改進農業，紛設各種機關，而其結果則農民之固陋如故，農業之疲敝如故。

農業包含至廣，以技術方面言，有食用作物，特用作物，園藝生產，藥用植物等。舉凡畜牧、墾殖、森林、水利、蠶桑、農產、加工農業、土木農業、機械農業、氣象、動植物病蟲害、土壤、肥料等等，都是農業的一部門。以社會方面言，有農業經濟，農村社會，農業教育，農業合作，農業法制等，如農業法規及各地之農業單行法等，也都是有關於直接農業的行政，故以整個農業而論，決不是僅有食糧及衣着的原料兩部門，便算有完備的農業行政了。在事變以前，農業行政的機構比較完善，中央方面除有實業部之外，尚有其他必需的農業附屬機關，以推進農業技術，各省除建設廳或農礦廳之外，亦尚有昆蟲局，肥料取締所，農具製造所，氣象觀察所等之附設機關，而對於實際工作方面，各省均有稻麥作試驗場，棉作試驗場，蠶桑試驗場等等。屬於中央主辦者，有國立原蠶種製造場及中央農業實驗所所屬之各部門分場或分所，至關於農田水利方面，有導淮委員會，黃河水利委員會，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及太湖流域水利委員會，以及建設委員會之農田灌溉實驗區。還都以後，中央僅恢復中央農業實驗所，而揚州之國立原蠶種製造場，無錫之桑苗圃均為改進蠶事基本之機構，迄今尚未恢復，除蘇省之蠶業取締所，及類似之農業試驗場有一二所外，其他關於農蠶畜產方面之試驗推廣機關，均付闕如，現在中央所辦之改進區示範場，均為地方性之事業，而中央應有之農業行政機關，如整個農業之指導監督，亦尚未設立，推其原因，或以增產事業經費之不足，或以人材之缺乏，以致因噎廢食，因循不舉，而形成僅有運動之呼聲，而無實際之表現，我們認為這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安定民生增加生產之基本設施

一五二

題，而必須加以調整改進的一件要圖。

四月十九日本報專論「戰時行政機構單一化」一文中，其大意「糧食部的工作，今後最重要者爲增產與農田水利，息息相關，爲完成其任務便利起見，應將實業部主管的農林部門，建設部主管的水利部門，與現在糧食部主管的食糧增產部門，合併成爲一農業增產專管部，以符戰時之需要，其名稱可定爲農林部或農業部均無不可。」這個建議確有見地，現在世界各國政府大都有農林部，職掌全國的農業行政，農業國家不必說，卽半農業國家，及以工商立國的國家，無不有農業部之設置，而況在戰時體制下，食糧紗布缺乏的我國，反沒有統一農業行政的機構，又何怪農業增產政策之不能有顯著之成績。

我們希望農業行政的機構健全，增產效果的圓滿，同時對於大東亞戰爭財力物力的貢獻，極願政府根據戰時行政機構單一化的原則，關於農業行政機構，依照事實的需要，應併應增的統統歸納於一個行政機構之下，而設置一個專管農業的部，所有地方農業增產設施及行政機構，都在這個總樞紐之下活動，則一切計劃的實現，政令的推行，自然如指臂之相使，運用自如，增產政策之推行，方可收其實效，否則偏廢重複，政令不一，必無收效之可言。

我們知道政府正汲汲於安定民生，確保治安之設施，衛民之要圖，固屬民衆所切望，而安定民生，尤爲蚩蚩者氓所延頸企踵而渴望其實現，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於增產方面，多用精神與經費，使農業漸次復興，生產得以增加，物阜則民安，民安則國治，這是一定不易之理。管子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人民能知榮辱禮義，則禍心自戢，羣趨於善，和平亦可以開展，物資充足，奸商也不能囤積居奇，物價自然低落，則民無攜貳，物有充羨，方可以把力量團結起來，與友邦共同負起興復中華，保衛東亞的責任。（三二、七、五）

節約物資與革新風氣

魯 風

戰時因運輸困難，消耗過鉅，局部生產相對減少，民生日用物資的供應，亦勢必較平時減少，非盡量節約消費，不足以如期供應民生必需之用。且近代戰爭，因武器日益進步，破壞力之大，消耗量之多，十百倍於過去，物力供應力的大小與久暫，與人力的多寡強弱，同為決定戰爭勝負的主要因素。所以有人稱近代戰爭為物資戰爭。如能多節省一份非直接用於戰爭的物資，即增加一分戰爭力量；如多浪費一分無關軍事的物力，也就是削弱一分戰爭的總力。

我們今天所進行的戰爭，其目的為解放中國，解放東亞，建設合理而幸福的新秩序，其性質不僅為消極的破壞，而為積極的建設。所以，我們除盡力爭取戰爭的最後勝利以外，還要負起戰後的建設責任。而戰後建設的艱鉅，更倍蓰於戰時，今天如果能够多節儲一分物力，則將來的建設工作，就可以容易一倍；如果今天多浪費一分物力，則將來的建設工作，必更艱難十倍。

大家都知道，現行的大戰已進入長期性，其時期的長究竟長到如何程度，固然不能斷言，但我們必須看到一點：戰爭一旦終結，勞働力與生產機關的復員，決非短期內一蹴可就。戰時所感到的民生日用物資供應的不足，絕難在戰爭結束以後，即轉而充沛。如果毫無準備，一面養成節約衣縮食的習慣與心理，一面節儲必要的物資，以備復員期間的需要，則勢必增加戰後一切設施的困難。

故戰時物資節約，實為人人所必須履行的天職，如果在今天還要浪費物資，無論從那一個角度

講，都是不可饒恕的罪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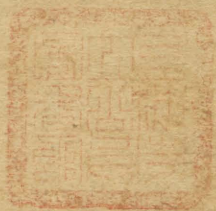
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上海的工業生產量，佔全中國的一半，在生活習慣方面，上海幾為全中國的表率，全國才智之士與富商鉅賈，大多集中於上海，政府的經濟政策，亦以上海為推行的起點，所以上海市民應負起領導全國的責任。但是，我們如果試一檢查上海一般中產以上市民的生活，是否合於戰時應有的標準？實在是相去太遠了！上海本來是著名的銷金窟，紙迷金醉的生活，甲於東亞，近年來不僅沒有因戰爭而有所遜色，反而因為若干戰時暴利所得者的恣情揮霍，而變本加厲。雖然得戰時暴利者為極少數人，大多數上海市民的生活，已在飢餓線甚至死亡線的緣邊掙扎，但由於少數暴利者繼續繁增華的刺激，使沒有淪陷於破產境地的中等人士，不能不勉強維持場面，而加速其破產。物資的儲存量，固然上海最多，但近年來上海的物資並沒有增加，而在逐步減少，再加上漫無限制的消耗，其減少的速率，甚為急劇。所以，我們認為上海發動節約物資運動，是不容或緩的當務之急。

在節約運動推進的過程中，不僅是消極的做到節約物資的目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現行一般反常的社會風氣的相當的糾正。就是，我們上面已經提及，在此戰時非常期中，一般民衆心理的反常，這種反常心理表現於具體事實的，便是頹廢淫佚，崇尚奢侈。譬如：目前上海的酒筵，已漲到數千元一席，而酒樓菜館依然上座常滿。呢絨嗶嘰，其價儘管漲得嚇人，購買的人，還是不在少數，數千元一瓶的香水，數百元一支的小唇膏，太太小姐們還是競相購買，跳舞場，夜總會，咖啡室，一天天的增多，而且都是營業鼎盛，到處擠滿着找尋刺激的人，一如世界已到了末日，京戲，話劇，電影等各色戲院裏，價鈿賣的越貴，票子銷的越快，並且戲票也發現了「黑市」，這不是說明了上海市民心理的反常，社會風氣的可怕嗎？今日上海的社會風氣，實在使人痛心疾首，沒有一個人不在追奔逐

北，以求滿足一己的物質慾望，沒有一個人不在想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這一種風氣和錯覺反常心理的發展，不但影響戰時物資的節約，而且大大有傷戰時國家民族心理的健康！

我們提倡節約運動的同時，必須注意到這種社會風氣的革新，把目前這些反常的現象，盡可能的把它逐步糾正過來。所以，歸納起來，節約物資運動的主要的目標有二：減少浪費；節儲有用而有限的物資；養成簡素樸實的生活習慣，來移風易俗。

再者，節約運動，乃屬一國國民的自肅行爲，其收効多少，全視國民心理健康增進程度多少而定，故推進與糾正方法，以輿論的褒貶，養成社會公是公非之標準，實最爲重要。而節約運動規約的訂定，亦以簡單切實，易於實踐而能持久者爲原則。近悉各方熱心人士，對於節約物資運動，將有具體的推進，謹先供獻一得之見，聊供參考焉。（三二、七、一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1815B

